

炎黄春秋

第 **7** 期
2009年

朱德 不可替代的总司令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AB团”斗争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

我随柬共上山打游击

阿尔巴尼亚动乱纪实

目 录

人物志	
1	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赵于平
求是篇	
8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阎长贵
12	邹鲁风调查人民公社之祸……………李震中
亲历记	
17	我随粟共上山打游击……………左毅
23	谁是《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庄重
26	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石福庆
30	回忆过“超支户”的日子……………詹南生
一家言	
32	文化现象杂说……………吴江
37	关于“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徐水涯
41	财产申报：二十多年难有结果的改革……………汪玉凯
怀人篇	
43	职位最高的胡风分子彭柏山 ……………王文正 口述 沈国凡 整理
48	哀李炳泉之死……………李普
52	读吴玉章的“哭吾妻游丙莲”有感……………朱维民
春秋笔	
55	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刘济生
60	金凤汉事件……………薛攀皋
65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反“AB团”斗争……………李维民
往事录	
71	邓子恢接管武汉纪实……………许人俊
77	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由来……………夏俊生
80	大饥荒年代的偷抢行为……………李治国
人海浪	
81	在美国打工17年……………贾宗谊
海外事	
83	阿尔巴尼亚动乱纪实……………王洪起

顾 问：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荣华 李 普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维民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杨天石 杨继绳
苏双碧 邵燕祥 周瑞金 范敬宜
金冲及 赵德润 钟沛璋 凌 云
展 江 徐 孔(副召集人) 秦 晖
袁 鹰 高尚全 章诒和 萧蔚彬
彭 迪 曾彦修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徐 孔 吴 思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社 长：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网 络 总 监：张晓鸥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长：白建钢 郎福呈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昊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 刊 网 址：<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发行部 邮箱：yhcqfxb01@126.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财务室：010—68525374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6.90元

朱德：不可替代的总司令

● 赵于平

自打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多年来,某些影视作品以及文艺作品,把我军的主要创始人,历史上被各界公认的“红军之父”,我军永远的总司令,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平平庸庸,人云亦云,无所作为的人,一个军中的摆设,甚至连他的下级和部将都不如。这不但丑化了朱老总,而且也是对我军的贬低。因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军队,长期以来,居然是由这样一个窝囊的统帅来指挥,那真是贻笑大方。

朱老总,从我军设立总司令一职起,直到 1954 年 10 月撤销,一以贯之,一直担任这一崇高的职务,从来没有更换过,以后也不会再有。所以我才称其为我军永远的总司令。而总政委一职,则数易其人,多次易手。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是造诣高深的军事指挥的行家里手,因为他是我军无可替代的驾驭战争的巨擘。

朱老总与游击战运动战

在残酷激烈的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敌强我弱,我军作战的主要战略战术原则是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而这一作战原则的提出者和创始人首推朱德。我这决不是标新立异,危言耸听,这是由毛主席的著作所证明了的。毛选四卷第一卷(1966 年 7 月横排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第 188 页,毛主席写道:“我们的战争是从 1927 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红军,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 1928 年 5 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

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很显然,这个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十六字诀,是由朱老总 1928 年 4 月 28 日与毛主席会师后,带到井冈山上来的,所以才有“从 1928 年 5 月开始”这种情况发生。毛主席还指出,在此之前“当时根本没有经验”,说明在朱老总未到以前,他是不知道这一战略战术原则的。聂帅于 1986 年 12 月 1 日在纪念朱德诞辰 100 周年的讲话中阐明“朱德同志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他的话,有力地印证了毛主席在上面的叙述,证明朱德是游击战“十六字诀”的创始人,毛主席是肯定者和应用者。此外,当年井冈山时期的老将领和老战士,也多有记述。例如杨至成、何长工、宋裕和、范树德、龚楚等。他们曾经回忆说:“朱毛会师后,原来井冈山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说‘这下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又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参加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镗老将军,在 1983 年 6 月 14 日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他说:“你们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有一件事提醒你们,就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是在许多地方做过试验的。最早起源于 1913 年,他在滇南个旧戡乱、剿匪。”他又说:“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朱老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他的一贯风格一样,表现出极其博大而宽厚的伟人胸怀。

关于运动战,毛选四卷第一卷,在同一篇文

章的第214页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也就是说，它是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而这一原则，是早在1925年，朱老总在苏联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秘密军事训练班担任学员队长和军事辅导教员时，回答教官“回到自己国内怎样打仗”的问话时就提出来的，他的原话是：“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这是有明文记载的。而且，这句话是地道的四川方言，是朱老总用他自己的家乡话来形象生动地表述自己的运动战战略战术思想。毛主席把它写在这里，同样也无异于告诉世人，这项著名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其发明权是属于朱老总的，他仅仅是接受运用并发挥。

上述史实，特别是毛主席自己的表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如此说来，对于我军游击战和运动战战略战术的鼻祖是朱老总的结论，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怀疑的地方吗？还有必要再去争论不休吗？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其源头是朱德的军事实践

毛主席的特长是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组织工作，理论工作，还有政权建设和政府工作，他特别善于总结汲取和发挥，擅长写作，这些也正是他作为总政委的分内工作。作为总政委，后来作为军委主席（我军自抗战以后，就不设总政委一职，军委主席实际上兼有总政委的职责），他还参与部队作战行动方针的制定和战略部署的研究。但是，他不是“万能匠师”，他从来没有替代过总司令的工作，他的工作范围，没有超出过总政委。擅长行动方针的制定与战略部署的研究，并不等于会打仗，而且战略决策也不是由总政委一人决定，他负责起草命令和指示是代表军委，并不是他的个人意见。打仗光有战略部署不行，还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军事行动，必须善于战场指挥，必须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具体的军事专业知识。比如熟知各种武器装备的性能，杀伤威力和杀伤范围，各种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协同，各军兵种的战术配合与协同，各种战术动作如何

实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进行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如何具体组织部队行军、宿营、隐蔽、警戒、侦查、包围、进攻、退却、掩护等，还要熟悉部队的各种条例条令等等。这些，作为总政委的毛主席，他是不熟悉的。例如，1928年3月由于误传毛主席被开除党籍，任命他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他表示为难，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这“军旅之事”正是朱老总、彭德怀、刘伯承、林彪等军事统帅与战将的擅长。特别是朱老总，战略战术兼优，在战争年代，党中央毛主席在军事指挥方面主要倚重于朱老总。事实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在军事上，毛主席主要是向朱老总学习的，他善于学习善于总结善于运用善于发挥，他与朱老总合作，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战绩，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人民战争思想。

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头，是朱老总的军事实践，这也是“红军之父”的美誉归于朱老总而不是毛主席的缘由所在。

上面一节关于游击战运动战提出者的论述，就是这一结论很好的证明。所以，科学地讲，准确地讲，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军事思想”应当称作“朱毛军事思想”。

智勇双全，军政兼优的朱老总

回溯当年，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老总一枝独秀，率领南昌起义硕果仅存的一团劲旅，仅以八百壮士，与敌人巧妙周旋，杀出一条血路，然后秘密隐入老同学范石生部，弄得国民党军莫可奈何。他所率领的这八百位勇士，铸成了我军的第一支钢铁雄师，即后来井冈山上著名的红四军第二十八团，仅该团一个团队，就产生了我军的三位元帅，一位大将，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独一份”。我军两位有着赫赫战功的著名战将——林彪与粟裕，都是出自朱老总统率的这八百壮士内，这决不是偶然的。朱老总所谆谆教导的作战方法：“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看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打什么仗”，他们做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在总结作战经验时，还多次谈到江西中央苏区反

围剿时的经验,他提出的许多新的战略战术原则,还是植根于江西苏区时代,而其源头,正是朱老总。粟裕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一时期时,满怀深情地描绘道:“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的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粟裕大将总结道:“铁的事实告诉我们: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别人,乃是百折不挠,大义凛然的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

从范石生部出走后,紧接着他又率部发动了湘南暴动,集结起近万人的大部队于1928年4月浩浩荡荡杀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共同开创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新道路。朱老总上了井冈山,使得井冈山上革命军的兵力增加了十倍,超过了万人,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注意,开始对井冈山进行较大规模的围剿,但都被朱毛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一一击破。这些战役战斗的战场指挥者不是别人,正是朱老总。

湘南暴动,是我军初创时期的最大暴动之一,其规模超过秋收起义,朱老总是我党我军唯一的参与领导了两个大暴动的高级领导人。

他率起义军余部转战粤闽赣边,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队伍保持不散,而且屡战屡胜,除了他具备高超的军事造诣以外,更是与他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视分不开的。他在艰苦的转战过程中,不忘党的宗旨,在关键时刻,领导了著名的“赣南三整”。经过“赣南三整”,即安远天心圩的思想整顿、大庾的组织整编、崇义上堡的军事整训,使部队获得了新生。随朱德转战的陈毅说,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赣南三整”,这个部队肯定会垮台。“赣南三整”前后20天左右,与毛泽东领导的“三



1937年8月,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五次谈判后回到延安。这是他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合影。

湾改编”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同“三湾改编”一样,对以后的整党建军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在有的电视剧,把朱老总描绘成一个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人,不但是对朱老总本人的歪曲,也是对我军成长壮大历史过程的严重歪曲。

第四次反围剿中的朱老总

萧克老将军在谈到井冈山的斗争时说过:“而展开军事斗争,打破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剿’和‘会剿’,在井冈山时期主要是朱德指挥战斗。”(萧克:《朱毛红军侧记》《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其实,在后来的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军事指挥方面,特别是战场指挥,主要的也是朱老总。毛主席是总政委,他擅长的是政治工作,他也是军事家,但他是军事战略家,他不是战场指挥家,他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如果像某些影视作品那样,毛主席万能,那还要总司令干什么?毛主席兼任好了!

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现在还有人说是“毛主席的影响”,甚至有人说是“周恩来指挥的”。我们来看看事实:

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收集军史资料访问何长工老将军时,谈到中央苏

区反围剿,何老提高声音,气愤地说:“我们要特别强调总司令在这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作用。有的书上说,由于许多干部受到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他们为什么不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朱总司令呢?离开了总司令谁去指挥?你把总司令摆在一边,谁下命令?第四次反围剿把总司令放在一边行吗?在讲第四次反围剿时,许多人不提总司令,我说他们别有用心,割断历史。”

第四次反围剿,当时毛主席已被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而李德等人尚未来得及直接掌控军事指挥权,周恩来刚刚担任总政委,对部队和敌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总的肩上。朱老总不负众望,以他一贯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指挥红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哀叹“此次挫折,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是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消灭敌人三个师,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这是前所没有的。战后,红军学校开办了“机关枪训练班”,朱老总亲自到训练班讲话,鼓励学员。刘伯承校长指示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治委员赵品三编写了一本《机关枪教程》作为训练班学员的教材。1959年,军博开馆时,赵品三前往参观,在红军馆内的橱窗里还见到了这本当年他亲手编写的教材。

顺便提一提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朱老总: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全面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大权。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在初战黎川失利后,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口号,采取“短促突击”等错误的战法,致使广昌战役再度失利。战至8月,北线和东线相继被敌突破,西线与南线吃紧,中央苏区四面告急。李德无计可施,称病躲避,朱老总毅然重又担负起指挥重任,收拾残局。朱老总乘机部分改变错误的打法,指挥红一、九军团等部,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在东线取得温坊大捷的胜利,歼灭李延年两个师四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唯一的大胜仗,使苦战一年的红军得到最大一次补充。但是,局部的胜利已无法改变全局的败势,到九月下旬,中央

苏区已经缩小到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长汀数县的狭小地区,不得不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转移——长征。

铁的事实证明,朱老总的军事才干是第一流的,他不需要接受别人的“影响”,倒是别人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当前,某些“历史”片刻意把“朱毛红军”塑造成“毛周红军”,企图改写历史,这与“文革”中故意把“朱毛会师”描绘成“毛林会师”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渡赤水的军事指挥者是朱老总,四渡赤水并不神奇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土城战役之后又经历了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其目的是改变过去硬碰硬的打法,采取避实就虚,寻找敌人薄弱环节,机动作战,以求取得战场主动。当时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和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是这次军事行动的实际指挥者。

1932年,中央规定: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朱德担任的职务都是拥有决定、指挥战役实权的职务。早在1934年12月18日通道、黎平会议决定转兵贵州时,军队指挥的实权已经从李德的手中转移到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手中。遵义会议决议规定:“仍由军事指挥者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周恩来是中央委托的对军事下最后决心者,新任政治局常委的毛泽东协助总政委的工作。”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首渡赤水,2月18日,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动,3月4日,朱德提议设立了前敌司令部,朱兼司令员,他提议毛为前敌政治委员,这时毛泽东才参与对军事行动的直接领导。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才成为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之一。3月16日,红军完成第三渡,旋即于3月21日东渡赤水河,是为第四渡,至此,整个四渡行动宣告结束。从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到1935年3月11日新的三人小组成立,近三个月的时间里,朱德身为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既负责作战计划又负责下达作战命令和战斗部

署,而且有权制定行动方针供周恩来审批,毛泽东仅协助周恩来。因此,在三人小组成立前,朱德在四渡赤水的领导集体中居举足轻重地位。三人小组成立后,中央对作战方针的审批权从周恩来手中转到以毛为核心的三人小组,行动方针的制定由毛朱周负责,通过后则由毛周王负责,而贯彻行动方针,制定作战计划,颁布作战命令和战斗部署仍是朱德的职责。可以说,三人小组成立后,毛、周侧重于决定行动方针,朱德侧重于具体指挥。可见,在三人小组成立前后,朱德都是主要指挥者。从时间上看,朱德参与领导了四渡赤水的全过程,特别是一渡



抗日战争时期的朱德

与二渡时,毛泽东尚未取得军事行动领导权,是由朱德全权指挥的。二渡之后,成立了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才参与领导了三渡与四渡。所以,现在有人说朱德在四渡赤水过程中只是协助毛泽东指挥是不符合事实的。

由于朱德早年曾在云贵川一带作战,对这一带的地形与民情十分熟悉,对赢得四渡赤水行动的胜利也是至关重要的,敌人的电报中曾经分析道:“红军除朱、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余多不熟悉地理民情”,可见地理民情对于作战成败的重要性。此外,情报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战取胜的重要原因。土城战役,由于不明敌情,对敌人的兵力判断有误,战役结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面军将廖承志带来的密电码破译法交给中央红军军委二局电报队,可以及时截获敌人的电报并且破译,能够准确掌握敌军调动的情况(见傅钟及钟夫翔回忆录),从而做到避实就虚,赢得战场取胜的主动权,达致军事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其实,当时中央红军各部队由于不了解最高决策层的情况,对于只走路不打仗,而且多走路走弯路,致使部队极其疲劳困苦意见很大,牢骚很多,甚至许多高级指挥员也颇有怨言。1935年

5月12日的会理会议上,林彪就写信提出“走弓背”的指责,要求更换前敌司令部领导,其它一军团和三军团的部分领导,也有类似意见。所以,在中央红军刚刚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时的1936年所撰写的回忆录——《亲历长征》105篇文章里,找不到一篇颂扬四渡赤水的,1952年李伯钊编剧的话剧《长征》也没有提及此事。只是到了1964年以后,萧华把它编进“长征组歌”的歌词里,先是写为“声东击西出奇兵”,1975年才进一步改为“四渡赤水出奇兵”,此后,“四渡”才大大的有名,甚至被神化。

由以上事实可见,四渡赤水并不像现在有人所说的是什么“神来之笔”,“得意之作”,好像很神秘,而只不过是遵义会议后采取机动灵活,避实就虚的新战法的结果。说白了,就是躲着强敌走。它所体现的,是集体智慧,民主决策,是实事求是的精神。

顺便提一句《亲历长征》里面收集了12首红军部队当时传唱的歌曲——真正的“长征组歌”,其中没有任何一首歌是歌颂哪个领导人的。可是,却偏偏有一篇文章《大雨滂沱中》,现场记录了1935年6月25日中央红军和中央领导人冒雨在两河口召开欢迎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大会的场面。大会首先由朱德致欢迎词,然后张国焘致答词,张国焘在讲话结束时喊了三句口号:“红军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个“朱总司令万岁!”在这105篇回忆文章里,是唯一针对领导人个人的。

朱老总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战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1937年4月12日,朱老总就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西北青年救国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针对国民党的速胜论和党内某些人的急躁情绪,提出

了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他又利用抗战爆发后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国防会议的机会，于1937年8月11日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进一步指出抗战的取胜之道是：“实行持久战，开放民主，动员民众，在敌后发动游击战争。”他的远见卓识，使得与会的国民党将领们为之耳目一新。他还就当前战局的进展发表了预见性的论断，指出：“日寇近日就会进攻上海”，在座的国民党将领们对此半信半疑。结果，只隔了一天，会议还未散，就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与会诸将领尽皆叹服备至。不久以后，蒋介石就接受他的建议，在庐山开办了抗日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了八路军将领作教官。与此同时，朱老总在八路军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上发表了专著《论抗日游击战争》，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了怎样从战略高度上以及在具体战术上开展游击战争，以达成持久抗战并最终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目的。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为该书出版了单行本。这本书，成为根据地军民发动抗击日寇的军事行动的最好教材。在华北抗战中，搞得日寇头痛万分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游击战战法战术，都从这本书中吸取了营养。

朱老总的这一对日持久抗战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毛泽东完全一致，稍后，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他的著名论著《论持久战》。

抗日战场上的朱老总

朱老总是在1940年5月离开太行前线回延安的，他先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然后再转道返回延安，他是带着一份给予边区人民和党的丰厚礼物载誉而归的。朱老总自己也即兴赋诗一首——《出太行》借以抒怀：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37年9月，朱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亲率八路军主力三万两千人开赴山西太行前线，开辟华北抗战，在武乡县建立了八路军前线总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我军华北敌后的抗日战争。他还被国民党当局任命为第二战

区副司令长官兼东路军总指挥，指挥八路军三个师和国民党的四个师，授陆军上将军衔。在他和彭德怀的领导与指挥下，八路军首战平型关，设伏雁门关，夜袭阳明堡，斩获甚多，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威名天下扬。华北各地，黄河两岸，到处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到朱老总离开前，不足三年，八路军主力已经迅猛发展到二十二万人，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数十万，华北各地建立了至少十一处比较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给侵华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振奋，给我全军将士以极强的鼓舞，朱老总与彭总在各根据地和全党全军中的声望如日中天，八路军声威大振。抗日战争发展到后期，我军已拥有正规军近百万，民兵游击队二百多万，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大军。这些成就，与朱德、彭德怀在华北的正确指挥与领导是密不可分的。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中，纵观华北抗战全局，在我全党全军中，朱老总和彭总的功勋是数一数二的，是无可比拟的。华北抗战的开展与八路军的大发展，为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抢占东北的决策与三大战役的擘画

日寇一投降，蒋介石立即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却急令蒋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内战阴云密布。1945年8月28日下午，朱老总在送走赴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机场返回之后，马不停蹄，立即赶往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指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14日，根据朱老总的提议，中央果断作出决定，把原先准备派往南方的十万部队和两万干部转为派往东北，并陆续将二十余位中央委员调到东北工作。紧接着，他又与刘少奇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得到复电同意后，立刻以中央名义电示全党全军遵照执行，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针“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三大战役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胜利，标志着蒋介石20多年来在中国的统治行将结束。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管军事的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

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朱德,在伟大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中,是如何对三大战役进程作出科学预见和指导呢?

在三大战役之前,朱老总就部署、谋划了石家庄攻坚战,关注、支持了临汾攻坚战,帮助和指导了华野濮阳整军,并条分缕析地提出了对长春实行攻坚与长围。朱老总对这些战役的宏观指导则为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范式。

他立足于全国战场,从战略战术方面对三大战役的进程作了全面的预示。这表现在:

1. 预见三大战役尤其是辽沈战役的具体进程,并第一个指出中原战场是决战的战场。

1948年8月23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任务、战略决战的地点、时机和条件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说:“中原战场是决战战场。自古以来谁在中原取得胜利,最后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就能解决……”

2. 对东北和济南等战场形势作了分析总结,并预示1948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他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对各战略区进行了分析。他说:“过去我们是怕东北的敌人进关,因为进关后,不管增加到哪里对我们都是不利的。现在敌人已不可能进关,我们可以在东北将他们消灭。”他认为“打下济南,对我们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业基础进行生产。山东交通也很便利,有铁路、运河,对今后支援大兵团作战,是一个重要的大后方。同时我们可以腾出十万余人,再加上补充几万俘虏,足以对付南面的敌人。”

东北、华东战场的进展一如朱老总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经过31个小时激战,攻克了北宁线上的战略枢纽锦州,取得了辽沈战役决定性的胜利。

3. 对中原黄淮地区战场作出预见,并预示1948年冬解决东北问题。

1948年10月16日,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指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指蒋介石)要撤也撤不出来了。锦州在战略上意义很大,是关内与东北联系的补给与转运基地……”,“目前主要作战在东北,形势对我们有利,可以打几个好仗,在今冬解决东北问题。”“山东现在已经抽出很大

力量,粟裕和许(世友)、谭(震林)可以会合打大仗(指华野内线部队配合作战)。”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央在城南庄召开的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朱老总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华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几个大仗”的重要建议,征得其他中央领导的同意,改变了原先的部署。他又亲到豫东前线传达中央的决定,并指导作战部署,极大地鼓舞了华野部队的士气。随后,华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全胜,证明了朱老总一贯战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

战事的经过,桩桩件件印证了朱老总的预见。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辽西地区全歼了由沈阳西援锦州的第九兵团廖耀湘部5个军10万余人。11月2日,再克沈阳、营口,迫使锦西、葫芦岛之敌海运南逃。至此,辽沈战役全部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紧接着,即11月6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进行之际,挥师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也联合发起平津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发起、进行和结束,同样在朱老总预见之列。

4. 对淮海战役及全国决战进行预测,并预示傅作义部最终将被歼灭。

1948年11月26日,当战略决战全面铺开之际,朱老总在中央战况汇报会上说:“我们正以全力与敌人进行决战。二十年来的革命战争,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今天形势变了,是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东北决战已把敌人消灭了,现在,正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平津决战也即将开始。”“在徐州地区,黄百韬兵团被歼后,我主力已南下打黄维兵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部解决后,徐州敌人也跑不了……在华北方面,傅作义比较聪明,但他的家当只有这么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结果仍逃不出被歼的命运。”

朱老总在三大战役发起前夕和进行过程中,以高超的军事谋略和精妙的指挥艺术对全国各战略区尤其是华北、东北、中原、华东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和战略指导,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怎样发动的

阎长贵



1949年9月21日，刘少奇在全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无数冤案。冤狱遍国中。刘少奇被打倒并迫害致死是最大的冤案。说它“最大”，一方面因为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在党政干部中级别最高，另一方面它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所有被打倒的各部门各地区各级别的党政干部，他们被打倒的主要和基本原因，通通都是被指控“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毛泽

东语），即贯彻执行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被说成是刘少奇在全国党政各部门各地区的“代理人”。梳理刘少奇冤案并分析其历史背景，这是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没法论述刘少奇冤案的全部情况，只说说文革中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我认为，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是1967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如同整个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样，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1967年第5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王力、关锋撰写的《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的本刊评论员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千万不要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传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对这本书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对这本书的批判，也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

这段话不是作者王力、关锋的“理论创造”。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著作权不属于他们。这段话是毛泽东审阅这篇评论员文章时加上去的。王力说：

“四月，主席提出：要开展对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派的大批判。公开提出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戚本禹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原来主席要我写的一篇红旗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配合红旗编

辑部调查员的调查报告的。本来是内部材料,这时主席给王力、关锋写一封信,要公开发表。并且亲笔加了一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题。我原来写的评论没有涉及《修养》,主席看清样时叫加一段。“修养是唯心主义”那一段,这是主席的语录。主席当场口授,我记下来整理打印好再给主席看了,主席说马上发。这是在戚文前一天毛主席公开骂刘少奇。”(见《王力反思录》)顺便说一下,关于这篇评论员文章,王力说是他自己写的,根本不提关锋,对此我存疑,我根据经验,在提到此文时仍把作者说成他们两人——其实,王力本人也说毛泽东就这件事给他们两人写信。

毛泽东在这篇评论员文章中加的这段话,就是1967年对刘少奇大批判总的指导思想和总的纲领。对刘少奇的大批判,拿他的《修养》开刀,也真滑稽!尽人皆知,《修养》一书1943年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此,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不知道吧?把《修养》列为《整风文献》恐怕就是毛泽东提出和决定的——据《修养》最初在延安《解放》杂志1939年第81—84期发表时担任责任编辑的吴黎平说,《修养》经过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给他一信,信中说: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宣布《修养》是“欺人之谈”,“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是历史捉弄人,还是人捉弄历史?(当然,在今天看来,《修养》不论观点内容,还是历史作用,也不是没有可分析和批评的地方,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还说,对《修养》的批判,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内容”。看来,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不仅仅是指“50天”派工作组的问题,而是要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全面清算——我觉得这是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和从思想上批判刘少奇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策略。

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王力曾谈到1967年第五期《红旗》(3月30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

文。该文是戚本禹写的,但不能把它看作戚本禹的个人行为。对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批示:“写得很好”,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毛泽东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戚本禹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评述,在戚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戚照做了。就是戚文中把一个历史人物的名字写错(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毛泽东都提出改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亲自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戚这篇文章逐段地讨论修改。文章点名不点名,点哪些人的名,怎样点,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对邓小平也没有直接点名,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了周扬的名——其实在姚文元的文章中也早点过了。陈伯达主张点胡乔木的名,康生不同意,陈伯达很坚持,江青支持陈伯达,戚听江青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只点姓不点名即写成胡××,这叫半点名。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戚提议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周恩来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文章一类,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戚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戚一眼,戚觉得江青认为他有害怕的意思,戚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戚写的,周恩来决定由戚署名。还有一点,在这篇文章中质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八个问题,原来没有八个,是戚在同林杰、《红旗》杂志责任编辑等共同讨论后增加的。



1980年刘少奇追悼大会上,王光美接过刘少奇骨灰时令人流泪的一幕

这就是戚本禹那篇“著名”的批判刘少奇文章写作和发表的大致情况。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说：“四月一日（按：指戚文在《人民日报》转载的时间——笔者），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总理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江青知道。”（《王力反思录》下第991页）这不是事实。当我近年就这件事情直接询问戚本禹时，戚惊奇而又有点气愤地说：“王力怎么能够说他不知道呢？！……总理主持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他是参加了的。真不知道王力为什么这样乱说，这样欺骗人。难道他真的忘记了？”

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戚本禹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无情

的事实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申辩和参加辩论的权利——他这种起码的权利被剥夺了（只能认罪，不许分辨，是所有政治运动的惯例，刘在台上时，对被整者也同样如此，这正是相同的悲剧不断重演的原由。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刘少奇应造反派的要求书面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时，逐条澄清事实。对于“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回答道：“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样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阅读的其他书籍（按：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时，建议刘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械人》等书——笔者）和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

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加以检验。那时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以上材料参见《刘少奇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7、1059页）

再一篇文章就是王力、关锋撰写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发表于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其内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毛泽东加在红旗评论员文章中的那段批《修养》的话的展开和发挥。发表前，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审阅和修改（还亲自加写了两段话），并指示“小组（按：指中央文革小组——笔者）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322—325页）

关于这篇文章，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通知》说：

五月八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

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通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大破修正主义,大立毛泽东思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196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1951年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翌日《人民日报》在报道亿万军民欢呼《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时候,宣布把《修养》和《武训传》一起抛进垃圾堆!

此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从党刊、党报、军报到遍布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小报,批判刘少奇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1967年8月15日又发表了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文章,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批示是:“此文写得好。”(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7页)

顺便说一下,我也奉江青之命写了一篇批刘少奇的文章,题目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个题目由姚文元改定,原为《资产阶级的战略和策略》,姚文元加了“反革命”三个字),主要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观点,发表在1967年11月13日《解放军报》上(次日《人民日报》转载)。

我没有统计,在1967年(仅仅说1967年)全国各种报纸(包括红卫兵、造反派办的小报)关于刘少奇的大批判文章和报道有多少篇,大概不是几百、几千、几万,而是千万、几千万,甚至更多。对刘少奇的批判来头大,声势大,规模大……堪称名副其实的大批判,“史无前例”的大批判!

再说一些与此相关的事。

首先,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错误”,早在1966年秋冬,中央文革小组就调人成立了一个理论组,成员有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等。这个理论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筛选

编了两卷本《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其次,1967年6、7月,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又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中宣部教育楼召开的,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个单位的代表,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坐满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有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等,“大批判组”成员有十人,具体是:杨永志、廖初江、王道明、阎长贵等。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关锋和戚本禹。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就是在这次成立“大批判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并说是不是称“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渐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简化语。“大批判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我因为担任江青秘书,工作太忙,没参加它什么活动。“大批判组”成立后组织写的第一篇文章,可能就是前面说的毛泽东批示“此文写得好”的那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1967年,陈伯达、康生、江青反复鼓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仅举江青讲话中几例——1967年4月20日,她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说:“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9月1日,她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全北京市“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臭,从各条战线上把他们一系列政治纲领批深批透批臭……要批得比当年苏联托洛茨基还臭。”9月5日,她在接见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江青这几段话很重要,它不仅明确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意图,也反映了当时对批判刘少奇的要求和大批判运动的实际情况。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邹鲁风调查人民公社之祸

• 李震中

一个真实的故事

1958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校领导商定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目的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要求写出调查报告、论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两校抽调教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学学生共162人,组成三个调查组分赴河南信阳、鲁山、河北藁城等县,进行为期半年的调查研究。1959年5月调查结束,人员返京后集中在北京大学,继续做好后期工作:撰写调查报告、讨论研究重点问题、写出论文。7月调查组的工作顺利结束。

1959年8月,风云突变。北京市委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部署反右倾机会主义,一开始就抓住了调查组这个送上门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可以说这是北京市反右倾斗争中一桩最大的案件。于是,集中力量对调查组的一些成员(主要是对领导成员)开展批判、斗争。一开始,调查组总领导人邹鲁风(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时已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自杀身亡。斗争愈加激烈了。小会斗争,采用对敌斗争方式、审讯式的斗争,甚至训斥谩骂,如“没有出息”、“没有良心”、“丧心病狂”、“花岗石脑袋”等等。大会批判,批判者都是宣读经过党委审定的稿子,其用语力求尖刻,不讲道理,给人扣上许多耸人听闻的大“帽子”,如“反对、否定、攻击、诋毁、诬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全面、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等。这些大会批判材料都已存入被批判者的档案。这种批判斗争一直持续到1960年上半年。

批判完了组织处理。调查组成员中受重点批判的42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9人,定为

严重右倾的11人。其中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有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有降两级工资的,也有被开除党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据说,以上处理已经是宽大为怀了,贯彻了“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方针。

这期间,人民大学党委决定,命全体调查组成员(不包括北大师生)返回原调查地点,重新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说是“在哪里跌倒的在哪里爬起来,在哪犯的错误的在哪改正”。信阳调查组于1959年底重返信阳,名为调查,实为劳动改造。然而最不幸的是,正好赶上“信阳事件”的灾难,很多农民被活活饿死。然而,此时人民大学调查组对于饿死人的事,甚至自己挨饿、吃树根、浮肿却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写调查报告,依然要大讲人民公社优越性、公共食堂好。这种调查报告,居然受到了表扬,因为这是执行正确调查路线的成果。

1960年上半年,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总算告一段落了。1961年初,北京市委认为对人民公社调查组的批判搞错了,指示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党委给调查组甄别平反。1961年上半年,学校党委为受批判、受处分的同志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这个戏剧性的故事是怎样的一个具体过程呢?

从《内部参考》说起

1959年8月2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了题为《北大、人大部分师生诋毁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摘要如下:

新华社北京24日讯 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财经、哲学和法律等系的师生一百六十二人,在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期间,曾分别在河北省

的藁城、河南省的鲁山、信阳等地的人民公社中进行了调查。他们在陆续写出的一百八十万字的调查报告中,共提出四百八十五个问题。其中一部分人通过质疑的方式,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1958年的大跃进,有的人甚至进行恶毒的攻击。

不顾事实的否定建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

他们的第一个错误论点是,全国并不存在普遍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

第二个错误论点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根本原则。

第三个错误论点是,组织农业大协作并不一定要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因而人民公社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第四个错误论点是,公社的建立是否与公社化前的反右倾保守有关?这是否是有的地区怕“右倾”才不顾条件建立公社的?

闭着眼睛胡说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

他们错误地认为公社体制改变(改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后,同过去的高级社已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狂妄问:公社是否已名存实亡?究竟当时有没有建立公社的必要?“政社合一”的优越性还有多少?“政社合一”的结果是否会产生消极作用?他们还恶毒地说:目前群众生活水平比公社化以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有的地方连粮食半供给制也实行不了。有的地方吃饭就占去分配的70%以上,工资发不出。这怎能说实行半供给制半工资制有了条件?因此,他们得出的谬论是,从发展上看,供给制未必是方向。

狂妄地认为不应当反对右倾保守思想

他们狂妄地问:今春在农业战线上思想斗争的主要锋芒是什么?谭震林同志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文章说:“当前斗争的锋芒主要还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有些人竟然反对这个意见,认为主要的斗争锋芒应该反对浮夸、反对脱离实际、反对不尊重老农经验等。

他们诋毁1958年党指导下的伟大的运动。他们说,去年有两股风:一是共产风,一是大炼钢铁风。这二股风是在什么情况下刮起来的?它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是什么?是否代表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他们进而攻击党的正确领导,追问: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他们诬蔑党不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缺点,说:无论上边或者下边,说起来总是:“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次要的”,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这样,就忽视了对缺点的认真检查和严肃对待。

《内部参考》发表后,首先惊动了吴老(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他最早看到这篇文章,并亲自找胡锡奎(人大校党委书记、副校长)询问。胡事先对发“内参”的事一无所知,看了《内部参考》后,和聂真、李培之两位副校长一起找三位调查组组长查问。三位组长看了《内部参考》后,估计文中所列的言论可能是从《问题汇编》中摘录的。如果是这样,认为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经过讨论都已经解决了。组长们做了解释,没等话说完,党委书记发火了,不容说明,责令检讨。此时,李培之副校长插话说:你让他们把话说完嘛!调查组长们为难了,不知如何检讨。

《内部参考》上发表的这篇稿件是谁提供的呢?他们提供这篇稿件的背景是什么?

上面提到《内部参考》的文章是根据调查组的《问题汇编》加工编纂的。

《问题汇编》是怎样写出来的呢?

1959年5月,人民公社调查组返校后,根据工作安排集中做两件事:一、写好调查报告;二、研究讨论,写出论文。以此成果向国庆10周年献礼。研究讨论些什么问题,首先由大家提出,这样每个人提出认为应当研究讨论的问题。调查组把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分类归纳,当时叫梳辫子,然后油印了若干份,供研究讨论用。同时,把印好的《问题汇编》报送两校党委。北京大学的陆平、邹鲁风和中国人民大学的胡锡奎、聂真手中都有《问题汇编》。报送校党委的同时,也报送了市委;市委有三个调查组的共三本《问题汇编》。这是1959年6月初的事。

《问题汇编》纯属是为调查组内部研究讨论编辑的。在此期间(1959年6月至8月上旬),两

校党委和北京市委对《问题汇编》从未提出任何问题。

北京市委6月初拿到人民公社的调查材料以后,作为纠正大跃进中出现偏差的材料加以摘编,当时他们认为这个调查材料是积极、正面的。然而,庐山会议以后,他们对这个调查材料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把这个调查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还作为批判靶子送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本来,在组织考察团下乡的时候,人民大学的胡锡奎、聂真和北京大学的陆平都认为大跃进太“左”了,应该适当纠正,组织考察团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事实向上级报告。现在全党反右倾,他们又联合起来,说考察团的目的是为了调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而邹鲁风却让考察团去挑毛病,写了那么多的“罪恶材料”。

1959年9月2日,北京市委为贯彻中央“庐山会议”精神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刘仁作传达报告,他在讲到北京市情况时,点了调查组的名。刘仁说: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调查组写了180万字的《调查报告》基本上是反对人民公社的。

临湖轩汇报会

1959年5月,人民公社调查组回京后,两校党委提出要听取调查组各组的工作汇报。于是决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汇报会。听取汇报的有: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副校长、副书记邹鲁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科研处长张腾霄。原定市委领导同志杨述来听汇报,后因故未到,委派市委干部李开鼎参加会议。汇报会由陆平主持。第一次汇报是1959年6月19日,由信阳调查组组长薛政修(即李震中,人大经济计划系主任)汇报,第二次汇报是藁城组组长韩铭立(人大法律系副主任),第三次汇报是鲁山组组长马振民(北大法律系主任)。汇报的内容本来都有会议记录,遗憾的是这些记录已无法查找了。好在听取汇报的都或多或少地做了笔记。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聂真笔记本上的记录。按原件照抄如下:

(信阳调查组汇报)

共55人(调查组全体人员),(调查)时间5

个月。搞粮食问题,把瞒产私分说成敌我矛盾,两条道路斗争。干部与群众斗,党员与党员斗。说是1957年(右派)向城里进攻,1958—1959年向农村(进攻)了。在农村掀起东风压倒西风的运动。(后来省委赵文甫在电话会议上指出粮食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才明确了)政治上损失很大,对党的影响很不好。

公社成立后,对高级社的一切都否定了。懂得了价值规律和理论的重要性。以后应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讲课必须联系实际。

虽然缺点是严重的,但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是明确的。看问题能抓住主流、本质。

调查研究要和工作尤其是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调查和研究在过程中要结合起来。

调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阶级路线。否则不能得到真实情况。鸡公山公社的4.8万斤的“卫星”,我们发现周围公社(应为生产队)账上都有“付‘卫星’股(谷)”一项支出。公社党委、支部书记都说是真的,都是老实同志。(苏联《消息报》要登)经过几次动员才都说(不)是真的。最后群众说你们来得真好,不然毛主席还不知道真情况。

当时知道真实情况,因为高压空气在未敢说,怕什么,怕撤职。事后才说。县委说你们的话说得太晚了。还有关系问题不好搞。

明港公社(有的)说真话的被插白旗,说假话的插了红旗。李寨家铁厂说了真话(先进的)插了白旗,书记含着眼泪接了白旗。

弄成谁(说)老实话,谁就是算账派。开现场会议,古店大队报了30万斤,是国库的粮食,当作自己的粮食。杨河公社逃出去200多人,一天只吃6两粮食,元宵节那天(70多个食堂)停伙,无法吃饭,公社党委也不敢报告,县委也不敢向上报真的,怕戴右倾帽子,六级干部会前,没有吃的(都给粮食),一面吃饭,一面搞粮食。(六级干部会后,问题基本解决了。)

收获

1、信阳4个月生产好铁1200吨。跃进中革命干劲很大,带动工业发展很快,修了公路,办了很多工厂,粮食增产40%,总产值5.8亿元。公社成立后,三个月中每天吃三顿干饭,还加夜餐,群众对公社很满意。

2、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看到

了规律,知道社会科学确实是科学。刮共产风时,群众说:一双筷子一个碗,叫往哪搬往哪搬,到处都在干,就是不出活。搬运工人收入大减,理发员也是不积极,吃饭占很多时间。过去,老头一天让他放一头牛他不愿意,嫌少。现在让他放,他不放,说我要进养老院了。一搞评工计分都觉悟起来了。证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异想就能天开等说法的错误。

证明老百姓不愿意说假话,基层干部不愿意说假话,真正愿意说假话而骗取荣誉的是极少数。毛主席六条指示传达后,群众感动得难以用语言形容。应用此整一次风,分析一下虚假的原因,以免今后再犯。

不敢坚持真理,有思想方法问题,也有思想意识问题,怕自己吃亏,不敢坚持(真理)造成对党不利。

学校看文件太少,知道政策太少,很不及时。

鸡公山 1957 年砍树 12000 立方米,58 年砍 22000 立方米,用的最多的是炼钢铁了。17 部解放式水车也“抗旱”(指炼铁)了,采购站新水车也“抗旱”了,有的农具(双轮双铧犁)也“抗旱”了。

1958 年两件事,一、大炼钢铁,二、刮共产风,使 58 年大跃进损失很大。

研究:认为公社实行供给制对发展生产不利,但应如何实行供给制。

临湖轩汇报会是严肃的,但听汇报时,可以插话,或提出一些问题,或表示一些看法。例如,当说到“五风”问题时,有人问李开鼎,北京的情况如何?李介绍了北京发生的共产风情况,并说情况差不多。又如,当说到公社化遇到的问题时,陆平说了“马行夹道,难以回马”的名句。两校党委听了汇报,对调查组的工作是肯定的,也是满意的。市委代表李开鼎听了汇报,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表示过异议。

后来,在反右倾批判调查组负责人时,学校党委从临湖轩汇报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搜罗一些材料,大批特批。

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批判邹鲁风的时候,还捏造了一个罪名,说邹鲁风等下去调查之前,人大、北大党委有一个关于下去考察的决定:“调查人民公社的优势性。”邹鲁风下去以后“篡改党委决定”、“背着党委搞反党活动”,这个罪名就大



邹鲁风(1910—1959)

了,这大概是逼得邹鲁风自杀的原因。1962 年对这个案件甄别时,发现两校党委根本没有这个决定,是为了推卸责任凭空捏造的。捏造这个决定的是北大、人大、北京市委三家合谋的。

历史故事的启示

通过翻腾这些老账,可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我感受最深的有两个问题:一是科学与民主;二是学术与政治。

(一)科学与民主

科学与民主是一个老话题。从“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了。科学就是实事求是,民主就是畅所欲言,从调查组这个故事里看出,科学与民主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

前面提到的信阳事件,发生在 1959 年 11 月至 1960 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了 100 多万人。死人原因有人说是天灾。天灾、粮食歉收,这是事实。可是饿死人是在粮食刚刚收获之后。而大量死人则是在春节前后。这是为什么?历史上闹饥荒是在春天青黄不接之际,哪有刚打下粮食就饿死人的道理。也有人说,由于高估产、高征购、征

了过头粮。这也是事实。但是,征了过头粮,征购透底,也不会饿死人。因为一但发现食堂没有粮食开不了饭,就应该立即返销粮食给农民。怎么会眼看着把人饿死呢?这些理由似乎都不能成立,那么悲剧是怎么发生的呢?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被摧毁了。

实际上,1959年春季已经出现闹粮食问题。但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反“反瞒产”,弄得和农民基层干部的关系相当紧张。1959年3月9日,河南省委发出一个《特急电报》给各地、市、县委并印发到公社、大队。实事求是地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闹粮问题。

1959年8月,中央“庐山会议”以后,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浪潮。形势急转直下。大反右倾的后果,是干部、群众都不敢说真话了。明明征了过头粮,不仅口粮甚至种子粮都被征购了,谁都不敢说没有粮食。饿死人不能说饿死的,只能说得瘟疫死的。生产队不敢向公社说实情,公社不敢向县如实报告。谁若说了实话,必定遭到灭顶之灾。轻者挨批斗,重者遭拘留、逮捕,甚至被毒打致死。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可是这个地方的干部、群众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民主可言。

从信阳事件的实际过程来看,“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就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其实,不止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也封住了全国人民的口。从此中国大地静悄悄,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然而,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也就在这静悄悄中空着肚子离开了人间。鸡公山公社旗杆大队一位农民,饿倒了,已经奄奄一息还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吃干饭,我想吃干饭……”直到闭上眼睛,断了气。黄湾大队在食堂做饭的两位妇女。一位妇女的丈夫在大队当会计,没有被饿死。可是她的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孩子临死的时候叫着妈妈说:“我要吃饭。”妈妈没有办法,眼看着孩子慢慢地死去。调查组的同志问这位妇女:“你们大人没有饿死,怎么把孩子饿死了?”她说:“大人什么都吃,孩子不吃。”另一位妇女怕把孩子饿死,抱着孩子从李家寨上了火车。把孩子放在火车上,自己到下一站含着眼泪下了车。孩子被火车拉走了。要帮她把孩子找回来,可是她说,别找了,找回来也要饿死。调查组的同志

无话可说了,默默地掉下了眼泪。饿死人的事不止信阳有,别处也有。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开始让人们说话,因而才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认识。不过花的代价太大了!

调查研究其本意就是如实反映客观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个前提条件,这就是正常的民主制度。不然,调查研究的本势必被扭曲。人民公社调查组前期说了真话、实话,遭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后期“戴罪”又去调查,亲历信阳事件,不能反映实情,说了假话,受到表扬。这个惨痛教训是不该忘记的。

(二)学术与政治

学术、政治这两个概念的涵义辞书中写得清清楚楚,两者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搅和不清,分辨不明。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更是难解难分,常常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

人民公社调查组既不是决策机构,也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一群书生对公社化运动进行调查,关起门来研究一些问题,不求别的,只求理解。即使研讨的一些问题、发表的一些见解非常幼稚甚至不合时宜,也无关紧要。况且经过实际调查提出了一些值得研讨的问题。这些问题即使在当时也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就以《内部参考》所列的那些问题来说有许多是值得研讨的,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阐明。作为高等学校,师生们研讨一些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本是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提倡和鼓励。事实上,人民公社调查组在1959年5月返京以后,学校党委还是这样做的。当时研讨问题,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出现乱扣帽子的现象,都是以理服人,树立了比较好的学术风气。可是“反右倾”一来,学术风气一扫而光,骤然变成一场政治风波。正常的学术活动,一夜之间变成反对人民公社的政治事件。这样一来,不仅毁掉了调查研究的可贵成果,而且还打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高等院校中混淆学术与政治的典型事例。历史经验:在学术领域应当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新见解、新观点。这不仅有利于发展学术,而且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条件。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吴思)

我随柬共上山打游击

• 左 毅

那是1979年2月9日深夜，即越南大举入侵柬埔寨47天后，也就是在越军占领柬埔寨首都金边一个月零两天，柬埔寨共产党残存的武装力量躲到深山老林的时候，我们8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共产党联络组，乘坐泰国军方提供的卡车，从泰国首都曼谷，来到泰柬边境重镇亚兰。随即，徒步穿过亚兰附近的丛林，用美国兵在泰国用的那种背囊，背着工作和生活必需品，迎着柬埔寨境内不时传来的隆隆炮声和冲锋枪声，在柬共黑衣战士的指引下，深一脚浅一脚，趟在泰柬边界小河的河水中，朝着柬埔寨西北部热带丛林前进，即将开始我们与柬共一起打游击的艰难岁月。柬共，即国际舆论界普遍称之的红色高棉。

临危受命 自我反省

1978年12月25日，越南打着柬埔寨民族爱国阵线和韩桑林的旗号，大举入侵柬埔寨。在此之前，越军频频骚扰柬埔寨边境，红色高棉电台则是几乎天天捷报频传，宣传胜利。越南大举入侵没几天，红色高棉就感到形势危急，大势不妙，于12月30日通知我驻柬使馆尽快撤离金边。红色高棉对越南大举入侵估计不足，我驻柬使馆受红色高棉报喜不报忧的影响，对局势的剧变也缺少必要的应变措施，有些手忙脚乱。

使馆接到柬方撤离通知后，立即请示外交部，作为新华社金边分社负责人，我也随即请示新华社总社。国内指示，使馆成立精干的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共产党联络组，孙浩大使为组长兼党委书记，继续留在柬埔寨工作，使馆绝大部分人员和各个援柬专家组撤回国内。我也接到总社指示，留在柬埔寨，参加联络组，坚守岗位。

红色高棉夺取全国胜利后，全国民用通讯设施全部瘫痪，也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更没有出租车，几乎没有商业活动，没有饭店，简而言之，离开红色高棉组织，任何人都寸步难行。在这种情况下，使馆无法直接通知分布在柬埔寨各地的中国专家组数千人撤离，只有委托柬方通过其内部渠道予以通知。

孙浩大使作为驻柬外国使团团长，在这一极为特殊时刻，还要与其它驻柬使馆进行联系。老挝大使在撤与不撤离金边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估计是在等其国内决定。直到1979年元旦凌晨一点钟，老挝大使才说，他们留在金边，不走了。这时，我们的车队才离开金边，向柬埔寨西北部靠近泰国的马德望市驶去。

从金边到马德望市的公路，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坑坑洼洼，只有一辆载着发报设备的吉普车翻到路旁沟里，好在人没有大碍，在当天下午两点以后，陆续到达目的地。这时，大家至少两天一夜没合眼，人困马乏，饥肠辘辘，但没人休息，有人忙着架天线，有人忙着安装电台，有人忙着兜情况，有人忙着起草电报，向国内报告事态发展。

1月5日上午，柬方又说，形势好转，要返回金边。午饭后，我们就原路返回，当天晚上回到金边。行李还没有卸下，柬方又说，越军正分三路向金边逼近，使馆还要从金边撤离。第二天，即1月6日，有一趟民航班机从北京飞来金边，使馆就安排大部分使馆人员和一些专家组的人员，乘坐这趟班机撤离金边回国，其中包括新华社分社的晏明、刘宪生和蒋顺炳。多年以后谈到这次撤离时，晏明告诉我说，他到波成东机场后，西哈努克夫妇站在室外，没有人陪同。西哈努克看到晏明就打招呼，与晏明拥抱，晏明才把西哈努克夫妇请

到我民航办事处在波成东机场的办公室坐下候机。罗马尼亚大使来到机场,也要走,但300人左右的座位已满,又给这位大使挤出了一个座位,飞机才起飞。

1月6日下午,送走飞往北京的这趟班机后,使馆留守人员和几个专家组就第二次从金边撤退,1月7日凌晨撤到马德望省诗梳风,靠近柬泰边界。接着,就传来金边被越军占领的消息。从越南大举入侵到首都金边失陷,不到半个月。全国城镇和交通干线相继落入越军手中,我国援助柬共的大批军用和民用装备、物资,成了越军的战利品。

1月7日晚,孙浩大使让我以使馆名义起草电报,他审签后即刻发给了国内。这封电报的中心意思是,柬共夺取全国胜利后,打击面太大,失掉了民心,如果不改弦更张,再难以取得胜利。这封电报发出后,很快得到国内电报指示,联络组暂时撤到我驻泰国大使馆待命,伺机再返回柬埔寨,担负起中共中央与柬共中央的联络任务。1月8日,经过与泰国有关方面的紧急交涉,我驻柬使馆留守人员和各个专家组数千人,从柬埔寨波贝小镇,跨越柬泰边界桥,进到泰国东南的亚兰,红色高棉一些官员和士兵也逃到泰国。亚兰这个边境小镇,一下子也紧张、喧闹了起来,荷枪实弹的泰国军人和警察随处可见。

在我驻柬使馆和泰方的帮助下,我驻柬使馆预定参加联络组的10个人,乘车前往曼谷待命;使馆其他人员和援柬专家组数千人,则乘车前往海港城市桃梭邑,准备乘船回国。

曼谷待命 顾全大局

从1979年1月8日撤到泰国,到2月9日迎着难民潮重返柬埔寨,联络组在曼谷待命一个月期间,就我自己来说,天天度日如年。为何?是不是贪生怕死?坦白地说,怕,因为没到那一步;我也很坦然地说,不怕,到了那一步,作为以忧国忧民为特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会议无反顾,把牺牲作为荣誉,把死亡作为奉献。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那一步”的是与非的判断。

红色高棉时期,我先后4次随团组短期出访柬埔寨,后来又常驻。耳闻目睹,使我对红色高棉

的内政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常常把它与我国的“四人帮”划等号。这又与毛泽东及当时中央对红色高棉的正面评价,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使我充满着惶惑、疑虑、焦灼、担心和痛苦。

就红色高棉的内政来说,它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就三管齐下,一是大撤民,打击了绝大多数柬埔寨人;二是取消货币和商品,一下子使柬埔寨倒退到原始氏族社会或奴隶制社会;三是搞肃反,结果扩大化了,大伤自己的元气。三管齐下,等于红色高棉三大癌症并发。

一,大撤民,打击了绝大多数柬埔寨人。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打下首都金边后,随即就以美国要轰炸金边为由,连哄带吓,将金边市的200多万人全部驱赶到农村。接着,全国县城和县城以上的城镇居民,全部被赶到农村,老、弱、病、残、孕也不例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或者民怨沸腾,或者怒火憋在心中。昔日号称东方“小巴黎”的金边已成为一座鬼城,昔日繁华的街区空无一人,大白天比北京深夜任何一个街道还要静。一座座豪华的小洋楼空荡荡的,杂草丛生,有的地方陈旧的血迹还依稀可见。在院落中、马路旁打开的皮箱,积满了雨水。民主柬埔寨通讯社附近,在一座被红色高棉炸毁的金边市最大教堂原址上,瓦砾成堆。朗诺时期的货币瑞尔被风一吹,在空中飞扬。穿着黑色衣服的红色高棉战士,懒洋洋地,坐在十字路口的椅子或沙发上,冲锋枪放在一旁,用刺刀作螺丝刀,摆弄着照相机。挂着中文招牌或贴着中文对联的住宅,房在室空。我驻柬使馆的一位老同学,曾陪我进入一座别墅看了看,大理石的地面上血迹斑斑,它的主人是福建籍陈姓华人。一天,一位华裔翻译指着民柬通讯社院内一片长得油亮油亮的香蕉林,悄悄地对我说,金边一解放,红色高棉就发布通告,说朗诺时期柬通社的职工,某月某日某时到某处报到,给安排工作。信以为真的人来到这里,被冲锋枪统统打死了,就埋在这片香蕉林下。不相信的人,躲过了这一劫,随后就被赶到农村去了。据说,我的老师、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过教的柬埔寨专家陶陶萨,就是在大撤民中死掉的。

西方舆论说红色高棉杀死了200多万人,我认为,在大撤民过程中,被枪杀的加上饿死病死

的,有170多万,对于总人口600万人的国家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在大撤民中,由于缺医少药,再加上粮荒,柬埔寨又处在热带,多发病多,传染病多,饿死病死的人不在少数。我们中国人作为专家,又在首都金边,每天都吃不饱,使馆经参处从国内调了不少压缩饼干,分给各个专家组充饥。柬埔寨老百姓的饥饿状况,就可想而知。

首都金边,另一个直辖市磅逊市(西哈努克港),再加上19个省会城市,其人口总数就占全国当时总人口600万中的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全国县城居民,大撤民中打击的人数,至少占全国总人数的80%以上。

二,取消货币和商品交易,使柬埔寨社会大倒退。

据说,红色高棉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请我国帮助印制了新的柬埔寨货币瑞尔,准备在掌握全国政权后发行。政权到手后,朗诺时期的货币作废,成了废纸,持有旧币特别是持有较多旧币的人,能不骂娘?新的货币又不发行,等于没有了货币。没有货币流通,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

我作为外国人在柬埔寨工作和生活,感到十分别扭。我在1976年3月到11月在援柬通讯专家组工作时,所需生活用品是托人从北京带去的。1976年12月到1978年1月,我先后随同穆青、陈永贵和邓颖超三次访柬,要买点纪念品,无处可买。取消了货币和商品后,就没有了商店、饭店、邮局、电话局、电报局和公共交通工具等一系列当代人赖以生存和交往的最基本条件。这样,柬埔寨民众就处在红色高棉的严密控制之下。每次随代表团参观访问农村、盐田时,看到数十人数百人集体劳动,还整齐地排着队、喊着号子或唱着歌,我就想起我们的人民公社。我国人民公社时期,还记工分,农民都出工不出力,柬埔寨连



本文作者在吊床上休息(摄于1979年4月)

工分都不记,记也没有用,劳动和工作效率就可想而知。

三,肃反扩大化,大伤红色高棉的元气。

红色高棉开展肃反,殃及无辜,使红色高棉乱了自己,伤了元气。西哈努克时期三位著名的左派大臣乔森潘、符宁和胡荣都是柬共党员,在柬埔寨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具有很高威望。但在肃反运动中,先是胡荣被定为敌特,销声匿迹了。接着,又是符宁被定为敌特,也销声匿迹了。乔森潘在肃反运动中虽然没有销声匿迹,但在柬共中央,他不是常委,头衔是国家主席团主席,没有决策权,只是红色高棉打出来的旗号。在中国党政代表团1978年11月访柬时,柬共中央常委、政府副总理温威孚乎寻常地没有露面,也销声匿迹了。这些人的销声匿迹,就意味着被秘密处决。在越南扶植下,后来推倒红色高棉政权的韩桑林和洪森等人,也都是在红色高棉肃反时逃到越南的红色高棉中高级干部。

四,外交政策失当,国际上声名狼藉。

红色高棉在1975年4月夺取全国政权后,在外交上一面倒,倒向中国。他只接受中国援助,不接受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而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前后,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还是尽了极大的力量帮助红色高棉。驻柬使馆的朋友告诉我说,红色高棉全倒在我们身上,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沉重负担。高峰时期,我援柬工程技术人员达到数千人。尽管如此,红色高

棉对我们也疑神疑鬼。孙浩大使对我说,中柬关系存在着阴影。在柬埔寨的华侨和华人很多。在大撤民中,华侨和华人也被驱赶到了农村。我们支持柬埔寨的理由之一是越南排华,实际上,红色高棉排华远远超过越南。我国对红色高棉的排华行为采取了忍让态度。这样,就导致在柬埔寨以及逃到第三国的华侨和华人,见到中国大使馆人员或其他中国人,就大喊大叫赶快救他们,或怒而骂之。为了不引起红色高棉更多猜疑,我们在柬的工作人员尽量避免与华侨和华人接触,这也导致华侨和華人对中国的不满。

1979年5月,我一到北京,新华社党组书记、社长曾涛主持党组会,听取了我的工作汇报。社长秘书吕金铃告诉我,新华社党组全体成员开会听取一名驻外记者的工作汇报,在他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由此可见,中国当时对柬埔寨问题是多么关注。

在泰国待命期间,柬埔寨难民像潮水一样涌入泰国,而联络组要根据国内指示,随时准备重返柬埔寨。这时,联络组党委重点抓了形势分析和生死观教育,组织大家学习了邓小平与英萨利的谈话。这个谈话的大概意思是,寄希望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后,柬共团结人民重新夺取胜利。

经过反反复复和痛苦艰难的思考,我对面临的形势得出了如下看法:在越南入侵、促使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以后,柬共政弦更张,重新赢得民心看来很难,人民恐怕不会再给它机会了。柬共在国际上声名狼藉,除了中国,不会得到支持的。红色高棉很可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但我们还是要扶一扶。当时,以越南排华为导火线,引起中越关系恶化,我驻柬使馆留(金边),不能留,走(撤馆),也不能走。我们当时对周边形势的判断:我国北方有“大霸”(苏修),南方有“小霸”(越南)，“大小霸”企图对我国形成南北夹击,而我国要挫败这一图谋。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中国共产党与柬埔寨共产党联络组,进入柬埔寨丛林,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这样思考后,我的心情坦然了许多。

重返柬埔寨, 历经艰辛

原驻柬使馆在曼谷待命准备重返柬埔寨的10位同志,绝大多数同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精神状态好。机要员王永元体质较差,联络组党委考虑调他回国,但他表示一定要去,并从思想上作了最坏的准备。但也有两个年轻人退缩了,坚决不再进入柬埔寨,给处分也认了。联络组党委报请国内批准,对联络组班子作了调整。调整后,在曼谷待命的10个人中的4人作为联络组成员,他们是:孙浩大使、大使翻译付学章、机要员王永元和新华社左毅。从国内新派来4人:机要员郑剑峰、报务员马恒越和祁灵恩、解放军总医院医生潘家钦。除了孙浩大使、付学章和我之外,其余5人都是军人。新来的同志从国内带来了两部电台、两台发电机、一副天线和专用密码,在曼谷采购了一些工作和生活必需品。1979年1月9日,离开曼谷去往柬埔寨之前,我国驻泰国使馆沈大使为联络组饯行。喝了沈大使的茅台酒,我们一行8人就上路了。

2月9日进入柬埔寨后,联络组就在绵延数百公里的豆蔻山脉热带密林中工作和生活。从2月9日到3月26日越军大扫荡之前,我们先后在3个宿营地呆过。这3个宿营地,有临时搭建的草棚,草棚里有竹篾编制的床。

每到一宿营地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树林中选择适当的地点和角度,把必砍的树砍掉,把旁边碍事的树枝折断,开辟通道,上树架设天线,安装电台,支起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屏蔽小帐棚,以保持与国内电报往来的畅通。

我们住的草棚,没有四壁,昼夜温差在15度以上。晚上就寝,汗流浹背,难以入眠。半夜过后,寒气逼人,冻得直打哆嗦。由于考虑到要经常行军转移,我们带的东西有限,一人平均不到一条毛毯,柬方也没有提供任何卧具,好在我们8个人睡的是通铺。柬方战士冻得起来烤火,我们躺在床上听炮声。孙浩大使50多岁了,有寒腿病,冻得夜里抽筋,还有的同志有关节炎,受寒后病情加重。天天听到炮声,有时听到枪响。天天忍受着饥饿、虫叮、蚊咬、苍蝇爬。一日两餐,脸有菜色,饿得没有办法,我们吃到了象肉、穿山甲和巨蜥。象肉粗糙,无味,像糠窝窝头一样。而象鼻子味美,很香,非常好吃。晚上,穿山甲会跑到我们床边,用棍子一捅,不管捅到它什么部位,它都会

用四肢把自己的头抱住,卷成一团,我们就把它抓住,成为美餐。

自3月27日起,由于越军大扫荡,我们被迫转移,天天翻山越岭,途中又突破包围,到4月11日在柬泰边界附近,与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告别,度过了有惊无险的16天。

28日上午,我们正准备发报,柬共中央常委、负责外交的副总理英萨利匆忙赶来,通知我们敌情严重,迅速轻装转移。这时,柬外交部接待我们的敦,带领一些战士去找大米,还没回来。英萨利着急,顾不上外交礼仪,粗声粗气地说:“不能等,立刻转移!”外交部另一名干部说:“赶快走,不然就会被越南人打死。”我们在炮声轰鸣中,坚持向北京发完电报,急忙拆天线,赶紧收电台,利落地折叠好小帐棚,麻利地装好自己的背囊。为了轻装,把从曼谷带来的蚊帐也清理掉了。事后得知,我们这个山洼宿营地背后的一座大山,在30日被越军占领,我们仅比越军到来提早一天离开,险些被抄了后路。

3月29日,我们在行军途中,与英萨利汇合。英萨利给我们每人一支高丽参,让我们含在嘴里,然后继续向南转移。英萨利告诉我们,越军分三路正向这一带扫荡,我们处在西路和中路的包围之中,争取突破包围,柬共中央决定,中央领导人分散活动,他同我们在一起,向南再向西转移,目的地是柬泰边界。他还说,这次转移需要三、四天,带了4天到一个星期的粮食。英萨利的这一通报,意味着对柬共来说,形势更加严峻了。我们和英萨利向柬泰边界转移,是做两手准备,联络组能留则留,不能留就撤到泰国,英萨利很可能同我们一起撤到泰国,继续争取中国和泰国的帮助和理解。晚上宿营,我们立即架设天线向国内发报,汇报英萨利在行军途中谈的情况。30日天一亮,我们继续转移。

在行军转移中,除了粮荒这个难题外,就是水荒。一天行军下来,汗水湿透了衣服。晚上宿营时,脱下衣服拧出汗水,或挂在树上晾干,或穿在身上靠体温熏干,和衣而睡。身上各部位散发的臭味,大家都习以为常。在宿营地一般都能找到水,但有限,每人装满一个军用水壶就不错。早晨起床后,含一口水嗽嗽口,吐在手上搓一搓,就算洗了手,再往脸上抹一抹,就算洗了脸。途中午休

时,如果找不到水,就得不到补充,整个下午就没有水喝,天又热,汗又多,精疲力竭,口干舌燥,喉咙冒火。

4月3日,在我们前边两公里的地方,发现了百余名敌人。为了摆脱这股追兵,我们马上改变了原来设想的行军路线,由向南改为向东,翻过几座山后,继续向南,绕过了这股敌人。事后英萨利说,这股敌人本来是追击我们的,被我们甩掉后,盯上了正在撤退的他的夫人英蒂丽等百余人,有两名战士被打伤。

4月7日出发后,英萨利告诉我们,前边是开阔地带,可能遇到三种情况:一是遇到土匪,就把他们干掉;二是遇到越南人阻击,就尽量避开;三是遇到自己人,在未搞清之前,只好绕道。结果,开阔地没有,却越走山越高。英萨利也感到迷惘,身边没有向导,只有地图,怀疑指南针失灵了。从当前局势判断,柬共中央和我们联络组与追击我们的越军,形成犬牙交错状态,只因为在高山密林中,谁发现谁都不容易。于是决定,不能停,继续往前走,随时准备打遭遇战。

4月8日中午,我们来到一个地方,往下一看,深不可测,可以用“万丈深渊”来形容,我们就处在悬崖顶上。英萨利说,我们要下去。一听,我真有些发怵,但不能、也没有“退堂鼓”可打。只好抓住陡壁上的小树艰难地爬了下去。悬崖脚下,有一条小河。小河流水潺潺,清澈见底。我们跳进河里痛痛快快地洗澡,汗臭、臊臭和脚臭随流水而去。顺小河一望,不远处,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副书记农谢和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也在小河水里洗澡。

撤离柬埔寨 再入泰国

4月9日上午行军途中,英萨利突然从前边转回,告诉我们,前边发现“土匪”,让我们就地待命,停止前进,嘱咐我们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中国同志要有一定的战斗力。我们马上选择有利地形地物,双手握起冲锋枪,打开保险,随时准备战斗。快到中午,英萨利过来说,遇到的不是土匪,而是从格罗纽河区域撤下来的柬共中央部队和机要人员一千余人,还找到了边界哨所一个交通员。他还说:“下午五点就可以到达边防站,

五点半就可以进入泰国。”我们立刻架设电台，向国内报告。国内指示，柬共中央接待联络组已成为沉重负担，同意联络组撤离柬埔寨进入泰国。

在3月29日与英萨利汇合后，他告诉我们向柬泰边界转移，有三、四天的路程；4月3日他还说，有一个星期的路程；4月8日他说，还有三、四天的路程；4月9日中午说，“今天五点半就可以进入泰国。”但到9日下午6点，还没到达目的地，只好宿营。不过，从4月9日下午开始，我们总算走上了可以称之为路的森林之路。

4月10日中午，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副书记农谢和中央常委英萨利，在湄南河上游河床的大石板上，接见了孙浩大使，交谈了工作。乔森潘坐在不远处的石板上，与人聊天。波尔布特说：“我边走边想，在外交史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大使同驻在国人民一道，翻山越岭，走过深山老林呢？”

4月11日下午1点20分，波尔布特、农谢和乔森潘与我们紧紧拥抱，依依惜别。我们噙着泪水，挥着手，感慨万千，向边界小道走去。英萨利和外交部的几个干部，与我们同行。

在红色高棉接待我们力不从心，已经成为他们的负担的时候，我们就离开柬埔寨热带丛林。

与红色高棉几位主要领导人分手后，英萨利陪同我们向柬泰边界走去。

没走多远，放眼一望，透过树林，我们不由自主地叫起来：“啊，大海！”我们从柬埔寨西北入境，穿越了柬埔寨的原始森林，现在到了柬埔寨西南边陲了，可以很快进入泰国脱离险境了。从越军大扫荡我们被迫转移以来，16天中，我们翻越了40余座山，行程100多公里。在千辛万苦、有惊无险的环境中，联络组共收发电报161份，21017组，及时准确地向国内报告了相关情况，根据国内指示采取了相关行动，可以向祖国交出自己的答卷了。

柬泰这段边界区域，柬埔寨一侧是高山树林或竹林，泰国一侧是平地。英萨利提醒我们，边界上埋了很多地雷，挖了不少陷阱。我们弯着腰，缩着头，背着背囊，穿过茂密的竹林，到了泰国一侧。这里，没有村落，没有边防站，也没有我国驻泰使馆的人，是一片旷野。下午3点多钟，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而至，我们个

个都成了落汤鸡，刚才还浑身是汗，一下子冻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暴风骤雨下个不停，到前边寻找村民的3个人迟迟不归。我们迎风冒雨往前走，来到一个橡胶园工人村。打前站的3人正在与泰国人交涉，柬语、英语都说不通。雨停了，一个年轻警察带着一伙人，端着鸟枪，愣头愣脑跑来。我们拿出红皮外交护照，说明身份，让他给曼谷统帅部、外交部和中国大使馆联系，他是听不懂还是懂装不懂，蛮横无理地下令搜查我们的背囊，边翻边从背囊里拿东西。英萨利带的手枪被缴了，柬方战士、干部被围起来搜身。但要搜查我们机要员的密码包时，大家靠拢在一起，把机要员围在当中，挡住了他们的抢夺，保住了密码的安全。

我们入境泰国这件事，通过外交途径事先已商妥，但只有泰国军方高层知道，下边的人并不知情。我们没有按事先约定的地点进来，偏离了10多公里。泰国统帅部派负责边界事务的吉特上校和一名助手，在约定地点等了两天，杳无音讯，就回曼谷。在返回曼谷路上的饭馆吃饭时，他们从步话机里听到英萨利和我们到达的消息，才匆忙赶来。从安全和保密角度考虑，当天夜里，我们和英萨利就前往曼谷。

我们穿着短袖衬衣，坐在泰国军方提供的卡车上，夜风一吹，冷得瑟瑟发抖。4月12日早晨，到达了曼谷我驻泰使馆。我那根自制的拐杖，本想留作纪念，下车时却忘了拿。这样，到驻泰使馆时，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棍”一条。孙浩大使腿上在柬埔寨密林划破的伤口，半个月后还在溃烂流脓。根据外交部的指示，联络组在曼谷边作总结边休整，为自己的使命画上了句号。随后，在我驻泰使馆内，成立了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负责与红色高棉的联络工作，若干年后撤销了。我奉总社指示，先期回国。到了北京，我就听说，有人把孙浩大使称作“逃跑大使”。闻此言，我笑了笑，转述此话的人，也笑了笑。在我心中，孙浩是一位颇有见地、敢讲真话、平易近人、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大使。他已作古多年。在他乘鹤西去后，在我回顾这段岁月时，我还是要把这几句话写下来，作为对这么一位长者的怀念吧。

（本文作者退休前为新华社人事局局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谁是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的作者

• 庄 重

196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题解说:“这是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果真如此吗?非也。那么,作者究竟是谁呢?这是一个拖延了几十年易解而又费解的谜。

那时候,我从劳改农场——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回北京在新华社当编辑已有数年。一天,遇老友邓岗,他问我:“《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总社播出后,我们不是对照原稿学习过吗?……怎么上了《毛选》?”我感觉他是在“明知故问”,我无可奈何,只好回答:“我不知道。”

1983年1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首页“出版说明”称:“本书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合编。”新华社副社长缪海稜(曾兼任新闻研究部主任)和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成一任主编。有一天,我与成一谈起此书的编辑过程,我问他为什么不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编入这本文选?他说:“毛主席写的《人民解放军总部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和《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我们都注明:‘根据手稿刊印’”。而《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虽然登上《毛选》,因为没有找到手稿,还不能断定是毛主席写的,所以我们没有采用。我问为什么《毛选》四卷刊登呢?成一说:最初也有人怀疑这一篇不是毛主席写的,但该卷主编认为是毛主席写的,他的根据是:文章的口气像是毛主席的口气,这是第一;第二,经毛主席修改过,又是毛主席签发的。

更荒唐的是著名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竟然



杜聿明(1904—1981)

绘声绘色地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是陈其五。

叶永烈为了烘托此文的重要性,首先将陈其五介绍一番,意在表明陈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好像只有陈其五才能写出这篇文章。其实,陈其五和我,彼此很熟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大约有十年时间,陈其五和夫人冯剑与我在一个地区和军队里工作过。最后,陈其五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岗位上,被张春桥打倒。

叶永烈在其所著的一部传记里,有一节专写陈其五。据他介绍,陈其五原名刘毓珩。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21岁的刘毓珩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他成

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1938年2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党派遣他去国民党军队某部做地下工作时,刘少奇给他改名陈其五。(不久,陈其五回到新四军里工作)

叶永烈还说:陈其五曾任“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

叶永烈以很长的一段篇幅写陈其五写作《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情况。原文如下:“1948年12月,当杜聿明部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初稿便出自陈其五手笔。后来经毛泽东审阅,作了几处修改,发出。此文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文革’中《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牛鬼蛇神’们‘天天读’的‘课本’,就连被打入‘牛棚’的陈其五也要背诵此文,他背得极为熟练。近来发现此文最初的手稿,上面有两种笔迹,毛泽东的笔迹人们一望而知,那是作了几处修改留下的,而通篇的笔迹则是陈其五的。”

其实《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不是陈其五,陈其五也不是“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新华社历史上没有“华东前线总分社”,有的是华东前线分社,分社社长是康矛召,不是陈其五。叶永烈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通篇是陈其五的手迹,我说“否!”通篇是孙书明的手迹(但原稿不是他写的),孙书明离休前是新华社老干部局局长,现住北京龙潭湖公园附近。附带说一句:陈其五不是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

事情本来很简单,却弄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离奇了。甚至《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中也写了这样一段:

“我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火线喊话,赠送食品,散发传单等。毛主席还专门为淮海前线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广播稿,对瓦解敌军起到了重要作用。20天内,敌副师长以下1.4万余人缴械向我投诚。”(《张震回忆录》上册第346—347页)

第三野战军战史也写上一笔:“毛泽东起草了中原人民解放军、华东人民解放军《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最近,一些纪念淮海战役胜利六十周年的文

章,无例外地写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出自毛泽东之手。

我不知道,迄今为止,《毛泽东选集》(包括各种外文版在内)总共出版发行多少万册,我粗略估计,少说也有几千万册吧。《毛选》中若有错误,《毛选》发行量愈大,则错误流传愈广,影响党史、军史……改正错误更加困难。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这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谜,该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我是个有七十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而且92岁了,我应该对历史负责。今天,我宣布:《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真正的作者,既不是毛泽东,也不是陈其五,而是我本人——庄重。

历史真相是这样的:

杜聿明率领三个兵团从徐州向西逃跑,于1948年12月4日在河南永城以东陷入我华东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粟裕将军对我说:“我们要向杜聿明部开展政治攻势,我给你一个任务,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名义,写信给杜聿明,要他率部投降。要写得通俗、口语化,便于我前线部队向敌人广播。”我先后写了七篇广播稿,12月上半月,仅《劝杜聿明投降书》(这是粟出的题目),我就写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1948年12月16日24时毛泽东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

(一)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

(二)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

(三)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庄重同志,对杜聿明集团口语广播词的起草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好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裕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吧!”他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急。即发新华社总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时间。然后他对我说:“你请张参谋长看看发出。”我马上去见张震参谋长,张说:“粟司令已审阅同意签发,我就不看了,我要

军台发,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我写得最快、总社播出最快的一篇文章,也是毛主席亲笔为我修改过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兴。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线分社编辑部,大家对照总社播出稿,学习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一)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还加了个“等”字。

(二)此文开头,在“杜聿明将军”之下,毛主席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三)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写为“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还有几处,毛主席作了技术性的修改。

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没有总揽全局来写这篇广播稿。

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手迹问题。

上文已经说过,手迹是孙书明的。

45年前,孙书明与我谈起《毛选》上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我写的,不是毛主席著作。”我简略说了写这篇东西的过程。孙书明接着说:“这事与我有关,那天,我在总社机要室值班,总参三局来电话,说淮海前线给新华社总社发来一篇急稿,是军台发来的,是密码电报,不能给你们,我们口传,请你们笔记。我连忙拿来稿纸,对方一字一句地口传,我一字一句地记,稿子题目叫《劝杜聿明投降书》。”

我的手迹在哪里?我的手迹被封藏在大别山的山洞里。

上个世纪某一年,因轻装备战,南京军区将历史档案资料包括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当时负责人为沈定一)的存档稿件(沈定一说内有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原稿)清理打包,运往大别山藏在一个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树种草,隐蔽起来。因未作标志,后来军区几次派人去取档案资料,却找不到那个山洞。1985年夏,我与新华社高级记者阎吾曾专程赴南京寻找,也空手而返。我想,天长日久,洞中阴暗潮湿,

那些档案资料,大概早已腐烂成泥了!

我手头有一本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竖排精装本(合订一卷本),其卷首“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本书出版的说明》,却写于1951年8月25日。由此可想而知《毛泽东选集》在1951年8月就已经编成。“出版的说明”中说:“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又说:“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

《毛选》第四卷出版于1966年3月,迄今4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不早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推迟43年才提出来,原因很复杂,一言难尽,概括说来有两个,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烧身,株连“九族”。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毛主席的书被称之为“红宝书”,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敢说一个“不”字。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打入“牛鬼蛇神”行列,“只许老老实实”,进行“脱胎换骨”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文革”中被批斗、打嘴巴、罚跪,腰椎被踢断,几乎被打死,我还能说什么。

再说期待,期待什么?

期待毛主席有一天能发现校阅时的疏漏,自己提出来改正这个错误。

期待《毛选》的编者、出版者能发现这个错误,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更正,以示对读者负责。

期待粟裕、张震、廖承志、廖盖隆、邓岗等知情者能为我说一句话,问题便可解决了。

我默默无语地期待着、期待着……一年又一年飞逝而去,《毛选》四卷出版了多少年,我期待了多少年。我终于失望了,不再期待下去。

今天,我亲爱的祖国给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来,敢于直言了。

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个易解而又费解的谜,现在解开了!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真实的历史。

(2009年4月16日写成)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

· 石福庆

1966 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 年、1967 年、1968 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们不得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配”自己的工作。我是在清华主动承担这项工作的毕业生之一，现在回忆这段事情的经过。

我贴出了要求分配的大字报

我们 1960 年考上清华大学，学制六年，按正常情况应该于 1966 年毕业分配工作。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律留校参加运动。开始我们是比较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被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推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在清华召开了 30 万人对王光美的批斗会，罗瑞卿被装在箩筐里抬到清华大礼堂挨批斗……清华党委成了“黑帮”，整“黑帮”的工作组又因“执行了错误路线”撤离了学校。整个大学由红卫兵组织自己管理。但不久，清华学生红卫兵组织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4·14”兵团（简称“四一四”派）。两派天天用毛主席语录打派仗，以致后来发生百日大武斗。毕业班的学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对文革的有些事不理解，特别是对两派斗争很厌烦，还怕这样拖下去丢了专业，都迫切希望早一点奔赴工作岗位。

大概在 1967 年的春天，我在团派总部（航空馆）的墙上给团派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希望他们关心我们 66 届毕业的毕业分配问题。我是四一四派的，为什么贴在团派总部呢？因当时中央领导对清华团派比较重视，蒯大富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林彪、江青、陈伯达和一些中央领导的接见。可以说，当时团派是清华掌权的，四一四是在野的。

66 届毕业生串联会

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除个别有不同意见外，多数人支持我，有本系、外系，甚至有外校的，都来找我讨论。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我先组织了清华大学 66 届毕业生串联会，后来又组织了北京市 66 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和全国 66 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串联会的宗旨是为争取 66 届大学毕业生能早点毕业分配工作。串联会的活动是向清华大学人事处学生科的老师、向北京市文教组的张琳、杜志彬（他们文革前都是具体负责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请教。还学习文革前中央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有关的文件，了解毕业分配是怎么一回事，毕业分配的程序是什么。

在请教学习的基础上，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写报告，反映同学们迫切希望毕业分配，早日到工农兵中去的愿望。我们还找了高教部副部长段洛夫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高云屏等，反映我们的意见。后来又写了如何进行毕业分配的建议。毕业生串联会的办公地点在清华大学强斋二楼南头一个小房间，地方不大但开个会、碰个头还是方便多了。串联

会在清华大学、教育部红星楼等处开过几次会。参加这些活动的除了北京一些高校 66 届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学生。

一次关键的会议

1967 年 8 月上旬的一天，记不清是由蒯大富还是由北京市杜志彬同志通知我，让我找 5—6 位北京高校的 1966 届毕业生代表，第二天上午 9 点在台基厂市府大楼开会。我连夜通知了 5 位毕业生（清华 2 位，北航、北大、钢院各一位，他们都是毕业生串联会的积极分子）。第二天 8 点半我们到了台基厂，一进会议室，见到在座的有蒯大富、聂元梓，还有张琳、杜志彬等。蒯大富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他们几人与蒯大富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们当时被称为革命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也向他们介绍了我。快 9 点了，又进来两位，蒯大富介绍他们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丁国钰，另一位是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李冠英。九点会议开始，由李冠英同志主持，他讲今天请大家来开会商量 66 届高校毕业生的事，下面请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同志讲话。丁国钰说，你们 66 届高校毕业生的要求中央已经知道，你们写的材料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对 66 届高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是很关心的。聂元梓同志今天也来了，她对你们分配问题也很关心。今天“五大领袖”都来了，北京市管分配的同志也来了，就是支持你们的要求。丁国钰又讲现在情况下如何分配。我们听了非常激动，我们分配有了希望了，我们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

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



两年狂悖，十年炼狱，今是昨非。2009 年 4 月 27 日，清华文革中对立的两派红卫兵负责人蒯大富（左）和沈如槐（右）回母校白首相聚。

台基厂会议以后，我们知道中央同意我们 66 届毕业生可以着手分配了。我们从杜志彬那儿已经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的文件《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央这个文件对全国的毕业生分配都会起作用，这是我们奋斗的结果。跨校的毕业生串联会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就开始做清华大学自己的分配工作。

我们首先组织负责毕业分配的工作机构。当时校、系两级的领导，甚至到教研组的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又分成两派，相互打派仗。这个时候怎么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呢？我向清华的老干部如学生科苗既英等，向北京市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张琳、杜志彬请教。杜志彬同志还借给我一本 1964 年 8 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汇编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配工作手册》，我看了这个手册，对学校分配机构有所了解，对学校分配机构的大概模式有了想法。我提议，校一级、系一级和各专业教研室都要成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各级分配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对等原则，即一名团派，一名四派。学校一级和系一级都是由两派各推一名革命干部，一名革命教师，一名红卫兵，而教研组一级，各派出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

我将这个想法,向有关老师征求意见,经他们同意后,我就去找两派的头头,“四一四”找的是孙怒涛,“团派”找的蒯大富和鲍长康。请他们通知各派选拔一名干部、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代表×月×日下午4点到旧电馆211(是力学系的会议室)开会。第一次“4·14”的准时到了,团派的迟到了约半小时,会没有开成。第二次团派准时到了,而“4·14”的迟到了约20分钟,会也没有开成。我急了,再次去找两派的头头,让他们再通知一定要准时到。第三次两派都基本准时到了,还是在旧电馆211开会。这个会我将预先想好的方案,向大家讲一下,似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我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成立各分配小组。并强调有关毕业生分配的事情不准带回派里研究,一定要在分配小组里商量。

分配小组虽然由两派的干部老师和同学组成,但大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都是抱着积极负责的态度,不讲派性,工作中合作配合得很好,工作非常认真。他们冒着武斗的战火坚持工作。这使得我们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分配工作比较顺利。

走出学校当工人

1966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在1965年国家计委联同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确定,经中央批准已经下达到各高校和用人单位。清华大学1966届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约2400多人。在正式启动分配后,总的来讲分配工作时比较顺利,到1967年10月底大部分毕业生已落实分配工作单位。

1967年10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1966届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举行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那半圆形的天穹下,回荡着“文革”以来少有的真诚而庄严的声浪。两千多名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在这里宣誓:

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这一段誓词尽管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大礼堂的誓师大会以后,同学们陆续地走出了校门:

水利系胡锦涛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本来是1965届的。因他是政治辅导员,延迟离校,也和1966届同时走出了清华园,走向了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成为一名水电建设工人;

无线电系的吴邦国从这里走出来了,他从这里走向上海电子管三厂,成为车间里的一名运输工;

动农系的吴官正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是196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他从这里走向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仪表操作工;

……

从清华大学校门,走出了2300多名年青人,其中有108名研究生。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不安,走向了工厂、农村、建设工地……他们拿到的“派遣证”的“职务”栏上,写的都是两个字:工人。

清华,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摇来摇去,却摇出来了一批工人!当时,工人这个称呼比技术员光彩得多。走出校门以后,他们脚踏实地地从普通工人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多数人在企业、在科研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也有一部分人因机遇、性格、能力、人品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一批分不出去的毕业生

多数同学走出校门以后,还是有200多人的分配一直没有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接收他们的单位,需要再等待着分配。分不出去的毕业生有以下几种情况:

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原来他们是都可以分到如二机部至七机部等国家机要部门,而那时他们成了“走资派”、“黑帮”的子弟,那些单位不可能再接收他们。

有一部分是文革中发现有海外关系或家庭出身由“红五类”变为“黑五类”,也没有资格去国家的机要单位。

李黎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父亲李井

泉的牵连而被“待分配”,由学校重新联系他的接收单位。他于1968年11月去青海省电动工具厂报到。

桑尔侠: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岳父龚子荣的牵连而“待分配”,经多方联系,重新分配到辽宁省。他于1968年10月27日到辽宁鹤岗133师部队报到,在北大荒部队农场劳动一年,1969年底分配到沈阳市精密仪表厂当工人。

刘涛,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自控系自903班学生。对刘涛的毕业分配问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校方有明确指示:刘涛的工作不能留在北京,但又要分配在离北京很近的单位,能随叫随到。经过分配小组的努力联系,最后落实刘涛的接收单位是北京铁路局承德机务段。

还有按1965年所确定的分配方案中有180名留校当教师或担任其他工作的名额,当时老师是“臭老九”,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更是由于在学校两派武斗,文攻武卫,大家都很厌恶这个环境,希望早一点逃脱这“苦海”。许多人不愿意留校,最后只有四十多人留校。也就是说,有近140个本来是留校的同学,要重新确定分配方案。

大部分同学已离校奔赴工作岗位,而待分配

的同学现在还走不了,他们十分着急。但要解决他们的分配问题,关键是要落实他们的分配方案,要有接受他们工作的单位。前面说过我们66届分配方案早在1965年就确定了。确定高校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不是一件小事情,是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连同高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到第八机械工业部,还有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等部门,经过多次会议商定。对于一个学校有那么多的再待分配学生,困难很大。经过与国家计委、高教部及北京市分配办公室多次协商,我们学校提出了一个办法:分配方案还应该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或接受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而这些接受单位由我们自己来跑。于是我们分配小组决定发动各系各教研组负责分配的老师帮助去找接受单位,同时也发动待分配同学自己根据所学专业,到自己老家或有关单位去找愿意接受他的单位(一个同学跑1至2个单位),跑来的结果报到系分配小组,由校分配小组集中统一报到国家计委,再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由于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也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科研院)

(责任编辑:杨继伟)

按需出版

2004年我公司在国内率先与出版社合作开展按需出版业务。5年来引领行业潮流,已为300多位国内作者出版了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华人作者出版了著作赠送亲属友人,精美的按需出版图书深受广大作者欢迎,成为品味高雅的礼物和更有价值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具备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难题。(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投入过多印数过多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1—2个月。重印在1—2周。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老辈遗作;书法、绘画、照片、奖状复制;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继续征稿 (50本起印)

资金投入:自费。以50本(大32开)为例,基本费用200页2000元,300页2800元。如需加增录入排版、装帧设计制作,则共为4000~4500元上下(含2页彩插)。具体价格视稿件形式、种类、字数情况确定。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需符合我国出版法规。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作者享有著作权。

正文纸张:70克胶版纸(黑白)、128克进口铜板纸(彩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192,热线:13521531088陶女士。

电子信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外地邮寄。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回忆过“超支户”的日子

• 詹南生

现在,三四十岁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超支户”是个什么东西。在人民公社时代,有些农户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决算时,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欠生产队的钱。这就是“超支户”。按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可以创造剩余价值,为什么劳动者劳动一年不仅拿不到劳动报酬,还欠雇主的钱呢?这是中国改革前的一大奇特现象。

我家八口人,有一个男劳动力,一个女劳动力,一个女辅助劳动力。按生产队评定的底分,我家三个劳动力出勤一天,共挣23个工分。按当时好年景的工分值算,每10分工可得报酬0.6元。这就是说,我家每天人均收入为0.1725元。一年下来,这点收入不够抵还队里分给八口人的粮、棉、油、柴的款项(这是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生产队对待“超支户”有双重标准。贫下中农的“超支户”,可以“缓期执行”。“阶级敌人”或地富子女的“超支户”,归还超支款是硬任务:“你过去压迫人、剥削人、吸劳动人民的血汗,现在还想剥削人?”

我当“超支户”近二十年,脏活、重活没少干,大事、小事没少做。托人情、讲好话,大女儿六岁就看牛,十岁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又托人说好话,把看牛的“职位”让给大儿子。1977年收支平衡。能摘掉“超支户”这顶帽子原因有二:一、两个孩子大了,能挣一定的工分,收入多了;二、93岁的祖岳母逝世,人口少了。摘掉“超支户”这顶帽子欢乐的心情,不亚于后两年的“改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当了二十年“超支户”,每年最紧迫的任务是交超支款。一次又一次的难关,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

在龙山大队林场的一间简易瓦房里,大队举办“超支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二十多个人,有

人屁股下是半截土砖,有人的屁股下是一个草把,有人脱下自己的破鞋当马扎。除了吧旱烟的“滋滋”声,听不到人们抽气的声息。都全神贯注地默想一个问题:用什么交超支款呢?第二天,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继续与“剥削阶级”彻底决裂。我偶然发现,有三个土砖头上是空位,就低声询问与我并坐的朱凤友,他说是拿出了切实可行的交超支款的措施,提前放走了。他又低声地告诉我:谁拿出了“可行的措施”,谁就随时可放行。第三天,又有无人坐的砖头和草把出现。我一数,剩下十三个人听报告:“……你们不要磨洋工,不要消极对抗,更不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我们宽宏大量是有限度的!”这一次,我回老家与堂兄詹方云设法,卖了一间房子给老家的生产队。

过了一年又一年。生产队的办公室里,一盏煤油灯有气无力的亮着。土改时的农会代表、老贫农曹四荣在讲话。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二十多分钟,忽然,话锋一转指向了我:“南生,南生!你的超支款有么打算?要想法子呀!不能把政策当耳边风……钱要积。平常不积,一次要拿出这么多钱来当然就难了!……”找我要超支款,这是天经地义!说我不“积钱”,实在委屈!天哪!我哪里有钱“积”呢?几只母鸡生的蛋,孩子们别想吃,要去换盐!一股无名火终于爆发:“四伯!您说我不积钱,可我也不会偷钱积呀……”结果是老婆出面和解、赔礼,把一间房子抵款到生产队。

又是春耕生产的时候。大批促大干,实现大寨县。生产队的生产资金匮乏。生产队长向大队反映,拟向信用社申请贷款。而得到的批示是:催交超支款。生产队长又奉命开紧急会议。我家是老超支户,当然要还款。钱!钱!我把亲友排队摸底,没有一家“富裕”。在惶恐之中,队长送来一个

信息：太慈街曹运松接媳妇缺床。中国有句俗话，“道士见钱经也卖”。横下一条心吧！感谢老婆的理解，把床卖了。

又是一年春好处。在催交超支款的同时，生产队长送来一条信息：太慈合作商店建楼房，办旅社，需要大批的楼板（那时，乡间没有预制品），“你家要许多楼板作么事？”又在他的关怀下，出卖了两方楼板。再用高粱秆、向日葵秆，填补楼板空缺苟且安生。得的钱呢？全还超支款了。

又一年大年三十，家家忙着过革命化的春节。我正在劈一个桩兜，打算煨煨托食品站会计周井山谋到的一个猪头。虽只有几斤重，猪耳朵、猪口条、猪脑子，可做好几个菜。默想着，这个春节，在革命上可以“化”一下了。“进屋啰，有人来啰！”这是拙妻的声音。很明显，女低音里含着哀惋。是谁来了？我心知肚明：上次社员会上定我家交超支款30元，他们要钱来了。革命化的春节，可能“化”不起来了。我伸直腰，丢下斧，搓搓手，一脚千斤地回到屋里。队长开门见山：“我们是来

收超支款的，把钱交出来吧！”

年关！年关！我在小说里读到的某些穷人度“年关”的情节轮到我了。在沉寂的相持阶段，副队长给我提了一个醒：你跑趟路到吉水去找姚麻子看看，生产队要把30块钱的鱼花钱给他，看他能不能给你过过账？

这倒是一条有点“生机”的路！但此时此刻要跑到吉水，难点是时间问题。估摸已过十点钟了，就是连走带跑，也得下午一点之前到。这么晚，人家会接待我吗？我跑出五里之遥，解开棉衣呼大气，碰上了瓦匠师傅徐伯高，我在他的麾下做过小工。他问：过年了，还往哪里跑？他听了我的原委之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自行车推向我：快去！快去！

姚麻子热情地接待了我，招呼他的妻子炒饭给我吃，写具了过拨的条据，并串起两条鱼一并交给我：“快回家吧，好好地过个年！”我多么感谢姚麻子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80页）不同班级的班主任。在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心目中，他们就是真正的老师，我们从内心深处敬畏他们。有一天深夜，他们饥饿难忍跑到学校的萝卜地里偷萝卜吃，被当场抓住，还从衣兜里搜出了一些准备带走的萝卜，场景十分尴尬。这事很快就传遍了全校，他们无法工作，只好灰溜溜地走了。这年的暑假，我去外地探亲，晚上在成都火车站广场上露宿，从天黑到第二天天明，整个夜晚不断听见此起彼伏的抓小偷叫喊声，不断看见追过来跑过去的人群。我不敢大意，十分警惕地看护好自己的东西，但是第二天早晨却发现脱在自己身边的一双旧布鞋还是被人偷走了。还有许多我所亲历的偷抢行为，这里不再一一述说了。

中共中央在大饥荒的后期曾经给下面发过指示，要求对一般偷抢行为要从宽处理，对饥饿所迫偷窃食品的行为一般不以偷窃论处，材料也不进入个人档案。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实现了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人民普遍过上了温饱生活，不少人还过上了富裕生活，但

是有些人却不为之喜，反为之忧，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了精神道德的沦丧，十分怀念从前的所谓“思想革命化”。我认为如果用市场经济理念和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来看今日的中国精神文明，可以肯定地说，今朝远胜过往昔；即使从精神文明建设的不足方面来说，解决问题说到底也必须有赖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已经正视曾经发生过的失误，包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全国大饥荒，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已经有了正确的结论。但是当前我们仍然经常看到，在一些领导人的讲话中，在一些报刊影视作品的宣传中，在一些课堂教学中，许多人仍然沿用《决议》发表前的提法，把那个大饥荒年代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就是说大饥荒主要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这种不科学的提法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好像中国共产党缺乏承认失误的勇气，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直接的后果是损害党的改革开放形象。我认为可以采用比较中性的提法，比如“六十年代饥荒时期”或“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化现象杂说

· 吴江

之一

湖南《湘声报》新年刊登了一篇题为《负伤的知识人》的文章(作者陈远),一开头便说刚过去的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并列了一张在去年撒手西去的文化老人的名单如下:

蔡尚思 104岁,王养冲 101岁,骆耕漠、谈家桢 100岁,瞿同祖、周尧 98岁,陈赐祺、陈振汉、任美镠 96岁,王永兴 95岁,王叔岷 94岁,贾植芳、唐敖庆 93岁,王名扬 92岁,滕维藻 91岁,张芝联、蒋学模 90岁,孔德成 89岁,彭燕郊、柏杨、王元化、陈述彭、方平 88岁,袁可嘉、金提 87岁,萧父 84岁……士林凋落,触目惊心。

这么些文化老人的逝世是不是“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的证据呢?我看未必,单从逝世者的年龄来看便可以明白了。这里开列的二十六位逝世文化老人的年龄有四位在100岁以上,有十三位在九十岁以上,最小的也是84岁了。可以说都是“天寿”了,虽然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都负过伤,我说“一无例外”,因为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反右派”,又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对这类文化人布下了天罗地网,逃无可逃,不过负伤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此外,人数也并不完全,粗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这张名单里是做学问、弄弄笔杆子的人居多,而且大都在社会上有点声望的。假如把各类文化老人(例如科学家、教育家、医学家、艺术家等等)统统包括在内,则2008年逝世的决不止这个区区之数。中国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且已称“老龄社会”,2008年只有这个数的文化老人逝世,不能说2008年就是“文化灾年”,中国文化之灾决不表现在这里。相反,这应当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且逝世者都是如此高龄,足见

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医疗条件和过去相比已大有改善。想想在上世纪,像梁启超、鲁迅等人没有活到60岁,胡适也没有活到70岁,可谓短命而亡,从生理上说,他们的命运不及现在的文化人。

我与文化界人士交往不多,在上面那张名单中,我只认识二位,一是蔡尚思,一是王元化。王元化同志我们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相识,他到北京找几位朋友谈话,约二、三次,我也在内。他晚年整理自己的文稿并着重进行反思,赠我几本书。他大概是到了晚年才被认为是一个有多方面贡献的学者的。我当面跟他说过:他是现在已很少见的认真做学问的一个人,而我已不可能做到这点了,过去没有根基,如今来日无多。我要比他年长几岁,所以2004年我游上海和杭州时,在上海曾特到他的寓所,对他说:我此行是特来向你告别的,我们彼此都已不便走动,以后恐怕难有见面的机会了。他有点愕然。但万没有想到,他竟比我先离开了这个人世。

蔡尚思同志则是先辈,也恐是我国已少有的真正“国学家”之一。他把图书馆当学校,读书超百家,可谓无所不窥,但为文却十分简约,这正是他的渊博精到之处。他以反封建著称,1992年我写《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一书,向他请教。不久,他来北京时专程到我家当面赐教,那时他大概已是快九十的人了,但看上去身体硬朗。后来他又赠我《自传》一书,我回他一首“打油诗”,记述他的生平,其中有“李贽之后第一人”句,我想这不算是夸大其词。蔡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晚年已很少露面。大概在他百岁的时候,我曾以文向公众介绍这位老资格的“国学家”,文章连同那首打油诗一并发表在《文汇报》上,听说有人向他当面宣读了。

蔡老离世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无

人通知我,但不久我听到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他死时的吊唁规格问题。按,蔡尚思不仅是我国的名教授,他还担任过复旦大学的副校长。而按中国的教育体制,包括大学在内的多数学校都被套在官本位的行政级别上,复旦大学虽是名校之一,但无独立性,它被套上官制行政级别,仅属于所谓“局级”,而副校长的身份就只是“副局级”,所以蔡的吊唁规格最初是定在“副局长”一级(我不知道“副局长”一级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最后却出其不意,学校竟然收到了两位来自北京的据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唁电,因此学校赶忙提高了吊唁的规格(我也不知道提高了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但我必须声明此事仅属传闻,事情究竟如何至今仍不得而知。如果事情果真属实,则中国文化人(包括名教授、名学者等)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之二

《负伤的知识人》一文还说到他对于这批逝世老人的看法,直击现时的一种时弊,也可说是说出一种期望,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注意。兹将其中的两段话摘录如下:

每一位老人的去世,都会被众多媒体冠以“大家”“大师”之名,这固然表达了人们对这些老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个时代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对老人的尊重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律给他们冠以“大家”“大师”之名,私意以为,对这些老人称之为“文化老人”或许更准确一些。

比如贾植芳。贾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17岁曾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21岁出狱后,流亡日本。先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三进三出。1955年又因胡风事件,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新社会里罹难,被关押12年之久。待平反之时,贾先生已经65岁了。之后虽然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但是用于学术研究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说贾先生名则名矣,要说是“大家”,则只能看作后辈人觉得时代亏负了贾先生,而对先生的一种善意的褒扬了。否则,一个让人费神想上半天也

不出其扛鼎之作的“大家”,岂不是文化的笑话?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可取的,我们这个时代确实让人感到有人“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随之就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一些人,大抵是爱文化但未功深的朋友,热衷于捧某些较有名气的文人,称其谓“大家”、“大师”、“泰斗”乃至“泰山”、“昆仑”(意指其学问之大可比“泰山”,其身份之高可比“昆仑”,即“登峰造极”者)等等,使人觉得这不仅是“溢美”,而且是近乎“炒作”了,以致弄到有的被“炒作”者公开出来登报声明要“辞去”这类称号。另一种现象是,有人在评价“五四”以来的文化名家时,有意无意地把一些人拔高,把一些人贬低甚至丑化,总之是“今不如昔”。其中出现的一种怪现象是,居然把大汉奸周作人也捧出来作为旷世文人大赞而特赞。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理应不断有“大家”、“大师”级人物出现,但可惜据说至今还很少见到。于是有人叹息,有人竟“患上了严重的‘大师’缺乏症”,其症状部分已如上述。何谓“大家”、“大师”?何谓“扛鼎”之作?我想这总和代表时代精神,追求先进社会理想,推进时代的步伐,创新人类文明等等有关。以欧洲来说,稍为关心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从古希腊文明到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大量杰出人物,可谓群星灿烂。令人惊讶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最早的几位代表人物如但丁、乔托、米开朗基罗、薄迦丘、彼特拉克(他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伽利略等,竟都出现在佛罗伦萨一地,这个地方成为西欧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我国古代且不说,“五四”运动前后,也出现了不少有光芒的“大师”级人物,如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钱穆、鲁迅、胡适等均在其内。但进入新中国后,这种现象好像就停滞了,虽然文化界的新角色不少,但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原来颇有成就的一批老作家如茅盾、巴金、曹禺等,他们的创作思想也好像一下子被堵塞了。为什么会这样,自然引人深思,这里总有原因在。根据一般评论和个人私见,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治君临天下,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而政治的核心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家的思想被框住、被堵塞,没有自由独立思想可言,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和创新精神呢?《雷雨》的作者、可称

得是中国戏剧名家的曹禺，在他的晚年有诗说道：

如果大家戴着盔甲说话
我怎样亮出我的心
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
火热的人怎能与我接近？
我愿死一万次，
再不愿终身这样存有戒心！

所谓“戴着盔甲说话”者，即“文艺为政治服务”之谓也。

还有著名电影演员和编剧者赵丹，他 1933 年至 1949 年拍片三十二部，名满中华，而 1950 年至 1965 年只拍了八部，从 1965 年至 1982 年正是赵丹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段，他在艺术上却留下了一片空白。赵丹临死时所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领导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此语在《人民日报》公布，读者为之唏嘘！

另一重要原因，中国向来是一个“官本位”国家，即以官为本，“学而优则仕”是一条千古不变的古训。大概进入民国以后，由于“西风”的影响，留洋者渐多，并通过刚兴起的高等教育，学者、作家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相当多的独立性，当然为数极少。但到了我们的新社会，反倒有些倒退了。独立的并且凭着自己的学者、作家地位能够挣到较高薪酬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乃至近乎绝迹了。大家都统统进入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组织和“协会”等，并且按照一定等级享受生活待遇，而大家都一律由官方供养。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家都用各种办法往仕途上挤，在官场上打拼。有的文化人一生做了一任官，就把它作为一生的最亮点，尽量加以渲染。还有相当一批年轻的学者则热衷于走所谓“秀才”、“秘书”这条路，为领导人“立言”或“代言”（为此他们甚至创造出一种似乎能朗朗上口的新骈体文来），由此谋得官职，然后傲视“群学”。此即所谓“优则仕”，“仕则通”，无往而不通达矣。试问，在这种情形下，任你如何千呼万唤：“大家”呀，“大师”呀，“泰山”呀，“昆仑”呀等等，怎么可能出现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即具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学术人才来呢？

之三

要造就真正的学术人才，有所贡献的文化人，依靠的端赖于教育。教育兴，而且走的是正道，则文化兴，高才出。否则就难有希望。这是世界的通则。

中国的教育状况究竟如何呢？凑巧，最近我收到一份《同舟共进》刊物（2009 年第 2 期），里面有一组题为《为教育“把脉”》的文章，并有一篇引人注目的编者《题记》，《题记》说：“我们的教育得了‘病’，而且病得不轻……专家尤其是老一代教育家的意见是相当尖锐甚至不留情面。中国教育走到今天，是到了该进食苦口良药和听取逆耳忠言的时候了。”下面我就将这些“逆耳忠言”作一些摘录，以飨读者，顺便从其中提取一些教训：

30 年教育改革，我们恰恰只是进行了一些零星的或枝叶的改革，如教师聘任制、扩大招生、大学合并、后勤社会化、公开招聘院长、助学贷款、独立学院等。虽然其中某些改革是必要的，但有些并不是真正有益的，甚至是误导。如大学合并和独立学院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人甚至用“乱象丛生”来形容，其原因正是由于我们忽视了教育本源的改革。（刘道玉，武汉大学原校长）

2005 年 7 月 29 日，温家宝总理到医院去探望钱学森先生，钱老对教育部提出了掷地有声的建言。他说：中国还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钱老的建言发表后，教育界都没有任何反映。（引文同上）

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教育部已不能领导这场真正的教育改革，因为改革就要从教育部改起，重新定位教育部的机构设置、编制和职能。（引文同上）

中国崛起还缺少什么？人才。中国现在面临高端人才缺乏的危机。根据上海交大发布的 2007 年世界 500 强大学排行榜，排名前 10 位的有 8 所在美国、两所在英国，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清华大学排第 181 位，北京大学排第 257 位。中国为何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 150 名，这很值得深思。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前两年说过一句很尖锐的话，“中国在国际上称得上经济学家的

不超过5个人”。中国缺少一批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大学校长,现在大部分大学校长只是教育官,不是教育家。想要改革的校长不是没有,但就像过去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一样“全身被捆绑”,受到体制的约束,想做事也很难。(温之凯,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

城乡、区域之间基本办学条件差距仍然较大。我刚到过河南省的国家级贫困县民权县进行基础教育监测,那里农村的中小学几乎没有实验条件,甚至没有活动场所。现在实施农村远程教育工程,国家拨付了一些计算机和卫星接收设备,大都闲置了。为什么?两个原因:一是经费不足,付不起电费、维修费;二是没有老师会教。可见我们的管理、经费、人才在农村是相当缺乏的……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2008年国家审计署审计50多个县,有超过80%即40多个县挪用国家教育经费。(胡平平,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

至于合并(按: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大学院校的大合并),教育界普遍认为,它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有如1952年的院系调整。谁能在合并中拔得头筹,占据先机,谁就有机会快速建设一流大学。于是,各地政府纷纷把合并当成头等大事,而高校也在行政的推动下,找合并对象。全国高校来了个大洗牌,很多看不懂的、拉郎配的合并也高调登场。合并后的高校洋洋自得于自己的学科更齐全、规模更宏伟,可高校的办学质量却在过去10年节节后退。”(熊炳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应该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教育到底生了什么“病”,才使得这个本来是那么高尚、圣洁、“民爱之”的事业,居然沦落到“民畏之恨之”进而“唾骂之”。现在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政”与“教”互通有无、互为倚重、各得其所。本该当教育家的大学的头头脑脑们,水平够得上蔡元培、罗家伦、马叙伦、叶圣陶等教育家的鲜有其人,听说他们要当政治家,看重的是“副部级”、“正厅级”之类的行政待遇。“政”与“教”错了位,“政”与“教”一锅煮,迂腐的孟老夫子真可以休矣!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可记的功绩很多,但教育问题一大堆,最大问题就是政治化、官僚化没有被触动。从这个角度说,30年来教育界没有真正的改革,

而所谓改革是一些表面的操作、管理层面的瞎折腾,有些已经承认失败,有些还没有承认失败。(董建,南京大学原副校长)

清末诗人龚自珍有言,灭绝一个民族,先灭它的历史。我想补充说,还要灭它的教育——不灭教育何以灭其历史?从文化传承上说,灭史是断其根,灭教则断其后。只有最短视的民族才不惧怕教育的毁灭。当然,完全毁掉教育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觉得,最可怕的还不是已经干过的那些使教育变质的蠢事,而是主管部门支持那些蠢事的某种“思维定式”,还会借着权、钱两翼,幽灵般游荡在今天教育的上空。我们的教育被糟蹋得太惨了,而教育危机是一个民族最大的危机!(引文同上)

抄录得不少了,就此打住。这里我们听到一种急迫的呼声:中国的教育需要一场真正的变革。教育部已无力进行这场变革,相反,中国的教育变革应当从教育部变革开始,真正端正政府和教育的关系。必须确认教育的相对独立地位。政府有义务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直接经营教育。

教育者,文化之本也,“大家”、“大师”之源也。

之四

近年来,兴起了“国学热”,随之又兴起了“读经”、“读佛学”之议,而且还颇有一些声势。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想和我们过去片面宣传“厚今薄古”乃至所谓“破四旧”(这是一种极端荒谬的现象)等有关。中国的一个优势本来是历史悠久,特别是几千年的文化延续不断,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可以断裂,文化决不能断裂。中国有久远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中华民族具有坚固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现在提出重视国学,继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存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认为十分必要的。我也曾几次为文谈这个问题。

有人不赞成“国学”之称谓,我看称“国学”也无妨。现在人们所说的“国学”,主要是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而言,包括甲骨文,先秦诸子百家,经史子集,魏晋玄学,古今文学,孔孟程朱陆王,中国佛学,清初五子之学,维新之学,乃至孙中山

的学说等。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创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人物，他的学说不属于古代，但有人愿意把他的学说也包括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我想也未尝不可。

中国的“国学”过去在世界上的影响有限。在西方学术界，老子的影响比较大些。从十六世纪起，老子的《道德经》就风靡西欧。欧洲哲学重镇德国的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名家都重视老子。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位最重要的思想家，老子名列前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传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道德经》。这一点恐怕出乎国内提倡国学者们的意料。这倒应了中国古代关于老子“出关”的传说。孔子名头虽大，却没有这种运气。可是现在情况变了，有不少外国办起了“孔子学院”，这些以孔子命名的学院，主要是用于学习汉字，但也希望初步接触一点中国的文化。据说，截至2008年12月，全球已开办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分布在78个国家和地区。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件好事，孔子终于也带着汉字和《论语》讲义（于丹作）“出关”去了，大有超越老子之势，真不愧为“圣之时者也”。

但我想说的是国内。在国内，已有一些大学办起了“国学院”或“国学研究所”。深圳似乎办得最早，上世纪末我过深圳时曾想前去访问，因别的事错过了机会。前几年我的一位朋友被聘为一个大学办的“国学院”院长（不久他因年老精力不济辞去了院长职务）。据他告诉我，这个“国学院”是该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主动发起倡办的，招收的（经过严格考试）也是有大学学历的人，共300余人。5年学制。所设课程，经史子集都有。着重读原著。有的还请专家讲授，如《史记》、《楚辞》、《战国策》等。此外，还接触敦煌学、汉画学、西夏文、古藏文，甚至古西域诸国的文字（据说有一位年仅五十多岁的先生，竟懂得古藏文及古西域二十多国的文字，人才难得啊！当然，不能追求多数。）。外文也是必修课。还听说，学习者都很勤奋。

我没有亲见亲历，不能就简单的介绍妄加评语。但我仅根据求学者必具有高学历，即已经具备必要的现代知识再窥“国学”这一点就相信可

以造就出一批人才来，他们能够掌握国学的基本东西，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又不致食古不化，脱离前进中的新时代，他们能净化“国学”，真正取其精华，除其糟粕，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光耀世界。这样的国学院，全国不必多，宁少毋滥（因条件毕竟有所限制），如果东西南北中各办一个，则二十年后必见成效。国人有厚望焉！

大概是因为国学受重视的影响，相应地出现了一种现象和一种主张。一种现象就是，中央电视台举办“百家讲坛”，专家学者登场，有新说“三国”“水浒”者，有新说“玄奘取经”者，有讲解断代史者，甚至有讲解《论语》者，林林总总，开自来“说书”的新局面。这足以增加公众的文史知识。所讲虽不免有争议，总不失为是一项善举。可惜的是，这项“新说书”也出现了某些为出版者所主导的炒作现象，因此引起社会的某种看法。炒作虽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但“新说书”毕竟应看作是一项严肃的文化事业。

所谓“一种主张”，就是趁国学受重视之机，有论者提出“小学应以诵会《四书》为主”、“初中初涉《六经》”之议。这虽只是个别论者的主张，但已显露出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这种倾向究竟属于何种性质？我们的“国学热”应当走向何方？我以为应当加以讨论。至于为继承传统文化着想，在中小学适当涉猎一些古诗词、古文及某些古历史章节等，使国人从青少年起就有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基础和兴趣，则是完全必要的。现在不仅中小學生，甚至连一些大学生也不能像样地手书中文，亦无起码的传统文化知识，这是一件值得忧虑的事情。

面向现代化，决不意味着忘却传统！

（2009年2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事

《炎黄春秋》1999年至2006年尚有少量刊物（不全）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或前往购买。

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城铁四惠东站B口往东20米报亭。

联系人：朱亮，电话：13552967836

关于“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 徐水涯

一、接着汪澍白的话来谈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多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而且成绩斐然。但有个问题，人们似乎注意得不够，就是：毛泽东晚年所发表的一些轻视书本知识的见解，与清代颜李学派的观点颇为相似。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研究专家汪澍白先生在一篇题为《〈实践论〉〈矛盾论〉与中国哲学传统》的文章中曾经谈到过。他是这样说的：

颜习斋对朱熹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也有过头的地方。他强调“读书无他事，只要在‘行’字着力”，便带着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这就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了。毛泽东晚年也多次发表过类似见解。……这就如同颜习斋一样，得出了“读书有害”的片面性结论。不过，这是六十年代出现的问题，不能归咎于三十年代的《实践论》。（汪澍白著《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虽然所谈的内容非常简略，援引的史料也极少，但却给人提示了一个重要信息：晚年毛泽东与颜李学派在“读书有害”这一见解上，有相似或相通之处。

颜李学派是清朝初年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以颜元（字易直，号习斋）及其门徒李塨（字刚主，号恕谷）为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概括颜李的学说：“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颜元）之根本主义也。”《颜习斋哲学思想述》的作者、史学家陈登原认为，颜李学说的精髓，就在“动”、“实”、“习”、“用”四个字。

晚年毛泽东究竟发表过哪些类似颜李的见解？颜李又是怎样论说自己的观点、主张的？毛的

见解是否受过颜李的影响？这是几个既重要又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下面我就根据翻检到的史料，谈一谈自己的看法。实际上，也就是接着前引的汪澍白先生的话来谈，把他未加深谈的话题谈下去。

二、老粗与读书人

汪澍白说，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过与颜习斋的“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的观点类似的见解。毛是怎样说的呢？

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很直率的命题：“老粗出人物”。接着发挥：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下面谈刘邦怎么厉害，从略）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引自2006年12月21日《人民政协报春秋周刊》所刊文章《毛泽东对历代帝王的评说》）

毛泽东的命题是“老粗出人物”。老粗，也就是文盲或识字不多的人，“人物”，是指杰出的人物。毛泽东这段话所列举出的“人物”都是皇帝，都是老粗出身的能干的皇帝。但没有谈到读书人。

在另外几次谈话中，毛泽东则既谈到了老粗，又谈到了读书人，而且是将二者对比着来谈的。如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说：

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1页）

状元、进士、翰林，在封建社会中都是被视为

顶级的读书人的,但毛泽东却认为他们“都是不成的”。毛又将读过书的皇帝和不读书(大草包)的皇帝做了比较,认为不读书的皇帝“比较好”。他的结论是:书“读多了,害死人”。

毛泽东又曾提出要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甚至提出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所谓“神秘观念”。他是这样说的: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学问的、无创造性的。

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引自《李锐谈毛泽东》,179页,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这些话,虽然都是毛泽东在“大跃进”等一些特殊语境(群众运动高潮期)中说的,但反映出了他对专家教授乃至科学技术的某种怀疑和轻视。相反,他却认为无文化少文化的“卑贱者”最聪明。

毛泽东晚年说的这些话,在毛泽东时代是尽人皆知的,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能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对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都曾细细地学习和领会过,所以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这些话,其中某些内容,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基本倾向则是轻视书本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这显然是一种偏向,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偏向。

三、颜李轻视书本知识的倾向

汪澍白谈到,颜习斋的理论,“带着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所谓“理性认识”,也就是书本上的理性知识。试看颜李是怎样轻视理性认识即书本知识的。

梁启超写过一篇研究颜李学派的专题论文《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其中说到颜李是反对读书和著述的:

颜李认为,凡纸片上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所以反对读书和著书。又以为,凡口头上学问都算不得学问,所以反对讲学。(《饮冰室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3116页)

按照颜李的说法,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学问,所反对的只是读书、著书和讲学。他们这种主张,今人听起来恐怕会感到费解:不读书,不听课,能获得学问吗?但颜李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书本上写的和口头上讲的那些东西,根本是算不上什么

学问的。于是,便反对读书和讲学。

试看颜李自己是怎么说的。

一次,颜习斋的一个门生向他请教《中庸》里的“好学近乎知”这句话,他反问这个门生:“你心里是不是认为一定要多读书,才可以破除愚昧之见呢?”门生答:“是”。颜习斋便教育这个门生说:

不然,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书正误》卷二)

在颜习斋看来,天下那些成天抱着书本的秀才,都是不通事理的,他们读了书便愚蠢,而且越读越蠢,本来这些书生是想通过读书破愚的,但却越来越愚。

颜习斋还把读书比作吃砒霜,所以他总是劝说有志向的人少读书:

仆亦吞砒人也。……二十年前,但见聪明有志人,便劝之多读。近来,但见才器,便戒勿多读书。……噫!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吾人急醒!(《朱子语类评》)

以往,他见了有志青年,总是鼓励人家多读书,后来则变成极力劝诫人家少读书。他劝人家少读书的理由是不读书照样能成大事——试看,上古的三皇五帝等许许多多圣人王者,难道是读书人吗?难道夏商周三代之后的那些有作为(整顿乾坤)的帝王,都是读书人吗?

倘若说,读书读来的不是学问,那么什么才算学问呢?在颜李看来,“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所以,只有那种“做事”所需要的实用性的知识才是学问。故此,他们又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成天把心思放在读书上,便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干实际事,况且,读书越多人就会越糊涂,越没有见识,办事的能力也就会越低下。他们是这样说的: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读中度一日,便习行上少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上少一分。(颜习斋《存学编》卷一)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谱》)

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颜习斋《朱子语类评》)

今之学,与官事风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学,白面书生,为世垢病。致使豪杰不学者,反出其

上。(李恕谷《圣经学规纂》卷二)

所说的“诵读”、“纸墨”、“纸上之阅历”、“今之学”等,指的都是读书、著书、讲学等事,而“习行”、“办经济”、“世事之阅历”等,则是指实行,指干经邦济世的实事。在颜李看来,读书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读书有什么用?那些能实用的本事才叫真学问。他们认为,如果书读得太多了,不仅害死人,而且能亡国,李恕谷所说的“宋明之亡以此”就是这个意思。

颜李还举出好多通俗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主张。如颜习斋说:

譬之学琴然,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存学编》卷二《性理书评》)

他把读书讲学比作识读琴谱,认为要想学会弹琴,光把琴谱识得烂熟有什么用?那能叫学琴吗?还得拿琴来练才成。所以,光读书是不能达到“求道”的目的的,与目的地相隔千里之遥哪!

揆度一下上述颜李的观点和主张,看起来,他们眼中所看重的,基本上是实用性、操作性强的知识,而对于理性认识,对于书本上的形而上的东西,则表现出轻视的态度。用手弹琴,属于实用性、操作性的技能,他们是重视的,而识读琴谱,属于理性方面的知识,他们便不加强调和重视了。诚如汪澍白所言,颜李的学说,确实存在着轻视理性认识的倾向。

四、矫枉与矫枉过正

那么,对上述颜李学派的学说主张该怎样评价呢?如果用今尺来裁剪古衣,给颜李扣上一顶“反对读书学习,提倡蒙昧主义”的帽子,恐怕是不恰当的,因为颜李并非如此。

实际上,颜李的学说主张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明中叶以来盛行的陆王程朱两派宋学以及当时渐趋流行的考据学而发的。颜李认为,宋学空谈心性,迂阔不堪,考据学又太细密和繁琐,所以,他们主张为学要“务以实用为主”,主张“动”、“实”、“习”、“用”,通俗一点说,就是主张放下书本,走出书斋,使自己动起来,去干那些具体、实用的事。所谓“坐着说,何如起来行”。颜氏自号习斋,就是对自家学说的一种宣示。他的

弟子钟铨在《习斋纪余叙》一文中,从颜习斋的“习”字谈起,概括了颜李学派的学说精髓及立论的起因:

斋以‘习’名者何?药世也。药世者何?世儒口头见道,笔头见道,颜子矫枉救失,遵《论语》开章之义,尚习行也。

显然,颜李的学说主张,主要是针对那些以口以笔讲说宋学和做考据学问的儒者而提出来的,在颜李看来,做那一堆所谓的学问实在是一种社会病,是应当矫正的“枉”,而自己所创立的学说主张,便是用来矫枉治病的。颜习斋认为,孔圣人是主张习行的,《论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的“习”字,就是习行的意思,所以,应该按照圣人的话去做,去习行、实习、实践。他所取的“习斋”之号中的“习”字,显然也是取自《论语》。

对于颜李所批评的对象的是是非非,姑且可以不去管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宋学和考据学这些学问,确实都是不看重时务,不重视兵刑钱谷之类的实用性的本领的。这些学问的盛行,造成了当时士宦阶层崇尚空谈及琐细学问,而不重视实务的风气。对于这种风气的危害,李恕谷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写道:

自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呜呼,谁实为之,无怪乎颜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恕谷后集》卷四《与方灵皋书》)

这是一段痛心疾首的话,从中可见明末以来虚浮、颓败的士风。在此风气下,读书著述与吟诗作赋是第一等事,而兵刑钱谷之类,则被视为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结果,元帅在军帐里还批点《左传》,敌兵打到城下了,还在推敲诗词。国家遇到危难时,竟连个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吏都不好找,最后只好土崩瓦解。面对这种士风,难怪颜李要痛心疾首地提出那些激烈的观点。颜习斋曾作诗描摹士风云:“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另有人作诗云:“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些有名的诗句,虽都是激愤之言,不无片面的因素,但却从一个侧面写照出了明末一些虽有忠君爱国的气节,却不重实务的官僚士大夫的形象。

颜李学派反对虚空和琐细之学,强调习行,强调实用,这些主张,无疑包含着很大的真理性。在当时,这是一种矫枉的、革命性的主张,因此,梁启超夸赞颜李是“清儒中很特别的人”,“是二千年思想界之大革命者”。

但是,颜李的学说,显然又潜含着一种走极端的、绝对化的倾向。他们所认为的读书便愚,越读越愚,读书有如吃砒霜这样一些见解,已经不仅仅是反对阅读那些宋学和考据学之书了,而是正如汪澍白所言,已经是“走向全盘否定书本知识的极端”,带有从根本上“轻视理性认识的意味”了。过犹不及,真理再向前跨一步就是谬误,颜李学说的弊病正在这里。颜李本来是为了矫枉,但却矫枉过正了。实际上,即便是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也并非读了书便愚,读书人中还是有很多有出息的人,绝非都是些专事空谈的腐儒。例如,考据学大师、大思想家顾炎武,若论翻书本,可谓第一流,但他同时又极为重视研究经世学问,重视实地考察,他还曾投笔从戎,参加过抗清斗争。

五、排比出来看一看

汪澍白说,毛泽东晚年多次发表过与颜李的观点类似的见解,又说,毛泽东“同颜习斋一样,得出了‘读书有害’的片面性结论”。为醒目地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下面再将两者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话排比出来看一看。

毛说:“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颜说:“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毛说:“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

颜说:“试观千圣百王,是读书人否?虽三代后整顿乾坤者,是读书人否?”

李说:“今之学,与官事风马牛也。以之莅政,迂腐道学,白面书生,为世垢病。致使豪杰不学者,反出其上。”

这样一排比,就看得很清楚了,无论是从内

容,还是从语言表述来看,两者确实都是非常相似的。

两者的相似,自然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呢,还是毛多少受过一点颜李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汪澍白没有谈及。但他谈到过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受过颜习斋的影响。他说,青年毛泽东“广泛接受过早期启蒙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的影响”。这话说得是不错的。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写过一篇名文《体育之研究》,其中写道:“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可知青年毛泽东对颜李的“文而兼武”即不仅静心学文,而且尚“动”习武,是颇为赞赏的。这说明,青年毛泽东确曾受到过颜李的影响。汪澍白又谈到毛泽东中年时在延安写的《实践论》与颜李学派的“亲知”观点的相通:“在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视‘亲知’的莫过于清初的颜习斋。他强调只有‘著取而纳之口’,才能识别蔬菜的味道;只有通过‘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的实践,才能‘疗疾救世’。《实践论》所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与颜习斋同样是依据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来阐明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基本道理,这正是毛泽东与习斋哲学相通之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30页)《实践论》所说的亲口吃梨子,与颜习斋所说的亲口吃蔬菜,确实是很相似的,毛泽东的实践观点与颜李的“亲知”观点,确实是相通的。

那么,晚年毛泽东所发表的诸如书“读多了,害死人”等一系列见解,是否受过颜李学派的影响呢?我的看法是:不能绝对肯定,但很有可能。不能绝对肯定,是因为我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毛泽东受过颜李学派思想的影响的材料,也没有看到过毛泽东对颜李学派的思想观点做过评价的材料,所以,很难确认晚年毛泽东的那些见解肯定受到过颜李的影响。但是,也不好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是否可以这样来推测:从晚年毛泽东与颜李在读书问题上的见解相通、甚至语言也相似来看,又从毛泽东历史上曾受过颜李的影响来看,晚年毛泽东的书“读多了,害死人”等见解,还是多少受过一点颜李学派的影响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财产申报： 二十多年难有结果的改革

● 汪玉凯

财产申报：悬于官员头上的一把利剑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怀疑。但有些改革的艰难令人匪夷所思，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是国际社会普遍采取的制度，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称。它最早起源于 230 多年前的瑞典，1883 年，英国制订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法律。

作为杜绝和惩治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常用手段，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主要是通过对官员财产变化的掌控，洞察官员的行为。而这样的掌控，又常常是以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为前提的，社会公众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强大的社会监督力量。具体地说，通过严格的申报制度，一旦发现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存在差距，官员就必须做出解释与说明，如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即便没有证据证明是非法所得，也会被认定为“灰色收入”而治罪。对于民选官员，则必须在选区范围内向社会公示。可见，对官员来说，财产申报制度无疑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

从国际社会的经验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落实，关键在于有健全的法律及强有力的实施。凡是实行严格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其财产申报制度都是以宪法或法律为基础构建的。申报主体完整，涉及官员的财产范围宽广，对不实申报的处罚也非常严厉。以美国为例，在 1974 年尼克松总统陷入水门事件以前，美国虽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但主要是内部申报，对官员的约束力有限。水门事件后，美国掀起了一场廉政风暴，并于 1978 年制定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89 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正式确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按照这项

法律的要求，美国所有公职人员，只要年薪在 5 万美元以上，包括行政人员、国会议员、法官等，都必须申报个人财产。申报的期限，不仅包括任职前、任职中，甚至包括离职后。在美国，由于不严格执行申报制度而丢官的大有人在。1989 年，美国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被迫辞职，起因就是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包括曾超规定赚取讲课费，而他的妻子贝蒂曾超额收取别人赠送的礼品等。由此，赖特也成为美国 200 多年来首位因财产申报问题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一项 20 多年难有结果的改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对腐败有着重要抑制作用的制度，在中国却迟迟未能建立。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有关方面就着手讨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直到 199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直接涉及掌握巨大权力的各级党政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这项原本意义重大的立法几度搁浅。在无法可依、官员腐败又日渐盛行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只好采用惯常的做法——即试图靠政策规范官员的财产申报行为。但由于整体上缺乏法律依据，又是内部申报，所以不少地方都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值得庆幸的是，这几年来，一些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 年，新疆阿勒泰地区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从 2009 年 1 月 1 日起，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人称之为“破冰之举”，并概括出四大亮点：一是由“收入申报”扩大为“财产申报”；二是财产申报由个人扩展到家庭成员；三是申报的财产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四是离任申报延续三年。可以说，阿勒泰地区的这一

“破冰之举”对于预防腐败、建设廉洁高效的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建立官员财产公开制提供了良好“范本”。

一石激起千层浪。“官员财产申报”这项已被讨论、争论了 20 多年的制度,终于在一个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西部边陲率先示范了,社会给予了高度关注。无独有偶,2009 年 1 月,浙江慈溪也宣布该市已试行官员廉情公示制,并将全市 300 多名现任副局(科)以上官员的廉情公布在本单位的政务公开栏里。慈溪试行的官员财产公示,比阿勒泰更为彻底,又因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但慈溪仅在单位内部公示,公示结果外人不得而知。就新疆阿勒泰的情况看,2009 年第一天,55 名县(处)级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申报表如期在网上公示了。尽管这 55 名副县级领导干部中无一人填写本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接受单位和个人赠送的现金和各类礼金,但社会的整体反应仍然是积极的。这说明,中国老百姓对政府官员的要求,并不是过分的。

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是根本原因

一项制度的确立,20 多年几无结果,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悲哀和困惑。就像社会一再拷问的那样:我国的“政企分开”和“转变政府职能”不也进行 20 多年了吗,为什么“分开”和“转变”如此之难呢?这确实又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说,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这些带综合性、全局性的问题一时半会儿难以理出个头绪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样相对单一的问题就不应如此了。

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酝酿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时,官员腐败问题远没有后来那样严重。按理说,一个问题越突出,就越应该成为下决心解决的重点,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相对也能更快一些,但为什么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会如此艰难呢?这些年来反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党的十六大以来仅省部级腐败高官就处理了几十名,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但实事求是地说,如此大的反腐力度,仍未能有效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真正建立起包括官员财产申

报制度及在法制框架内一系列真正奏效的监督制度。

这一框架难以建立的最大症结,笔者认为,不是目前条件不成熟等客观原因,而是这背后的既得利益群体的主观阻挠问题。换句话说,当我们的某些改革涉及官员自身的权益,而这些人又掌握着决定政策制订和政策走向的巨大权力时,问题就会变得异常艰难。这也是一些民众一再质疑的重要原因:为什么涉及普通民众的教育、医疗涨价以及管理收费等事项时,有些政府部门决策会如此果断、快速,而那些涉及官员自身特权、行政性审批、部门利益的改革又会如此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自身不仅要提出改革的目标、举措,更要依靠广大民众主导改革的进程。如果我们的改革只改群众,不改自身,不敢果断地触及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群体,改革就很难真正深入。换句话说,要真正重构改革共识,就要敢于在包括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废除特权等涉及政府、官员自身的一些关键问题上入手,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提振公众对改革的信心。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屋 2009 年第 7 期目录

史海钩沉	一支射向法家学说的响箭 言路之险胜似沙场	张克锋 鸣 弓
说长论短	也谈“张爱玲故居”之文化意义(外一篇) 写在雷妍作品集正式出版之际	陈福康 张 泉
艺术天地	简明中国绘画史及画家评述 读画闲笔	杨福音 韩 羽
灯下随笔	中国人到底需不需要“管”? “而明日无鱼” 说一说“文人相轻” 钱,真的是王八蛋——读《货币战争》 趣话马屁诗	李晓灵 陆志成 王 志 龚 华 李秉鉴
书屋品茗	人间多彩赖此花——郁金香花卉逸史 人们,我爱人们,保持清醒吧! 在寻求国家的庇护中失去“自由” ——评霍布斯与他的《利维坦》 《基督教经典译丛》总序 三部宋版书的命运 大螺居杂论 浅析《透明的红萝卜》主人公黑孩	兰殿君 哈 米 吴克峰 何光沪 田鹤年 刘世南 刘晓克
人物春秋	与毛泽东有关的流行词语 一言难尽的《寻常往事》 长沙明德学堂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胡松涛 燕 妮 雷建军
裁书刀下	文化不曾断裂,绝非中华一家! 对《状元春秋》一文的质疑	赵复兴 陈福季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6.00 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职位最高的胡风分子彭柏山

● 王文正 口述 沈国凡 整理

—

是否逮捕彭柏山,中共上海市委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彭柏山,又名彭冰山,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初期参加新四军,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副政治委员。1951年转业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协助部长陈望道工作。

此时我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任政权建设科科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南办公厅在衡山路十号,民政部在前面的大楼,文化部在后面的大楼,我与彭柏山经常见面,但由于不是一个部门,很少交谈。彭柏山当时穿一身旧军装,头上有时戴一顶军帽,腰挺得很直,走路步子很快,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形象。可是,他与别的军队下来的干部不同,上衣口袋上,总是别着一支钢笔,面部显得很清秀,明显带着几分书生气。

1953年,彭柏山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早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左联”时期,彭柏山就与胡风相识,并有过一定的交往。胡风非常欣赏彭柏山的文章,认为有一种向上的朝气与文学的灵气。1950年二十四军在徐州驻防的时候,胡风因事路过,彭柏山在军部热情地接待了他——这成了彭柏山的一条重要罪状。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公布了有关“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其中在有的信件中牵涉到了彭柏山。

根据中央和公安部对于清查“胡风分子”的要求,中共上海市委立即召开有关会议。

会议上,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第二书记陈

丕显,副书记马天水、魏文伯,常委、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等人主张立刻逮捕彭柏山。

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员也都同意。

可是,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市委组织部部长王一平和另一位市委有关部门领导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些公布的材料不是彭柏山本人写给胡风的,也不是胡风与彭柏山之间的交往信件,在没有对这些材料进行调查核实的时候就抓人,而且被抓的人却是我们市委的一个部门领导,一个党的高级干部,这样有些不够慎重。提出作为内部审查,可不必逮捕。

两种意见在会上发生了争论,争吵得也相当激烈。

可是,市委主要负责人却仍然坚持要抓人,这种主张在会上得到了多数人的同意。

会议结束,市委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丕显签署了逮捕令。

逮捕彭柏山的任务由公安局文保处执行。

当锒亮的手铐戴上这位宣传部部长的手上时,他感到十分惊讶,对执行任务的人员问道:“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执行任务的人员将逮捕证递给他,说:“不会错的,这种事情还能搞错?”

彭柏山痛苦地摇摇头说:“好吧,我就跟你们走。不过事情弄清楚后,我还是要求你们几个陪着回来。”

彭柏山是被捕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中职位最高的干部。

上海被捕的“胡风分子”,大都被关在市公安局南市第一看守所和建国中路二十六号,唯独只有彭柏山一个人没有被关进监狱,而是被单独关在淮海中路一个局处级干部所住的宿舍里,这个地方名叫新康花园。在这套房子里一切生活设施

齐全,算是对他的一点“优待”。

由于上海被认为是胡风活动的“老巢”,是胡风集团在全国最顽固的一个堡垒,因此攻下这个“堡垒”,对于整个胡风案子事关重大,“胡风专案”办公室除了接受市委领导之外,还同时接受公安部的直接指示。

为了加快进度,对于被捕的“胡风分子”的审讯,从开始时的不太明确,到后来进行了一定的分工,王良负责审讯的是罗洛,张一天(文保处科长)负责审讯的是贾植芳,张振奎(文保处科长)负责审讯的是耿庸,我除主要负责审讯张中晓和尚丁之外,还参加了对梅林、何满子、彭柏山的审讯,主要负责审讯彭柏山的是从公安部调来担任我们“胡风专案”办公室负责人的宋若侠。

二

同其他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人一样,彭柏山同样也是因为那些被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有关信件被定罪的。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彭柏山的这些“信件”全是胡风或别人写的,没有一封信是他自己写给别人的。

1949年5月30日,胡风在北京写有一封信给路翎,这封信中谈到了彭柏山:

得彭冰山(柏山)信,他到了南京,已给你信约见。或者已经见了面罢。但不知谈得怎样?看情形,新写的东西,可先给他看看。南京做文教工作的白丁,从前也在一起过,也许柏山介绍你见他。

杭州几个人,我曾给柏山介绍过。这次来信没有提。看情形,问到时可提出谈谈。如见到白丁,也可提出谈谈。在介绍给柏山时,我曾说到政治上我绝对保证。小刘、罗洛在上海,有机会时也可提出谈谈的。

这里所说的白丁就是徐平羽,在北京出差时被当成“胡风分子”逮捕。

其实这是一封友人之间相互请求对方给以帮助的信件,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存在着任何的“反党行为”。可是《人民日报》在公布这批材料时,将其中的“小刘、罗洛”注释为“均胡风分子”,这“画龙点睛”的一笔,问题就搞大了,“革命觉悟”极高的人们一下子警惕起来,原来彭柏山是

在接受胡风的“指示”,准备将一部分“胡风分子”安插在他所管辖的区域里,为胡风培植反动势力。

这么一分析,又加之当时处在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高潮中,彭柏山就是有一千张嘴也是辩不清楚的。

1952年3月4日,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再次谈到彭柏山:

华东一塌糊涂,上海当然也如此。现已调柏山接黄源副部长的工作,可见是迫不及待了。但在柏山,如果没有可能开辟岗位,那只能是一个打扫前人的臭茅房的玩意儿。……他后天来报到接事,大概一两个月内能见端绪。

这是一封有关彭柏山工作调动后告诉友人的信。胡风在这封信中,对于这种工作调动谈了自己的看法,当然其中有一些不太文雅的说法,但这在私人的通信中也是常有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一封信,《人民日报》也作为“胡风分子”的一条罪状进行了公布,专案办公室在学习时,却左学右学学不出一一点相关的“敌情”来,可是又不敢公开否认,大家都只好保持沉默。

《人民日报》却对此进行了一种令我们这些办案人员都感到不可理解的注释,这个注释莫名其妙的在“副部长”三个字上做起了文章。

注释称:“副部长”是“即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由胡风集团分子之一的彭柏山担任这个工作,胡风是抱着‘开辟岗位’的‘希望’的”。

如此地分析一封平常友人之间的通信,将这些人生拉硬扯地往胡风集团的身上套,这是造成胡风集团冤案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封信是在1955年5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公布的,而此时彭柏山仍担任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并没有将其定为“胡风分子”。《人民日报》采用先入为主的办法,首先将其定成了“胡风分子”,因此柯庆施为首的市委主要领导立即批准逮捕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也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的。

1952年5月29日,胡风在上海给路翎寄了一封信,信中称:

这里提出,华东剧院(话、歌、交响乐三团共

二百余人),或者还有一个刊物。好处是:独立单位,接触群众。到北京,无论如何不会有这样工作机会的。但困难很多:(一)不在北京,总是若即若离的状态,(二)接触面不能大,被限住了,(三)夏管文艺(副部长),(四)柏、雪二人肩膀只那大,柏在华东可以顶住,但在上面他是不能回嘴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想,文章写起了,争取到京一次,不得已,只好在华东弄一两年再看。此事望与谢、徐二兄谈谈,但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看如何?

这里的“夏”是指的夏衍。“柏、雪”是指的彭柏山和刘雪苇。“谢、徐”是指的谢韬和徐放。

这同样是一封普通的友人之间的通信,内容是有关工作问题。我反复看了多次,没有发现有“反动言论”,也没有发现彭柏山与胡风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或者是在这封信里密谋一些什么。

然而,这封信的确又是彭柏山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一条重要证据,其理由是这封信中所说到的“谢、徐”均是“胡风分子”,胡风在信中所说到的另外两个人——彭柏山和刘雪苇难道不也同样是“胡风分子”吗?

如此类推,也是造成胡风集团冤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封信同样牵涉到彭柏山,这封信是路翎1952年3月11日从北京邮给胡风的。

信中说:

柏山接那摊子,实在是很难的。甸兄说,现在不接这些玩意最好!不过我以为,他也可以和那里面的那些现象打一仗,揭露出更多的蝗虫来的。积极的建设,现在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希望他不至于被那黑压压的一大片拖得不能动弹。

这里的“甸兄”指的是卢甸。

这封信是在彭柏山被捕以后公布的。

信中的内容,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是关于彭柏山工作调动的事情,友人之间在相互谈着各



彭柏山(1910—1968)

自不同的看法。当然,信中用了一些常人所无法看明白的词语,也许这些词语路翎的确是有所指的,或者说的确实是对这次彭柏山的工作调动与当时文艺界的形势有着自己个人的不同看法。这些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也是合乎宪法的。

公安侦察人员认为这封信中所提到的一些不同看法,可以通过帮助和教育得到解决,不能将此列入为彭柏山的一条罪状。

可是,这封并不是彭柏山自己所写的信,却成了他的一条无法摆脱的“罪恶”。

这封信后来还是被《人民日报》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在第三批材料中公布了。

对于“柏山”,《人民日报》的编者注释为“即上海的胡风分子彭柏山”。“接那摊子”注释为“指彭柏山获得了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北京的胡风分子们把这看成是胡风反动集团的一件大事,对此十分注意”。“‘那些现象’‘蝗虫’‘黑压压的一大片’”注释为“这些都是胡风分子咒骂革命的文化工作和文化工作者的说法”。“积极建设”注释为“指胡风集团的反革命事业”。

在决定逮捕彭柏山之前,《人民日报》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牵涉到彭柏山的只有四封信,而且都是胡风直接写给路翎的,有些事情彭柏山并不知道详细情况。在公布的第三批材料中,没有胡风给彭柏山的信。仅仅根据胡风写给路翎等人的信,就草率的认定了彭

柏山的“关系”。

经过了这样一番注释,作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彭柏山,自然就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胡风分子”了。

三

彭柏山被定为胡风分子的另一条罪状,就是他曾企图帮助胡风解决工作问题。

建国之后,由于解放前设在上海的旧文学工作者协会被在北京新成立的文学工作者协会所取代,并换了新的领导人。而胡风对于安排在《文艺报》的工作不太满意,因此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

除了这个以外,胡风在思想上也很苦闷,对周扬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现在革命胜利了,但却没有了自己的位置,显得有些不公平,认为这些都是周扬和林默涵、何其芳等人所为。

为此他曾找过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可是最后仍未得到较为满意的答复。

就在这个时候,彭柏山接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

在彭柏山接任之前,担任这个副部长职务的人名叫黄源,这个黄源是当年鲁迅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中曾经为之辩诬的三个人之一。可是在建国初期,在文艺整风中,他被认为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经济上很混乱,因此被上海的报纸点名进行了批判,很快就下台了。

胡风与彭柏山的关系一直很好。彭柏山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后,处在困境中的胡风无疑会感到高兴。

1951年,曾在彭柏山手下担任过文艺处长的刘雪苇负责筹备华东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时,曾提议让胡风出面担任主席,后来上报时却被否定了。

彭柏山上任后,曾极力帮助胡风,努力解决他的工作问题,以帮助他弄一个栖身之地,消除心中的烦恼。

1952年3月17日胡风自上海给路翎写了一封信,谈了这件事情:

柏山来后,想帮我弄到华东,留在上海。但探问一下,觉得中央不会批准(他的意见可以在此

通过),所以主张只弄自己的问题,不要提意见云。

由此可以看出,彭柏山的确是帮助过胡风的。

可是胡风是一个知名人士,彭柏山说了不算数,得有中央的批准才行。因此在彭柏山到北京时,胡风便找他了解了一下情况。彭柏山如实地告诉了胡风,说是中央不同意胡风的某些文艺观点,希望胡风能够作一些自我检讨。如果胡风能及时对自己的文艺观点提出自我批评,那么上面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将这件事情公开的提出来。

彭柏山同时还告诉胡风,你的问题不搞清楚,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就不要急着搬到北京去,去了也没有用。

胡风听从了彭柏山的话,认为自己现在急着搬到北京去也没有用的。一来工作的事情一直被搁着不理,搬去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二来只要将自己的事情弄清楚了,随时都可以搬,也用不着这么着急,现在自己远在上海,离那些人远一点也有好处,否则对自己不利。

不久,彭柏山告诉胡风,说是周扬将到上海来,让胡风好好的与他谈谈。

于是,胡风遵照彭柏山的建议,在上海专门找过周扬,但两个人谈得很不投机。

在谈话中,周扬指责胡风是在“抽象地看党”,是“个人英雄主义”。并说胡风已经将全国的党员作家都“批评尽了”。同时还指责了胡风当年在重庆时,与乔冠华等人的“才子集团”的亲密关系。至于工作问题,周扬则同意回北京后再商量一下,并约胡风如果有机会到北京再谈。

在这种情况下,彭柏山建议胡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将自己的情况反映一下。并同时劝胡风,应该写一些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心得体会之类的文章,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以此将自己的问题解决。

要是在过去,个性倔强的胡风是不会听这样的话的,这次他却听从了彭柏山的劝告,写了一篇题为《学习,为了实践》的理论文章,谈了自己学习、纪念“讲话”的体会。

彭柏山想帮助胡风解决工作的问题未能实现,可是却通过他的老部下刘雪苇,为胡风解决了几个友人的工作问题,他们是罗洛、何满子、王

元化、张中晓、张禹、耿庸等人,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了“胡风分子”。

也就是这个时候,胡风开始着手准备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反映自己的情况。

四

彭柏山开始是作为“胡风分子”拘捕的,在审讯中主要也是追问他与胡风集团的关系,可是不知怎么,后来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说彭柏山是出卖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的郭亮的凶手。

专案办公室每天加紧审讯,可是审去审来也审不出一个结果。

于是,负责彭柏山一案的宋若侠便多次赴湖南调查,回来后对于所说的彭柏山带领国民党特工人员抓郭亮的事情基本上给予了否定。

1956年宋若侠调离“胡风专案”办公室,他的办公室负责人的位置由公安部新派来的方治华接任。

这年4月,我从四川调查尚丁、曾卓的特嫌问题回来,就被方治华叫住,让我同他一同去新康花园审讯彭柏山。

当彭柏山被带进审讯室时,他显得很平静,坐在我们的对面,用一双显得有些忧郁的目光看着我们。

方治华问道:“彭柏山,你想一想,你的问题还有什么没有谈的?”

彭柏山说:“该说的我都向组织上说了,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问:“你怎么这么肯定?”

答:“是的,就这么肯定,因为我不会编造事实。”

问:“彭柏山,你曾经是党的高级干部,你应该知道你问题的严重性。”

答:“是的,我知道。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不能随意乱说。”

……

从审讯的情况来看,彭柏山态度不错,没有我审讯张中晓时的那种抵触情绪和拒绝回答问题的现象,他是每问必答,有根有据,也从不牵连别人,只谈自己的事情,遇着有关的人,他都主张

要是自己的责任,与别人没有关系。

当问到与胡风的关系时,他也毫不隐瞒,一点一点的都作了交待,特别是近一年多来,他如何为胡风的工作问题想办法,又如何动员胡风找周扬面谈等等,与我们掌握的事实基本相同。只是他认为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正常交往与活动,根本就没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目的,更没有反党的意图。而我们则认为他与胡风的这些活动,都是在进行一种反革命阴谋。

对于公安机关的说法,他表示不能接受。

我由于刚外调回来,不太了解情况。加之在调查尚丁“军统特务”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感觉到胡风集团一案有着许多与事实不符的人为的因素。在当时的形势下,我虽然也有“左”的思想,做过一些“左”的事情,但作为一名办案人员,尊重事实应该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一点我还是始终不能忘记的。对于彭柏山一案,我一开始就有看法,但又不好说,因此在陪同方治华对其进行审讯时,我一言未发。

审讯下来后,方治华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彭柏山与胡风的那些事情,都比较清楚了,我问还是那一套,没有什么好问的。

后来,审讯接触到了最实质性的问题,关于郭亮之死。

郭亮,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先后任中共湖南、湖北省委书记。1928年3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杀害。

方治华问:“你认识郭亮吗?”

彭柏山摇着头说:“不认识。”

方治华说:“可是有人说你认识。”

答:“别人说是别人的话,但我真的不认识。”

方治华说:“我们希望你能向组织上老实交待,不要隐瞒,否则后果得由你自己负责,我想这个道理你是明白的。”

答:“我当然明白,但我不能无中生有,这样做也是欺骗组织嘛。”

方治华见彭柏山始终不肯接触实质性的事情,就追问道:“你知道郭亮是怎么死的吗?”

答:“从党的报刊上知道,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

(下转 51 页)

哀李炳泉之死

• 李普

我认识炳泉,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建国前夕我被调回新华社总社,三年后调离,这个期间我认识了炳泉。我记不起同他有过什么个人交往,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他总是带着诚恳的微笑,态度谦虚厚重。近来为了出版怀念炳泉的书,老友邢方群和李炳泉夫人刘可兴来找我,还有几位朋友多次谈起他。每次谈起,他总总是诚恳地微笑着的脸、那谦虚谨慎的仪态、那恂恂君子的形象,便在我眼前显现出来。

我最初认识他就听说他在地下工作期间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我至今记得的有两件大事。一件是中共中央迁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以后,国民党方面探到了,准备重兵突袭。李炳泉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以他为首的职业青年支部及时得到和传递了这个情报,使中共中央得以转危为安。我听过传达,毛泽东说当时中央身边部队很少,便唱个“空城计”,由新华社发表新闻,说我军已经获悉这个诡计,现正严阵以待云云。说得有鼻子有眼,对方见计谋败露,取消了这次行动。另一件是北京得以保全而没有毁于战火,李炳泉也有一份功劳。那时候北京叫做北平,平津战役中炳泉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代表,会见国民党华北和北平的最高军政当局傅作义将军,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意图,然后陪同傅作义的代表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结果是我国这座文化古城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炳泉从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时期开始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应当说贡献很多。别的不必多说了,仅仅是参与了这两件事,就足以令人敬重,但是他却表现得若无其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他那谦虚诚恳的微笑就更加叫人钦佩了。严

格说来,不公然自吹自擂并不太难,许多人未必做不到。炳泉的过人之处在于叫人看不出来他做了些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炳泉对他所做的一切泰然处之,表明他真正打心里认为,那一切都是他应当做的,不值得一提。有些人喜欢摆谱、喜欢摆老资格,这个“摆”字实在妙极了。他们不需要吹嘘什么,他们那神气、那身段、那姿态就十足表现出来。炳泉不“摆”,虽然他有摆的本钱,他的资格比某些“延安来的老干部”还老一点。宏观地说,这是那一代地下工作者的共像,他们把默默地奉献作为自己的职责。微观地说,这是他那高贵品质的表现。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毕竟并非每一个地下工作者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他那诚挚宽厚的笑容给我的印象如此之深刻,我相信我说这些话没有说错。可惜我见事迟,那时候没有这份敏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交上他这样一位可敬的朋友。

1971年我回到新华社,他已经不在了,他已经在1970年被迫害死去。他去世之前是新华社外事部主任、全国记者协会书记。1978年10月新华社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我代表“李炳泉治丧委员会”致了悼词。老实说,最初我只是在办一件例行公事,所谓致悼词不过是念悼词罢了。但是悼词中说到了他一些事迹和他的遭遇,我念着念着自己也深深感动了,我记得我渐渐地不得不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把悼词念清楚。这个可敬的人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啊:他一生致力于革命,但是他被他所从事的事业吃掉了,吃得尸骨无存。那天的仪式叫做骨灰安葬仪式,其实骨灰盒里只有他用过的一副眼镜、一顶帽子。

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呢?最标准的说法是被

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有两种可能：自杀或者他杀。李炳泉属于哪一类，现在已经很难追究，并且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追究，我只是要想一想。在李炳泉死去的时候及其以前的许多岁月，人们不仅没有不说话的权利、没有不举手的权利，而且没有不活的权利。哪怕是被迫害得走投无路而自杀，也是犯罪。如果李炳泉是自杀的，他的罪名就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当时那些人果然给他加了这个罪名。

炳泉有自杀的可能吗？“不可能！”陈理昂在电话里十分肯定地回答我说。他和炳泉属于同一类“犯人”，每天在“专案组”管制之下一起劳动。在炳泉死去的两天之前，他们偷偷地交换过对形势的看法，当然主要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命运。那天炳泉说他们的问题一定会弄清楚的，这点是毫无问题的，党决不会冤枉他们的。“一个具有这样的信念的人会在两天之后自杀吗？”两天以后专案组贴出大字报，说李炳泉这个“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畏罪自杀”了。理昂说得很激动：“我绝对不相信，那完全是胡说八道！”

陈理昂当然没有资格去察看尸体。王唯真看到了照片，他说照片很可怕，看来有伤痕，嘴角有白色的东西。我同几位朋友在电话里讨论：难道炳泉是服了安眠药吗？吃安眠药自杀的人是死得很平静的，而且他被关押着，得不到安眠药，也得不到悬梁的绳、割腕的刀片等等任何可以自杀的条件。既然不是自杀，就只剩下另一个可能：他杀。那么，那“他杀者”是谁呢，有什么证据呢？以上所说的都是推测，不是证据。而且我在前面说过，我只是要想一想，不是要追究，追究得一清二楚也不能使李炳泉复活。至于那些迫害者，简直不值得一提，他们普遍地不受法律的制裁，但愿他们能进行道德的自省，提升自己的灵魂。现在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来想一想，作为一个问题，李炳泉之死很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

伟大领袖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国民党赶到几个小岛上去了，这件事全党都赞成、都说好；一件是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党内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两件事。前一件，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算起，到1949年，用了二十八

年。后一件，从1949年算起，到1976年，用了二十七年。对后一件事人们往往只从1966年算起，那是不对的，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酝酿和发生、发展的过程。如果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毛泽东心血来潮的冲动，那就把他老人家和毛泽东思想太小看了、太低估了。那是毛泽东思想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1949年建国以来接二连三的批斗运动必然要走到的一步。我这篇文章之所以强调想一想，目的不在于追究，是因为在这个大形势之下，大家在劫难逃。至于受难者是李炳泉或者张炳泉、王炳泉，迫害者是女人或者男人、是这些人或者那些人，都带有很大很大的偶然性。至于双方个人的表现，当然大不一样。这大不一样的表现，决定于各人的品质、修养和经验等等，这又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最大恶果之一是败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其中最显著的是鼓励说假话，完全不顾事实，可以任意剪裁甚至捏造事实，断章取义更不在话下。总之，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信条之下，践踏唯物论的起码要求。说假话的有奖，不说假话的倒霉，说真话的受罪。林彪有一句名言，“不说假话做不成大事”，这是他的经验总结，他说得很坦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经过四年之久的批斗审查和劳动改造之后，得到了“解放”，取得了进入“干校”的资格。在“干校”听到我们机关发生过一件很可笑、其实应当说是很可耻、很可悲的事。有一位中层干部，当然也属于走资派，他做了一个报告，讲他怎样学习和怎样改造的收获。他说他曾经当了特务，经过学习改造和激烈的思想斗争，觉悟了，交待了自己的罪行。感谢党的宽大，他一定痛改前非。这是个表演大师，他说得痛哭流涕。他得到了掌声，特别是得到了当时运动领导者的表扬。我的老伴在牛鬼蛇神之列，虽然不在同一个部门，也必须去听这个大报告。后来才知道那人说的全是假的，全是他编造的。那时我们那个机关叫做中共中央中南局，文革中撤销了。我不知道这位表演大师后来到了哪里，是不是升了官。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受批评，更不会受处分，因为他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很有力，立了功，只应当嘉奖。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样的事

和人,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多得很。

整个说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的翻版。这两次运动的最高领导都是伟大领袖,延安时期的总学委和后来的文革领导小组事实上都代替了政治局和书记处;康生那时是总学委副主任,这时是文革小组顾问,这个格局也大体不变。不过文化大革命声势更大、范围更广,行为更公开而毫无顾忌罢了。比如任何单位都可以自设监狱、自立公堂,都可以拳打脚踢动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地逼供信,李炳泉就是在这样的监狱和公堂里遭受那一切的。而所有这种种,没有一样不是一脉相承,沿袭着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那一套。别的不说了,不要扯宽了,还是只说鼓励讲假话这一条。

我认为鼓励讲假话、老实人吃亏,败坏了我们民族的道德,使我们中华民族道德沦丧,这是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和文革最严重的罪恶和祸害。《炎黄春秋》2003年第10期刊登了方实《我在延安被“抢救”》一文,从1943年3月到1946年2月,他被关入监牢受难将近三年之久。他毫无“问题”,突然被戴上手铐关到监牢里,同时被命令不许对同屋的犯人说自己的名字,只许说牢里给他编的号码。

他是怎样从监牢里放出来的呢?后来“组织上”号召“坦白”,并且正里巴经地出现了所谓的“规劝组”。方实写道:“一天,规劝组有人悄悄对我说:我就不是特务、汉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代了就行了。写什么都可以,四顶帽子(叛徒、托派、汉奸、特务)随便给自己戴上一顶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当上特务的、上级领导是谁、带了什么任务、如何混入边区、又发展了谁等等讲清楚,……”

方实考虑了很长时间,终于在1944年初“坦白交代”了。他说他的哥哥叶笃正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当了特务。他到延安来是受他哥哥叶笃正的派遣,他把在延安获取的情报送给他。方实接着写道:“交代以后果然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放出,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当时我想,反正叶笃正也不是党员,又在大后方,我说的事情难以查证,任我坦白。虽然被宽大了,待遇也比较自由了,但是当时我内心却极为痛苦。过去我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

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我的亲兄弟是我的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如果现在再发生类似延安抢救运动一类的事件,即使置我于死地,我也一定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再不做这样的丑事、蠢事、傻事了。”

读着他这些话,我激动得几乎要掉眼泪。方实是我的老朋友,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想不到他竟做了这样一件事,而且这许多年来他经受了多么揪心的痛苦。他现在把这件事和盘托出,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何等的胸怀!这种出自真诚的勇气和反思使我十分感动,十分敬佩。

方实被释放以后又过了两年,1946年2月,他终于等到了组织对他的甄别结论,这时候他才明白,关押他的主要依据来自一个同志的揭发。方实写道:“至于她为何诬赖我为特务,我想,在那个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在逼供信下为了过关乱咬别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是也在高压之下诬说我的哥哥叶笃正是我的特务上级,派我到延安来‘搜集情报’吗?”

我没有去过延安。延安出来的人告诉我:那次整风审干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检举揭发,然后坦白交代、继续检举揭发。这两个阶段都要开许多大会小会造声势,会上领导号召,群众批斗以及树典型、立标兵等等。最后一个阶段是逐个甄别作结论,落实政策。我见过一位女士,人们说她乱咬了許多人,后来那些人经过批斗审查甄别都没有问题,都恢复了自由,是党员的恢复了党籍。这位女士响应号召有功,因此释放的特别早,当然更不受处分。

世界上有那种恶劣的投机取巧的聪明人,也有善良得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大傻子。我看炳泉就属于后一类,当然他有他的特点。在地下工作中,在敌人的营垒里,他智勇双全,游刃有余。但是当他来到自己这方面,到了自己的家,他就丧失了警惕,解除了武装。他秉性善良忠厚,地下工作强调组织纪律性,组织纪律性特强又成了他第二天性。他当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的时候,这一点曾经为延安来的国际部党支部书记

所称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狂风暴雨,来势的凶猛尤其使他做梦也想不到。这里还应当加上我们古老的中国的一句古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只有不孝的儿女。”这许多因素综合起来发生作用,把李炳泉这位智勇双全的斗士变成了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大傻瓜。他傻到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和专案组看成了党的组织,党的代表,看成了自己的领导和上级。

专案组在他死后给他做了结论,说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他的“主要罪行”的第一条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使用了最恶毒的语言,诽谤和咒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每一个领导同志都进行了诽谤和攻击,并且还全面系统地攻击和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

这条“罪行”是怎么来的?是有人听到的吗,不是。那是专案组捏造的他和他妻子的“私房话”。既然是“私房话”,别人怎么知道?开头李炳泉当然不承认。后来专案组的人装腔作势,手中拿着一卷纸,以表演大师的手法,说他妻子已经揭发了,这是她揭发的材料。在李炳泉心目中,专案组是党的“组织”,“组织”难道会作假?这个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想不到他以命相许的党组织不仅会作假,还会欺骗他,诈他!于是他只好认账,签字认可。难道他不了解他的妻子,不相信他的妻子吗?否!他当然了解,当然相信。但

是,他妻子是一个“个人”,“个人”可能犯错误,何况在这种大风大浪之中!而专案组是一级组织,是党的代表!这里我想起那位著名的作家赵树理。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人家逼他承认他是叛徒,逼得他死去活来,他无可奈何,便说:“党现在需要我当叛徒了,我就当一回吧。”我跟赵树理很熟,他为人忠厚,也很幽默。幽默被称为含泪的微笑,我们想想他这句话里饱含着多么多的眼泪!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当时文件里和报纸上天天这样说,唯恐人们执行不力,还不断发出“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等的“最高指示”。造反派也罢,专案组也罢,都是奉命行事。他们手中有尚方宝剑,好比电视剧中“如朕亲临”的金牌,所以他们确实也都是党的代表。至于有些人特别地奸巧欺诈、残暴凶险,企图捞好处,向上爬,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被培养起来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也同他们自己那低劣的品质分不开。总之,在地下工作中足智多谋、英勇无畏的李炳泉,在他为之拼命奋斗的新社会变成了一个举止失措的不能自保的大傻瓜。他妻子刘可兴为这个“私房话”的问题跟他吵了一架,然后夫妻俩抱头痛哭。我希望可兴把那场争吵详细写出来,她说她一定要写的。我希望她的回忆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炳泉和他的死,从而进一步看清那场史无前例、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十年浩劫。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上接 47 页)

方治华:“请你说详细一点。”

答:“我就只知道这么多。”

方治华见这样审下去没有结果,就单刀直入地说:“有人揭发说,你曾带人去抓过郭亮。”

彭柏山一听立刻站了起来,显得很激动,大声地说:“这是有人故意造谣迫害!”

方治华说:“你先别激动,我们也没有给你任意定罪,但你得说出让人信服的理由来。”

彭柏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他很快的冷静了下来,朝我们笑了笑说:“你们能相信这样的话吗?在胡风的问题上我可能有错误,但这郭亮之死与我却毫无关系。你们想一想,我现在才多大岁数,1928年郭亮死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社会

上的普通青年,还没有加入党组织,而且后来我主要在上海参加‘左联’的文艺工作,怎么会认识郭亮?怎么有可能带人到湖南去抓他?这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难道你们也相信这样的话?”

彭柏山于是与我们展开了说理“斗争”,我们听了觉得他的那些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审讯无法再进行下去。

我们将对彭柏山的审讯情况通过“胡风专案”办公室向上级作了汇报,但最后还是将他定成了“胡风分子”。

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省又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最后被迫害致死。

一场悲剧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读吴玉章的“哭吾妻游丙莲”有感

——解读一位老革命家的亲情和操守

● 朱维民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越剧院到人民大学去慰问正在大炼钢铁的人大师生。演出的剧目是傅全香和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为表示对艺术家的尊重，那天晚上学校有关人员特地请来了老校长吴玉章同志观看演出，

在演到祝英台哭坟的那一场戏时，在台上侧幕边看戏的人大工作人员开始不安起来，因为他们发现坐在第一排中央的一直笑容可掬的吴老，他的神情开始发生变化，他微微低下了头，眼中闪出泪光，进而泣不成声。于是赶紧通知校长办公室的干部，请他们把吴老送回住所，说：“真不该请吴老来看这样的苦戏，看把老人家哭得多伤心！到底年纪大了呀。”

最近，一次偶然的的机会，看到了吴玉章同志一篇从未发表过的短文。这是吴玉章同志1946年10月在延安接到他生平唯一的妻子游丙莲女士在老家四川病故的消息后，百感交集，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的悼文，赖以宽舒重压在心中对亡妻长期以来缺少照顾的不得已和歉疚感。文章朴实无华，短短千数字，却写出了那个那一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

关于游丙莲的生平，今人知之甚少，只知她是由父母之命嫁到吴家的，一位四川缠小脚的农村妇女，似乎没有读过什么书，而吴玉章却是一位那时在中国被视为国之栋梁的，不仅身穿洋装，而且相貌出众的留洋学生。任何人看来，那都是一段并不匹配的姻缘。而且他们统共只有六年共同生活的时间。那么，是什么维系着这段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婚姻直到双方生命的终了呢？难道仅仅是约束于一纸婚书的承诺吗？既然有着那么大的文化差距，婚姻生活又是离多聚少，这对夫

妇还能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夫妻感情吗？这篇悼文给了我们解答：

文章第一段里写道：“我哭丙莲，我哭你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结婚有五十年，我离开你就有四十四年。我为了要打倒帝国主义压迫，专制主义的压迫，社会生活的压迫，在1903年正月，离开家庭到日本，随即参加革命。家中小儿女啼饥号寒，专赖你苦撑苦挣。虽然无米无盐，还要煮水烹茶，使炊烟不断，以免玷辱家门。由于你的克勤克俭，使儿女得以长成，满以为革命成功，将和你家园团聚，乐享太平。……”

看来，除了革命事业，吴玉章也是一个梦想着过太平生活的平常人，有着一般家长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他之所以视游丙莲为他婚姻的最后归宿，除了出于对她对自己参加革命工作的支持而发自内心的感激，作为丈夫，更重要的还应该是对游丙莲人格的欣赏。那是一种传统中国妇女特有的美德，虽然她并不能确切知道丈夫在外面世界为什么要干革命和革命的全部意义，但是她相信他，因为她找不到不相信自己丈夫的理由。于是她独自一个人毫无怨尤地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和在国统区作为革命党家属所必须面对的种种麻烦。这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够做到的，而她却是历尽千辛万苦地做到了。这样的女人应该是值得爱的。女人的美有两种：一种是外貌的美，这种美是有条件的。它会凋谢，会憔悴。另一种则是内在的美，这是源于她行为中所表达出来的真挚和善良。这种综合出来的美会随着时间的积累而愈臻圆满。吴玉章选择的是后者。这种感情是绵长的，坚韧的，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后来为什么吴老一直没有续弦的理由。

吴老对游丙莲深沉的怀念之情,还表现在对于她养育了一对令自己为之骄傲的儿女的感激。女儿长大后,继承了母亲善良的秉性,不幸的是她也继承了母亲多舛的命运。她中年丧夫(丈夫被反动派杀害),带了六个儿女受尽了人间苦楚,还要帮助老母操持家务,侍奉左右。现在相依为命的母亲又离她而去,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吴玉章尽管痛惜她们的处境,却又无能为力,这时能不为她放声一哭吗?其实他的这一哭,不仅哭的是游丙莲,也为女儿的不幸而哭,为全中国有着同样命运的妻子而哭。

游丙莲在艰苦的环境下把他们唯一的儿子吴震寰培养成一个有报国志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这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悼文里写道:

我哭丙莲,我哭你为我养育了一个好儿子,学会了水电工程。他十七岁离开你,二十年在海外使你时刻忧心,他秉承了我们勤苦耿介的天性,和为人服务的精神。他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缁的操守,不贪污腐化而为社会的罪人。十八岁赴法国留学,毕业后就在法国水电工厂服务八年,苏联国家计划局服务四年都得到了好评。他为祖国神圣抗日战争归来,因日寇封锁,机器不能输进,就谋自力更生。他自己设计,以本国的器材建成了长寿的水电工程。国营事业的获利,常常使这工厂占第一名……

然而,就在全国解放前夕,命运又以它新的残酷打击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就是这个在他心底一直引以为傲的儿子,吴震寰也在河南去世了。

民间有一种说法:“人生最为悲痛的事,莫过于少年丧亲,中年丧偶,老年丧子。”而对于吴玉章来说,所有这些伤痛,仅仅是在他两位兄长为革命牺牲后(一位死于辛亥革命,另一位牺牲于大革命)悲剧的延长罢了。也许发生在吴玉章一个人身上的家庭悲剧,在那个时代,正是那些执着的革命者无法逃避的宿命吧。

这篇悼文,给我们说出了一个

革命家庭生离死别的故事,也使我们终于得以解释为什么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戏时,老人会如此的悲痛欲绝。也为我们解释了经历了这样的人间悲剧,吴玉章还能一如既往,坚守一个革命者担负的时代使命的理由。

文章写道:亲爱的丙莲,我们永别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为我中华民族的优秀的儿女牺牲的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无益于事,还因为我们虽然战胜了日寇,法西斯蒂,而今天我们受新的帝国主义和新的法西斯蒂的压迫更甚。国权丧失,外货充斥,工商倒闭,民不聊生。而内战烽火遍地,满目疮痍,我何敢以儿女私情,松懈我救国救民的神圣责任。我只有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之精神,团结我千百万优秀的革命儿女,打倒新的帝国主义,新的法西斯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丙莲!安息吧!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广大的人民。

全国解放后,一直担任共产党中央委员的吴玉章不恋栈于官场,婉言谢绝了请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建议,低调地选择了人民大学校长的位置,把个短期培训班性质的华北大学,居然有声有色地办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国人民大学。这个学校为全国各地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当时极为需要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一个个都成了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同时,为了提高当时大量的文化程度



吴玉章和夫人游丙莲

不高的工农干部的文化素质,他办起了工农速成中学。后来那些有名的像纺织部长郝建秀,作家高玉宝等就是从那里出来的。作为教育家,一个曾经出国留学,看到过发达国家民众知识水平的人,他太知道教育救国的道理了。而这,正是作为革命家,吴玉章此时唯一的选择。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新中国历史建造队伍中一个普通的国家公务员,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吴玉章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和眼泪实践了悼文中对亡妻的承诺。

这是一个真实的,有关革命者的故事。像吴玉章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像他经历过那样的悲剧故事,今天也不会再发生了,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没有人再需要作出像先辈们那样的牺牲。因为今天已经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因而也有人说今天是人欲横流的社会,那些理想主义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这种说法也许有他们的道理,但对于人民的公仆来说,有些理想和原则是永恒的,离开它,你就没有资格进入公务员的门槛,甚至不够资格当一个合格的公民。吴玉章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留下了对照的典范,特别对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这个口号还没有

“过时”,因为经常把它放在嘴上,有时还能为他们的形象加分),却陶醉于已得的高官厚禄,置百姓于水火而不顾,放纵子女亲友对公共财富巧取豪夺,却不允许社会舆论监督的人。对那些轻易爬上领导岗位后不思进取,专工拉帮结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对那些接受政府委派,在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下,振振有词地为自己发下天文数字年收入的某些言必称三个代表的企业高管来说(他们的年收入竟然达到一个普通农民年收入的两至三万倍!),这个口号岂止是讽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羞辱了全国人民,也严重地挑战了立国的初衷,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看看全国各地频发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其起因无非是群众的合法利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因为投诉无门才铤而走险。目的是要引起更高当局的注意。难道这还不足以使那些游刃有余地弄潮于官场和商场之间的新贵们猛醒吗?

他会怎么想,如果吴玉章还活着的话。为了救国,他应该会为哪些人再办一所以如何做人为重点的速成中学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广 告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 2008040039 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 2008050153 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耳聋耳鸣的烦恼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 <http://www.sw-tl.com>

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

• 刘济生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本来就受到束缚的思想被进一步桎梏了。在个人崇拜的阴霾弥天漫地、“左”的错误大肆泛滥的时候,却有极少数人置生死于度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真理的呐喊,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驱。他们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左”的错误、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探索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证明他们是走在历史前面的思想家。尽管这些思想家还表现出某些不成熟,但我们不能苛求他们,他们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支异己力量。研究一下这些思想解放先驱的活动、思想和历史作用,对于全面认识“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大有裨益的。

一、思想解放先驱的实践活动

个人崇拜、“左”的错误思想和政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因这些消极的影响并没有充分暴露,因而,只寥若晨星似的出现了个别的思想解放先驱,如上海林昭,北京陈世忠、郭世英等。他们也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批评了党的一些错误政策。尽管这些风毛麟角式的人物的后果极为悲惨,但他们却在那个时代留下了勇于探索的足迹。他们虽然在人口总数量中占极少数,但却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分布在祖国各地的一种值得研究的特殊社会现象。“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的思想解放先驱,开始较少、中后期较多,可从下面这三个阶段里看一下他们的活动。

第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一月风暴”。这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急骤上升时期。“文化大革命”似狂涛巨浪,席卷各个领域,各个

阶层盲目参加了运动。这个阶段里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以北京市知识青年遇罗克为典型,以他1966年10月写出的《出身论》为标志,表明了对“左”的错误的冷酷思考,并对封建等级制残余(血统论和出身论)进行公开挑战。《出身论》在当时所谓“大民主”的条件下得以发表,印行7万份,翻印百万份左右,传遍各地,影响颇大。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女学生郑晓舟全力支持宣传遇罗克的观点,亦有影响。遇罗克、郑晓舟为宣传真理,批判“出身论”,分别于1970年、1968年献出生命。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公开点名批判林彪、中央文革的个别青年,如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伊林·涤西等。

第二阶段,从“一月风暴”到“九一三”事件。这一阶段全国大动乱,“文化大革命”错误充分暴露,这时出现了一批思想解放先驱。辽宁的张志新对宣传个人崇拜的“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发出抨击,公开表示对林彪、“四人帮”的不信任,并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叫屈。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教师朱守中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而且对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逐个评功摆好、对在台上跃武扬威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逐个嘲讽,并对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党内党外政治生活存在的“左”的错误给以批评,并提出自己的正确观点。他的许多观点不仅有系统性,并经得起历史的验证。青海省的教师贾正玉1969年公开出来反对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政变”。江西省南昌青年学生吴晓飞于1967年到1968年之交,写了40余万字的政论文章,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被打倒的刘少奇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活动和思想作了高度评价。还有山西省青年教师邓思



遇罗克(1942—1970)



张志新(1930—1975)



林昭(1932—1968)

京、青海省青年农民安文忠、甘肃省战士王笃良、福建省干部陈寿图、河北省工人李元富、张坤豪、河南省保卫干部李新夏、贵州省技术员马锦征、北京干部杜长绪、湖南省知识青年丁祖晓、天津公安干部李良、广东省女医生官明华、驻西藏自治区战士石仁祥、黑龙江省哈尔滨铁路局郭维彬等等,他们都坚决反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鸣冤,并不同程度地反对了个人崇拜。上述这些思想解放先驱,除了郭维彬之外,都被当做“现行反革命”处以死刑。

第三阶段,从“九一三”事件到“四人帮”垮台。林彪外逃叛国,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位炙手可热、显赫一时的副统帅的背叛,给千千万万善良的人民上了生动的一堂课,促使了人民的觉醒。但是,远不能说整个人民都觉醒了,个人崇拜还深深束缚住人们的头脑。这一阶段思想解放先驱继续同个人崇拜、特别是同“四人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工人史云峰于1974年7月写好了20多张传单,后来分寄14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政机关,他又写下了标语,张贴在长春市交通最繁忙的胜利公园前面交通岗亭上。传单内容明确提出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并提出普选制的庄严要求。11月初,“四人帮”惶惶之余派人到吉林省协助破案。四川省李天德于1975年8月向党中央、国务院写出《献国策》,上书言事。《献国策》中反对个人崇拜,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的五条罪状。李天德在狱中又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

主要任务提出自己正确看法。此外,驻北京的战士蒋标川、四川省重庆市工人白智清、驻山东省青岛市战士韩爱民、福建省三明市青年干部赵大中、上海复旦大学学员刘秀英等等,也反对“文化大革命”,同“四

人帮”进行了斗争。还有一些先进的个人和集体投入到“四五运动”的洪流之中,起到了组织、宣传群众的作用。除上面介绍的史云峰被杀害于“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其他人在狱中受到磨难庆幸存活。这一阶段的思想解放先驱斗争勇气很足,但一些人没有触及个人崇拜。

“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都受到残酷的镇压。众所周知,张志新被杀害之前,被割断喉管,用一条黑布缠住她血迹斑斑的脖子。丁祖晓被杀害前,因她喊口号,头被埋进一堆生石灰里。她牙关被刺刀撬开,一团棉纱塞进嘴里,当她再次挺立起来的时候,人们只见她脸上粘满石灰,从眼里流出两行鲜血。李新夏在监禁中被打得血肉模糊,鼻子和嘴里都涌出鲜血。一个凶汉,挥着匕首,在李新夏两腿连刺14刀,被活活弄死。史云峰在行刑前,他的颈部皮下注了两针普鲁卡因麻醉剂,嘴里塞满了纱布团,并用医用缝合线把他的嘴紧紧勒上。陈寿图、马锦征也是被封住嘴而被枪杀!

这些思想解放先驱们,为了祖国的前途,他们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历史是最公正的。这些思想解放先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续平反昭雪,他们的英雄事迹得到了表彰并到处被人们传颂!

二、思想解放先驱的理论观点

“文化大革命”时期群众中思想解放先驱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即政治、经济、思想的各个领

域,打破“禁区”,提出了符合马列主义和人民利益的观点。

1.反对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泛滥成灾,成狂澜之势。就在这无法阻挡其发展势头的险恶历史条件下,思想解放先驱们,不畏抛头洒血、勇敢地坚持唯物史观,揭露个人崇拜。遇罗克在1966年1月的日记中写道,“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5月份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遇罗克1968年初于法庭上公开亮出自己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他说:“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他还说:“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张志新认为,“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张志新并对那种早请示晚汇报表示反对和憎恶。朱守中除了有张志新上面这些共同看法之外,还尖锐指出:“过分突出个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就要犯大错误,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值得借鉴。”反对个人崇拜,丁祖晓烈士更是旗帜鲜明。他对“忠”字匾、宝书台、五个第一这些个人崇拜的具体形式,给以猛烈抨击。请看他一张传单上的几段话吧:

“实在,‘忠’字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里太行了,在经济上、政治上处于首要地位。它大于一切,贵于一切,先于一切,高于一切。”

“从现象看,这忠字是地道的、历史上空前罕见的个人崇拜。”

“这忠字更是彻头彻尾的奴隶主义,它叫人忠君,即使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忠字也不会让人造反。岳飞屈死风波亭,就是血的教训。”

“他们要用‘忠’字统治人的思想,使广大人民群众失去民主和自由……”

丁祖晓不仅揭露了个人崇拜的现象,而且揭示了个人崇拜的本质和危害。史云峰在传单上写着:“党的领袖也是普通党员,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共产党不要党皇帝!”更为言简意赅,这些思想解放先驱们,在个人崇拜汹涌澎湃

如潮而来之际,敢于逆流而上,表现了狂澜力挽的气概。

2.反对“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论,思想解放先驱基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遇罗克写道,整走资派“这根本不是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因为“文化大革命”既无政治基础,又无经济基础,所以它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还有许多思想解放先驱,如贾正玉、陈寿图、史云峰等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变”。史云峰等人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大泛滥!这一看法也精当。对“文化大革命”的本质的认识,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思想解放先驱们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遇罗克看到被斗的“走资派”极表同情,他在日记上写了鲁迅那句名言:“敢摸着叛徒尸体痛哭的是中国的脊梁”。吴晓飞为了支持刘少奇,用15个小节、十多个专题对刘少奇在民主革命中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思想进行了研究,总数达20余万字,颠倒被颠倒的历史。张志新也对那些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评功摆好,鸣冤叫屈。朱守中对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中所作的贡献给以充分肯定,并说刘少奇和彭德怀就是林则徐和海瑞的替身。还有许多烈士高呼“刘少奇万岁!”发泄他们对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强烈不满。思想解放先驱们都敢于虎口拔牙,揭露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目的和罪行,并口诛笔伐其主要成员。当时,反对这些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新贵族,都必须舍出性命,而思想解放先驱们都敢于虎口拔牙,揭露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改马列主义,揭露他们把无产阶级政权变成镇压之权,揭露他们搞封建主义、个人迷信,揭露他们煽动武斗大乱天下,揭露他们篡改历史,搞文化专制,揭露他们破坏社会主义生产,把人民搞得普遍贫穷。思想解放先驱们无私无畏,他们的献身精神令人钦佩。

3.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

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是一篇批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代表作。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影响下,千千万万出身不好的青年受到歧视,招工、参军、入党、入团、入学,处处遇到障碍,甚至无法成婚。遇罗克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他呼吁,“填平这人为的鸿沟”。1968年夏,李元富给党组织写了一份《交心书》,其中提出:“我认为从解放到现在,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少了,不是多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现在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制,随着生产和生活的提高,阶级斗争就少了。说阶级斗争还是那么激烈,复杂,是不对的。”这些观点是在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奉为神圣教条的时代说出的,足见思想解放先驱们的理论洞察力。

4. 呼唤社会主义民主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有的思想解放先驱认识到了这一点。朱守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光荣、正确,除其他原因,“其一,党员在党内一律平等,谁都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权利。……”他认为“九大”让林彪当接班人并写进党章,是“用强权代替公理,走穷兵黩武之路。是不得民心之举。”史云峰在传单上写着:“巴黎公社普选制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打倒刘少奇主席违背党纪、国法!是阴谋手段,先戴帽子后打倒。”史云峰反映了人民意志,要求民主选举领导,实行法制,真正体现共和国的原则。丁祖晓写道:“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争取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他们把反对个人迷信和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联系起来。

5. 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这些思想解放先驱,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道路,也做了不同程度的探索。遇罗克撰写了《工资论》,他建议建立新的工资制,工龄形成工资里最基本的不变部分,其余部分按本人的贡献发给。他还提出企业要有更新设备的自主权,还指出,“这种计划经济,很有必要改善”,他已认识到计划经济的缺陷,并且需要改革。朱守中认为人民公社办早了,办糟了,认为大跃进是“拔苗助长”、“杀鸡取蛋”。他充分肯定“产量责任制、扩大自由地,开放自由市场”,他主张贯彻好按劳分

配,讲究利润,扩大再生产。反对“赔本生意”,主张“一本万利”,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讲经济效益。朱守中高度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世界上最复杂的‘万物之灵’正是知识分子。对待他们,必须服之以理,感之以诚……任何简单野蛮的手段和假仁假义的骗术,必然会得到相反的结果。”朱守中认为马寅初的人口论有道理。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主要任务时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使人民过上美好的生活。并不是叫大家勒紧裤带,你打我,我打你,天天制造阶级斗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李天德在狱里“反省书”中有明确认识,他写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王笃良等也具有这种观点。重庆白智涛对张春桥破坏社会主义按劳分配,鼓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给以系统批判,指出张春桥的观点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

以上的叙述已证明,思想解放先驱的所做所想的事,我们绝大多数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敢做,才敢想。他们确是走在历史前面的人。

三、思想解放先驱的历史作用及历史局限

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思想解放先驱们的作用,也表现为限制“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如遇罗克《出身论》发表之后,文章传遍全国各地,各地给遇罗克来信激增,开始每天邮递员送来一堆,后来《中学生文汇报》编辑部派人用麻袋去装。许多读者为作者观点折服,出身不好的青年人联想到政治歧视而痛哭失声。多数思想解放先驱是用大字报、传单的形式进行战斗,虽然马上被收缴、撕毁,但总能和部分群众见面,能够部分地宣传了群众。这些受到宣传的地方和人们,总会程度不同地受到启发,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限制“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作用。思想解放先驱们反对个人崇拜,给处于宗教狂热之中的人们泼了冷水,使受到宣传

的部分人像注入了一针镇定剂,使之冷静、沉思。

思想解放先驱的大胆勇敢行为,也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以打击。每当听到出现了反对他们的人物,林彪江青之流就定为“特大案件”给以侦察、镇压,表明他们在人民和正义面前的恐慌。思想解放先驱们积极的历史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他们的历史作用恰恰是在个人崇拜盛行、民主和法制被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所以他们的作用又是有限的。

首先,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受个人崇拜的影响,什么是真理,要从“最高指示”中去寻找,对这些先驱人物的思想观点,他们是难以理解的。在这场民族悲剧面前,思想解放先驱的悲剧更悲壮一些。他们的牺牲,在当时没有获得绝大多数人同情、理解,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疯子”。他们抱恨以终,付出鲜血的代价,经过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思想解放才得到了补偿。

另外,民主和法制被破坏,使先驱们没有宣传思想的自由。每当他们的大字报贴出去,就会被留下“罪证”撕掉;每当传单撒出去,会立即被收缴,并宣布保留者有罪;每当一个思想解放先驱出现在大地上,就会被抓获、投入监狱。当时,全国性的宣传工具被“四人帮”所控制,每个思想解放先驱的宣传也起不到全国性的作用。人民群众中本来有一个自然传播消息的渠道:交头接耳、一传十、十传百,但在株连日深、钳制人口的政治气候下,人们之间互相信任感很差,也很难传播更广了。没有民主、法制、自由,就没有真理的传播。如果在政治民主化的条件下,思想解放先驱的作用那将不可同日而语了。

思想解放先驱们因其历史局限,他们中多数人的理论、思想显得有些粗糙,缺乏系统性,有的言论也有些片面性。但是,正如恩格斯说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在那种条件下,思想解放先驱们认识的程度,正是认识规律决定的。他们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几年十几年后人们才提出的问题,这正是其价值所在。

四、沉痛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究竟有多少,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1979年以后,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搜集了各地有关这方面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到1981年,陆续出版了三本书,书名分别是《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党和人民的好儿女》、《划破夜幕的陨星》。这几本书列举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先驱人物有44人被判死刑杀害了,只有个别几个人幸免于难。各地公安部门还有一定数量的这样“反革命”,没有人通过媒体表彰他们。所以说,究竟有多少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解放先驱,就是个未知数了。这些人在民主与法治建全的条件下,是一个也不应该判处死刑的。他们都是完完全全在党和国家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见解的。他们有的把意见书直接交给党组织,有的投寄给党组织控制的报刊,有的直接上书中央,有的运用了“四大”(这也是当时法律所允许的)。在程序上他们没有违法。从内容上看,他们完全是为了人民和祖国的利益斗争的,他们没有为个人和小集团私利。退一步说,就是这些人的观点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而不是“反革命”、“反党”的问题。他们之所以敢于上书中央或把意见书交给党组织,完全出于对党的信任。当陈寿图烈士知道自己不久将赴死,还嘱咐妻子要交党费,“交到我死为止”。当时极“左”肆虐,林彪、“四人帮”横行,根本容不得不同观点和意见。

“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解放先驱的悲惨遭遇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必须维护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的各项政治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绝不能是一句空话,要通过宪法和一系列法律,保障人民的民主和自由。这样,“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才不会重演。

社会进步离不开这些极少数思想精英,像遇罗克、张志新这些人,在我们的人群中太少了,像马寅初、顾准这些人,在我们的知识界太少了。一个容不得这些思想斗士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而我们今天纪念思想解放先驱,说明我们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前进了。唯有如此,思想解放先驱的鲜血才没有白流!

(作者是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勇)

金凤汉事件

● 薛攀皋

发生在 1963 年的这一事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金凤汉——金凤汉其人其事；一方面是我们——我们对此做出的反应。

金凤汉是朝鲜平壤医科大学教授。他是研究针灸的。针灸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世界上许多地方许多人用针灸治病，也有人研究针灸治病的原理。人的全身皮肤上有一千多个穴位。在一定的穴位上用针刺，用艾灸，可以引起人体一定的反应，得到治病健身的效果。我们的老祖宗把主要的穴位分成十四个组，它们各自在人的身体表面以一定的线路排列。这就是十四经。经是经脉的简称，是主干。经脉的分支称为络脉。两者合起来称为经络。穴位和经络，单独地或者互相配合地与人的一种或几种生理功能相联系。经络系统有没有实体，是一个长期争论悬而未解的问题。有人认为穴位不是骨、肉、耳、目那样的组织或器官，它只是皮肤上一个范围很小的部位。经络不是消化管、血管那样的管道，而是穴位间的联络通道。但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穴位和经络都有实体，有一定构造。金凤汉就持这种看法。

金凤汉其人其事

金凤汉从 1954 年起研究经络系统，认为经络学说必定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当时朝鲜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到 1958 年矛盾趋于白热化，学术界普遍认为金凤汉的工作不科学，要把他从学术界清除出去，但是领导上支持他，金凤汉的研究队伍很快从五六个人扩大到三十人。1960 年 12 月，金凤汉写出了第一篇研究报告，说是发现了穴位的“小体”。于是朝鲜集中人力建立了经络研究所。到 1963 年 11 月第二篇研究报告《关于经络系统》公布的时候，他的戒备森严、设备完

善的崭新实验大楼里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三百余人。

1963 年 11 月 30 日，在平壤举行了以金凤汉为首的、平壤医科大学经络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报告会。根据报道，金凤汉在报告会上介绍了自 1961 年以来，他们在经络系统方面取得的新成就。他宣称通过形态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组织化学的研究，说明经络系统是有实体的。它是由一种“小体”、一种联络“小体”的“管状结构”，以及在管内流动的一种“液体”等组成的。它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机能形态系统。

和前些年情况完全翻了个，据说在报告会上许多学者发言，高度评价金凤汉取得的成就。他们倡议并获得与会者全体一致同意，把上述新发现的结构，分别以金凤汉的名字命名为“凤汉小体”、“凤汉管”和“凤汉液”。

金凤汉说，凤汉小体不仅存在于皮肤，并且广泛地散布在肌体的深层，和针灸临床得到的经验是一致的。连接凤汉小体的凤汉管，既存在于血管和淋巴管之内，也存在于血管和淋巴管之外。脉管内外的凤汉管走向不同，但结构没有差别。凤汉液在经络系统中循环是由心脏搏动来维持的，其循环速度比血液的循环速度慢。对一个凤汉小体的刺激效应，可通过凤汉管传导到另一个凤汉小体。凤汉小体和凤汉管内含有大量核酸，特别是脱氧核糖酸(DNA)。凤汉管中的 DNA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存在，与均匀的风汉液中的核酸无关。

金凤汉说他们已经基本阐明了凤汉系统的全部面貌。它是一个新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系统，同脉管系统和神经系统不同。他们新的研究成果，相信对于经络系统的广泛说明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现代生物学和医学领域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和原则问题，并且已经在这方面开辟了

新的道路。

我国新闻媒体的异常举动

在金凤汉研究成果报告会之后两个星期，1963年12月14日，我国《人民日报》以第四版半版和第五版、第六版两个整版的版面，全文刊登金凤汉《关于经络系统》的研究报告，同时刊登我国卫生部致朝鲜保健省的贺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认为金凤汉的发现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它表明朝鲜科学家在经络系统的形态学、实验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组织化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为生物学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如遗传、细胞分化、蛋白质机能和代谢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打开了新的道路。经络系统研究的新发现，已经为从新的角度来研究和澄清对人类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的若干问题，如现代生物化学问题，正常控制生物体机能问题，疾病的原因、起源和发展问题，病后恢复健康，增强健康和长寿等等问题创造了条件。毫无疑问，朝鲜科学家的成就，将为现代生物学和医学科学开辟新的广阔前景。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一位外国科学工作者如此冗长的研究报告，还发表推崇备至、全面肯定、毫无保留的评论，这是非同寻常的举动。

中国的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金凤汉的研究报告让人堕入五里雾中。要说兔子之类的家畜或野兽以及人的身上广泛分布着肉眼看得见的特殊构造，而几千年来屠夫、解剖学家、医生、厨师以及切割过和进食过猪、牛、羊、兔等家畜的肉的那么多人谁都没有见着，直到金凤汉才看见这些“凤汉小体”和“凤汉管”，我们怎么能不怀疑？要说在心血管系统这样基本上是封闭的系统里还有一个独立的，但却也是由心脏搏动驱动的“凤汉管系统”，而且血管里边有“凤汉管”，血管外边也有“凤汉管”，像这样的说法，在我们看来是违背常识的。但是金凤汉教授是专家，不是像我们这样只有一些常识的常人。好吧，那么让我们听听中国的专家们是怎么说的。

《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金凤汉《关于经络系统》后的第三天，即1963年12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邀请在北京的院内外解剖学、组织学、组织化学、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的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院部举行了由竺可桢副院长主持的“关于经络系统座谈会”。在此之前，12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摘要发表《关于经络系统》。这一天正好是政治学习日，中国科学院在沪的生理、生物化学、实验生物、植物生理和药物等几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政治学习小组会上，自发地对金凤汉的研究报告展开讨论。不论是北京的座谈会，还是上海的研究人员的自由议论，两地生物学家对金凤汉经络系统的看法是一致的。

生物学家们说，经络系统有没有实体是一个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金凤汉的报告如果确实可靠，将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是这份研究报告存在许多疑点，很难说明研究结果是可靠的。生物学家们从实验研究的方法、观察的结果等许多方面提出了疑问。例如在进行解剖学和组织学的研究时，用什么材料进行观察，这些材料取自实验动物身上的哪些部位，用什么方法对材料进行固定和染色，在进行组织化学和生物化学研究时，用什么方法摘出凤汉小体和凤汉管，等等。所有这些，研究报告都没有说明，而这些是科学论文必不可少的内容，不然别人如何验证。另外，有些方法使用不当，是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和结论的。金凤汉在进行组织学、组织化学的实验研究中使用的几种方法，特异性不强，可能出现假象，难以作出正确的结论。他们还指出研究报告中描述的凤汉小体和凤汉管是相当大的，不用解剖镜和显微镜，肉眼就该看得到。解剖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已经有数千年历史，从古至今，成千上万解剖学家居然谁都没有看到过这种凤汉小体和凤汉管，岂不是咄咄怪事？生物化学家对凤汉管中的DNA含量高出正常肝脏细胞DNA含量六、七倍感到难以理解。生物学家们还提出了许多问题，他们一致认为由于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很难对金凤汉的研究工作的可靠性作出肯定的结论。

生物学家们觉得金凤汉可能是在弄虚作假。他们担心《人民日报》过早发表肯定性的、高度评价的意见，会在科学上和政治上造成被动，产生

不好影响。

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说,这份研究报告的内容可能有真有假,但是真的不多。即使有的是真的,也不一定与经络有关。《人民日报》用了两版半篇幅发表金凤汉的报告,还加上评论员文章,都嫌过早。把不可靠的研究工作作为伟大成就予以评价,在政治上也是一个大的错误。万一金凤汉的工作是假的,怎么办?

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说,按照金凤汉的描述,凤汉小体和凤汉管是够大的了,几百年来全世界的解剖学家都没有发现,真是不可思议。要记住大跃进年代浮夸风的教训,像《人民日报》这样宣传,我是不赞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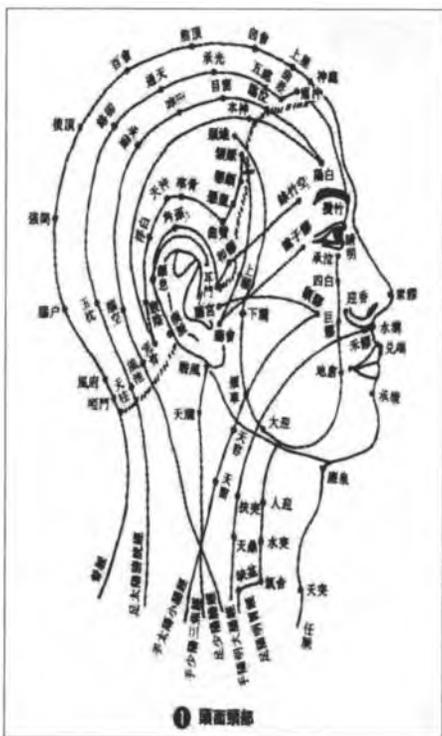
生物学家们指出:我们在政治上支持朝鲜,但在科学问题上要实事求是。他们对《人民日报》不征求科学家的意见,就发表金凤汉的报告表示遗憾。他们无可奈何地说,对金凤汉的工作我们是不相信的,但是宁愿它是真的,如果是假的,那太糟糕了!

我国科学家访问朝鲜经络研究所

1964年1月中旬,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应朝鲜邀请,去平壤医科大学金凤汉的经络研究所,进行为期约十天的学习访问。代表团的团长是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副团长是中医研究院院长鲁之俊,成员有生理学家张锡钧(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徐丰彦(上海第一医学院)、胡旭初(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病理学家梁伯强(广州中山医学院)、组织学家李肇特(北京医学院)等。

代表团出国前,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指示:一定要团结友好,虚心学习,实事求是。不能肯定的不要去肯定。政治上支持和科学上的实事求是一定要结合。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到达平壤后,金凤汉在会见时讲了话。他说,中国《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他



头部穴位图

们的研究报告,使他们感受到中国的有力支持,受到很大鼓舞。希望代表团回中国后立即对他们的工作进行验证,把结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朝鲜打算就经络系统的研究成立一个国际组织,由朝鲜、中国等国发起,由二十人左右组成,金日成曾说要求中国出百分之五十的力量。

代表团既要顾及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兄弟友谊,又要在科学问题上实事求是,没有疑问,他们要完成的任务是艰难的,他们承受的压力是沉重的。

在朝鲜学习访问期间,中国科学家们仔细地观察了该研究所用兔子做实验的结果,在显微镜下观察了切片,看到了“凤汉

小体”在兔子的血管中看到了“凤汉管”。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不议论,只是在看不清楚的地方提一些问题。在这个研究所里,研究人员之间没有横向联系,更谈不上学术交流与讨论。个人的研究结果都直接向金凤汉等两三位领导报告,由金凤汉等汇总成整篇论文。对这种做法,代表团员颇为吃惊,但未公开表示意见。

中国科学家的重复实验

代表团在朝鲜考察过程中,团长钱信忠向国内发回两次报告。这两份报告都是实事求是的。代表团于1月29日回国,第二天在卫生部召开了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科委、中国科协有关领导人参加的汇报会。汇报会上有两种不同意见,因此决定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实验室进行验证工作。2月2日验证工作开始。

首先得出结果的是否定了“凤汉管”的存在。这项实验是代表团成员徐丰彦教授设计的。做这项重复实验的是代表团成员胡旭初教授。他们先重复金凤汉的实验方法,用兔子实验,从兔子一条大腿的血管滴入生理食盐水,在兔子另一条大腿的血管上做一出口,使血液和生理食盐水不断

地流出,当血液流完,血管里只有生理食盐水时,点滴停止。这个过程约需十几个小时。这时剪开大血管,看到血管内有一条明显的白线,同金凤汉做出的“凤汉管”完全一样。对这种现象,胡旭初解释说,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早已证明,血液的正常成分之一纤维蛋白元,在血液凝固时变为细密的网状的纤维蛋白。它把血液的其他成分网住,呈凝固状。如果用玻璃棒搅拌,白色的纤维蛋白就缠绕在玻璃棒上,留下的红色液体就是除纤维蛋白元以外的其他的血液成分。这条白线的形成,正是由于纤维蛋白元在长时间点滴过程中,随着血液的流动方向,而凝固成一条线状的纤维蛋白。人们都知道肝素具有抗凝血的作用,它能防止溶解在血液中的纤维蛋白元转变成凝固的纤维蛋白。于是,胡旭初等按照金凤汉的做法再重复一次,不同的只是在滴入的生理食盐水中加进一定量的肝素。点滴的结果,同预期的一样,肝素阻止了纤维蛋白元的凝固,血管里再也见不到有白线出现。同时,经过分析证明,这条白线的成分根本不是金凤汉所说的DNA,而是蛋白质。至此,“凤汉管”的存在被否定了。

但是“凤汉小体”的验证工作却遇到困难,由李肇特教授领导的小组,花了两个月时间,仍然找不到金凤汉所说的、到处存在的“凤汉小体”,所看到的只是皮肤的毛囊。后来他们集中了约三十人的研究队伍,把兔子全身的皮肤都制成切片,在显微镜下一个切片接着一个切片仔细地观察寻找,终于找到了同“凤汉小体”一样的组织,但这个组织只见于兔子的肚脐。至此,“凤汉小体”也被证伪了。

我国科学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拨开重重迷雾,显示了金凤汉弄虚作假的真相。他们本来应当把否定的结果向领导报告,但是当时少数领导者认为经络是客观存在的,一定要做出结果来,并一再批评他们拿不出肯定的结论,要他们尽快做出正面结果。在这种政治压力下,他们只能用科学的语言表达说,找到了各种“凤汉小体”,但这些都是组织学上已经找到过的组织。即使如此,他们还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进行照相制图等工作,一直忙到“文革”开始。主持这项重复实验的科学家李肇特谈起这件事遗憾地认为,十分可惜地是浪费了那么多青年的

宝贵时间。而设计实验否定了“凤汉管”存在的徐丰彦教授,日子更不好过。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却却被看作犯了政治性错误,受到了打压。他没有屈服,坚持向学校党组织阐明自己的观点。

事情的结局

前面说过,金凤汉事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金凤汉其人其事;另一个方面是我们。事情的结局是:金凤汉方面,因弄虚作假被同胞揭露,受到应有的惩处,他自杀了,一了百了;我们方面呢?也是四个字:不了了之,或者换四个字:无可奉告。

当初轰轰烈烈、史无前例地用最高的规格宣传,用最美的形容词赞扬金凤汉的成就,如今为什么不声不响,一个字的交代也没有?

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颇为尴尬。除了保持沉默,什么也不说,我们还能做什么?

早在中国科学家访问朝鲜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没能无所顾虑地谈谈自己的看法。科学家们做了大量实验工作,否定了金凤汉的研究结果以后,他们既不能把实验结果公之于众,也不能向“局外人”述说事实真相。面对着人们的质询,他们只能保持沉默。这沉默,从1964年春天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如今,当年设计并参加重复实验的徐丰彦、李肇特、胡旭初教授已经带着遗憾仙逝了。代表团的成员还健在的只剩下团长钱信忠一人,不知道他还要奉命沉默到什么时候。

我们有什么错?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什么错,错在什么地方?

我们开头没有处理好,或者说我们的工作程序颠倒了。我们是先宣传赞扬,然后科学家出访,了解情况,然后回来重复实验,最后证伪,事情弄清楚了,我们保持缄默。如果先请科学家上场,就不会宣传赞扬,不会如此尴尬。

也不大好责怪新闻媒体。媒体的误导,有的时候是限于主事者的知识水平和辨别真伪的能力;有的时候也难免是奉命行事,替决策者受过。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决策的失误呢?看来是

我们太性急。中朝人民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在中国和朝鲜的土地上,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鲜血曾经流在一起。朝鲜有了突出的科学成就,长了朝鲜人民的志气,我们自当立刻大力支持,况且经络学说又是中国中医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太性急,忘记了应该先问我们自己的科学家的看法。金凤汉的研究工作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后,我国那么多生物学工作者和基础医学工作者立刻提出了那么多意见,可见对金凤汉工作是非真伪的判别,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其实类似的以政治划线的经验教训已经有过不少了。建国之初,我们一边倒,倒向前苏联。什么都倒,倒了再说。科学也不例外。苏联批判共振论、控制论,我们也跟着批判。苏联赞扬勒柏斯卡娅证明了细胞起源于生活物质、波什扬证明了微生物和病毒可以互相转化,我们也跟着宣传了。影响最大最坏的,要数李森科引发的风波。在斯大林的信任和扶持下,李森科给原来的遗传学扣上“反动的摩尔根主义”的帽子,压制苏联遗传学家,禁止他们的工作,给苏联的遗传学带来灾难。我们跟着吃了大亏。因为我们不但发表了李森科的报告,跟着大肆宣传,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跟着苏联那样办,严重地阻滞了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后来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扭转过来。

发展,后来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扭转过来。

像李森科、金凤汉这样,贩卖假冒伪劣货色,追求名利权势者,从前、现在、国内、国外都不稀罕,将来也还会发生。他们的理论并不高明,他们的结论往往违背常识,而所以屡屡得逞,固然是因为新闻媒体的渲染,人们的轻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领导人的支持。

自然科学中的是非,是只能依靠科学界自己去判别的,不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科学家有时也会因为那个时代认识水平等方面的局限,出现失误。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失误同行政长官个人意志或新闻媒体裁定所铸成的错误相比,要少得多、轻得多。而且这种失误,比较容易通过科学界的进一步评论或科学实验予以纠正。

为了政治需要,不惜压制、牺牲自然科学真理,这类悲剧何时休?!

(注:1997年8月初,某杂志社编者点题要我和李佩珊同志合写金凤汉事件的文章。她当时另有紧急任务,把她1964年在宣部旁听讨论经络问题会议的笔记和她写的《我国科学家对金凤汉经络的证伪》交给我,由我执笔写成本文。后来该杂志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未予刊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老人出书, 精神长存!

——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三千元编辑出版个人文集!

老人出书: 1.革命史、受难史、创业史等传记、回忆录作品;
2.诗歌、散文、小说、杂文、随笔、游记等个人文集;
3.书法、绘画、摄影等艺术作品;曲艺、方志等民俗作品;
4.专业学术著作、思想理论著作、旧文结集、旧书翻印等。

家庭出书: 先人追思、先烈纪念、先贤评价;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家族照片等。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打算—编辑部寄发资料样书—作者寄送稿件图片—公司核算成本价格—协商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寄发大样作者初审—专业编辑审改—协商设计封面插页—排版制作样书—作者终审付款—出版印刷送书。

出版说明: 1.文字书出版标准:大32开,封面插页铜版纸彩印,内页胶版纸印刷,无线胶装。
2.基本价格:200页出版五十册两千元,300页出版五十册三千元,录入排版设计费用另计。
3.特别说明:书稿内容文责自负,所出书一般没有书号用于交流与赠送;需出版发行的我们设计制作样书后联系出版社办理。

分站合作:《个人出书网》自开办以来,深受各地民间作者、文化老人和离退休老干部的喜爱和好评,为方便作者洽谈与交稿,我们计划同地方上有编辑出版经验与组稿能力的个人或单位合作组建若干个地方组稿分站,有意者请来电详商。

出版服务热线:
010—68920114
010—68920182

图文传真:010—68928330 投稿邮箱:grcsw@126.com 邮编:100089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厂洼路五号(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院)博越商务楼6507室
详情登陆:《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老人出书网》(www.lrcsw.com)

从共产国际档案看 反“AB团”斗争

• 李维民

反“AB团”与“富田事变”，是红军时期在中央苏区影响很大的事件。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出版的党史军史，一般都不提这件事情。三中全会以后，曾经历过这一事件的萧克等老同志，写了回忆材料，党史军史研究工作者也有文章发表，但当时的文献，除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之外，其他文字的记载，特别是关于反“AB团”斗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的记述很少。最近，阅读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集、第10集，其中有几份文件对于研究反“AB团”与富田事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反“AB团”斗争是在中央苏区由总前委发动的

中央苏区的反“AB团”斗争，发生于1930年10月，富田事变发生于同年12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并没有反“AB团”的指示或部署，苏联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也没有开始，后来被打成反革命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苏联党的领导人，这时都还在担任要职，他们都是在1934年以后才遭迫害的。1930年12月3日，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军事负责人盖利斯给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汇报信中，转述了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日写的一封信的内容。盖利斯说：

他在这封信中谈到了江西党组织的危机，秘密的反革命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成员不仅钻进了基层组织，而且还钻进了党的领导机关，党组织处在富农、地主和豪绅的影响之下，依靠地方力

量来改善党组织是极其困难的，应该从上海派人去。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首先提出了“半恐怖主义组织AB团”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反“AB团”的建议。1931年2月19日，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的谈话记录中也提到这封信的内容：

为补充以前关于江西情况的通报：毛在10月14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江西的组织处于富农和地主的影响之下，AB团分子钻进了党和苏维埃机关，包括领导机关。

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AB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AB团分子。很难断定名单中指出的人真是AB团分子还是这里的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要使我们的同志倒在枪口之下。这份名单在通过毛关于逮捕省委的决定时起了很大作用。

1931年2月10日，即富田事变发生两个月后，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进一步反映了他听到的情况，信中说：

一个由三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刚刚抵达（他们1月4日从那里出发）报告了负责我们江西运动的领导人中发生的重大分歧。据代表团报告说，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毛指责省委书记[注：李文林]与“AB团”组织（地主富农等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并提出解除他职务的问题。表决时毛显得很孤立，该书记仍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于是毛便开始指责整个省委。部分党委委员后来被20军解救了。毛为此下令湖南部队（20军已开赴湘东）解除20军的武装。毛的这项命令未

被执行。

毛同彭德怀在进攻方向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有过彭不执行作战命令的情况。在代表团出发前，彭同毛还没有完全公开闹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朱德的功劳，他对彭有影响力。老的政治指挥人员对毛暗暗不满。地方党组织几乎全都反对毛。前敌委员会同他站在一起。

代表团到上海来，是为了请中央解决冲突。代表团认为，过错全在毛身上。这一切在东固事件（注：即富田事变）前就发生了。现在（2月10日）情况如何我不清楚。很难弄清楚，这里到底是谁的错，这一事件的起因在哪里。据来者报告，不管怎么说那里的情况非常严重。我在这里转达莫斯克文（注：即周恩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我还没有同代表团谈。我昨天才得知此事。因此，我只好不作评论。我建议莫斯克文立即把问题提交政治局作出决定并立即派人去。决定大体应该是这样的：“在中央局（两名中央委员和我）到达之前停止任何意见分歧（的争论），一切都原封不动，应集中全部力量打退军阀又重新发动的攻势。中央局将对事件进行调查并将作出决定。”

这是盖利斯准备去中央苏区之前给别尔津的汇报。后来他未去成。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1930年11月先派项英去苏区，12月30日，项英抵达红一方面军总部，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布地区正式成立，因周恩来尚未到苏区，项英代理书记。他对反“AB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1月16日在他主持下发出的《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中，一方面严肃批评富田事变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错误行动，同时说不能“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另一方面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中的错误”，其表现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就打”，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杀，尤其防止一般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的发生，也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这个公告发布后，肃反扩大化一度有所缓和。

从共产国际档案反映的情况看，反“AB团”斗争是由内部意见分歧引起的

1931年2月11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驻中国代表别斯帕洛夫，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执行局书记温裕成和时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博古的谈话记录，反映了富田事变后第一个苏区代表团汇报的情况：

苏区代表团已到达上海。代表团中有江西（苏区）共青团省委书记（段良弼）。代表团是1月3日从那里出发的。他们通报了红军和党组织内发生的重大事件。温同代表团谈了话，并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这些事件发生在1930年12月底。

代表团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例如放弃东固。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万人同红军一起走了。空前未有的饥荒……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达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他们受到指控，说他们是反革命组织即所谓“AB团”（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成员，他们都受到严刑拷问。共青团区委书记（注：指段良弼）让看了他的伤势，他受了重伤。由于严刑拷问，他们招认了，尽管（据他们说）他们始终是反对“AB团”的，从来没有成为它的成员。这个连还被毛派往红20军。该军是由当地农民组成的，是从游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并处在省委的影响之下。毛派去的这个连逮捕了该军的所有指挥员、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在逮捕的人中有名声显赫的团长（注：指174团政委刘敌）。当指控他，说他是“AB团”成员时，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我已在红军队伍里战斗这么久了，我全家人都被白军杀害了。”他被释放了，回到了团里，他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决定借助军事力量解放所有被捕者。这个团立即被派去，所有被捕者都被释放了。毛的连由于宣传鼓动改变了自己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怕毛，于是红20军（3000多人，1000多件武器）过了河（注：即赣江）。毛火速派红12军去对付红20军。省委再次召开会议，决定不发起反对红12军的斗争，而是派一个代表团去它那里，建议毛反对共同的敌

人,在军事方面听从毛的指挥。

红12军相信了,没有采取行动。于是毛派湘东一个团去对付20军。20军又派代表到这个团。该团也拒绝进攻。这时省委决定派代表团去中央。毛知道这件事。

这份谈话记录还记载了报告团反映在反“AB团”之前出现的意见分歧:毛与彭德怀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占领长沙时就已经产生。毛主席攻打南昌,而彭主张攻打长沙。起先攻打南昌,红军遭到了失败。于是彭带领自己的部队去攻打长沙,并两度占领该城,但毛没有给彭提供任何援助。他正是以此来解释攻打长沙失败的原因的。

由于军阀的进攻,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领吉安之后,红军获得800万墨西哥元和许多黄金。许多同志认为,现在可以开始打进攻战了。毛反对这样做。他希望先取得军事储备和食品。他派小股部队到城市和农村,但两周内什么也没有筹集到。敌人进攻开始了,同志们想迎战。毛说,应当避开。吉安未经战斗就放弃了。毛提议去闽东南。这一命令下达到彭德怀那里时,彭在军内召开了会议。同志们说,如果毛今后还坚持这种策略,那就应当同他断绝关系。彭当时还很谨慎,他说,不能同毛断绝关系等等。

毛与省委之间也存在意见分歧。有一次毛建议解散所有党组织,因为这些组织内有很多“AB团”分子和富农。实际上,当时在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中是有许多暗藏的这类分子。区委反对这一建议。

谈话记录还反映出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意见分歧:

朱德与毛之间也有分歧。曾举行过一次有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朱德在这次会议上说,他不过是毛手中的玩物,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彭当时拍着桌子说:“你是懦夫,你为什么不斗争?”

共产国际成员对反“AB团”斗争的不同意见

从盖利斯的汇报信和别斯帕洛夫等的谈话记录看,他们虽然并不完全相信从苏区来的第一个

代表团的上述汇报,也没有完全否定这些汇报。

1931年2月19日,共产国际远东局政治负责人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的谈话,有以下的记录:

关于毛与彭之间的分歧问题。由斯皮里多诺夫(张国焘)、科穆纳尔(王稼祥)、古德科夫(沈泽民)、布雷利斯基(任弼时)和莫斯克文(周恩来)组成的政治局委员会同来自江西省委的三名同志进行了交谈。除这个代表团外,一个新的三人代表团也来到我们这里。从交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代表团通报的关于逮捕和毒打被怀疑为“AB团”的我党党员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从这个新的代表团的通报中可得出,第一个代表团并未得到同志们的很大信任。有消息说,前委书记(刘士奇)将带着从毛那里得到的材料和资金到我们这里来。根据现有的材料很清楚,领导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就发生了。这次全会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路线的来信(指1930年6月15日立三路线期间中央给红4军前委的信)。顺便说一下,这封信中谈到,让红军夺取农民的所有武器,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实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并且建议吸收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这件事。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这就是允许富农保留在当地的统治。苏区存在的“AB团”组织活动很巧妙,该组织的组成人员——是留在苏维埃政权任职的前国民党官吏。江西省委去年7月的决议中说“AB团”有10万人。他们似乎全都混在我们的队伍里。当时我们在这个地区共有党员30万。我觉得,这个数字明显夸大了(莫斯克文),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是在红军中,都有很多不坚定的分子。很多红军指挥员是前国民党校官。在苏维埃官员中有很多富农、地主和半知识分子的子女。“AB团”可以通过他们进行活动。这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需要同他们作斗争。

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朱、彭——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4000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等等。毛从这些被捕的人那里得到一个混在我们队伍里的“AB团”成员的名单。此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知道的逮

捕。一些接连不断的传闻在流传，说共青团书记（注：指段良弼）是“AB团”成员（现在他在上海）。根据我们查实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毛和他意见一致的同志执行的是一条同反革命，特别是同“AB团”作斗争的正确路线。但同这些分子作斗争的方法并不总是正确的。毛同志认为全都是“AB团”的成员，他不做任何区分；“不应全都一锅煮”。我们决定给党的前委和毛发一封信，指出，我们认为同“AB团”作斗争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我们不能对个别具体情况作出答复。正在前往当地的政治局代表（注：指项英）获得了广泛的权力，他可以审理所有这些事情，他同苏区中央局共同作出的决定对全体同志都具有约束力。在作出这样的决定前，同志们应该停上一切争论，齐心协力地工作。

奥斯藤（雷利斯基）：你们给毛和前委的信在寄去前请将草稿送给我们，以便协调一致。我觉得，不写路线和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而在通知中央代表前去后，要号召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地工作，同前线和苏区的反革命作斗争。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雷利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政治负责人（实际是第一把手），对反“AB团”斗争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周恩来也还比较谨慎，说“AB团”的数字明显扩大了。但是，正在这时，米夫到上海来了。当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副主任，他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上海准备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纠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路线的。在这个问题上，米夫和雷利斯基早就有明显的分歧。米夫指责雷利斯基“在三中全会上有路线错误”，雷利斯基则申明反对米夫的批评。1930年6月28日共产国际“决定责成米夫同志起草给中共政治局的电报，不解除雷利斯基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米夫到上海后，两人常发生争执，在对待反“AB团”问题上，两人的看法也不相同。1931年2月19日，雷利斯基在与向忠发、周恩来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写路线的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可是同一天，米夫同马雷舍夫和任弼时的谈话否定了第一个代表团的报告，肯定了第二个代表团的报告。

2月19日的谈话有以下记录：

布林斯基（任弼时）同志说，第二个代表团已经抵达上海，要向中央报告去年12月江西发生的一些事件。此外，出差去江西的中央提款员也回来了。……毛是在12月7日逮捕省委的，逮捕后，红20军在一名团长（注：指刘敌）的率领下举行暴动，扣押了军长（注：刘铁超），解除了担负监狱和红军总司令部守卫任务的红军12军一个分队的武装。被释放的省委与红20军一起过了赣江（永州市），它宣布毛及其好友重新委任的省委无效，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委员会。

在红20军战士的集会上作出决定，撤销出卖革命利益的叛徒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的职务。后来，在省委会议上决定，鉴于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声望很高，不对他进行公开的斗争，而同他一起反对军阀。同时，省委派人去各地进行地下活动。通过这种办法它分化瓦解了军政学校，该校约有100条枪落入暴动者手中，部分学员干脆四处逃散。

湘东南委员会尽管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还是作出了反对暴动分子的决定：不承认永阳的省委，解除红20军湖南独立师的武装，支持毛等。该委员会还向中央派出了现在的代表团。

代表团（或是提款员——记不清了）带来了下列文件：（1）朱、彭、黄（彭的政委）的声明；（2）他们告20军红军战士书；（3）毛给省委书记的信；（4）20军暴动团长给中央的信；（5）毛的呼吁书。

朱、彭和黄在声明中称20军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他们指出，以他们为一方面同以毛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是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毛路线，也没有朱、彭和黄路线——只有党的路线，他们同毛一起执行党的路线，一起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等等。

在给20军红军战士的呼吁书中，他们说的大体是同样的内容。毛在给省委书记的信中好像要求在审讯AB团分子时让他们提供这样一些证词，证明朱、彭、黄和其他一些负责人都是AB团的积极成员，以便枪毙他们，并将红军的主要干部同他们一起枪毙掉。

信不是出自毛之手，似乎是从原件上抄下的副本。“信”显然是AB团分子的挑拨阴谋，旨在挑起红军领导人之间的争斗。

中央提款员在返回途中(在长沙地区)宣读了毛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军队清洗了约4000名AB团分子,因此他在政治上和在作战能力方面大大加强了。

新来的代表团指出,湘东南党委不认为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作报告,说该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代表团团长)是AB团分子。它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例如他曾反对分地、反对湖南独立师的行动、反对暴动的20军、反对枪毙一个明显的AB团分子等。

红20军的情况如何,前来的人不清楚。暴动的团长给中央写信,表示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革命功绩,答应服从毛,反对军阀,请求中央因他组织20军暴动惩处他。

谈话记录还写道:“第一个代表团说,被毛逮捕的省委委员承认,他们是AB团成员,不过,他们是在严刑拷打下被迫这样做的(代表团让看了拷打造成的伤痕等)。”

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或AB团的或受AB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

根据毛、朱、彭等人在东固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判断,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

政治局已作出决定,赞同毛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方面的路线,但他的行动有些过火。

1931年3月18日,在米夫的支持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有关内容如下:

看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江西十二月事变的全部材料之后,远东局得出以下看法:

1. 红20军的暴动、该军解除军事学校和12军部分人员的武装、释放受到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影响的、根据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逮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同志、提出诸如“打倒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万岁!”之类的口号等,实质上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南京的反革命派消灭红

军和苏维埃运动而进行的。

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骗,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

2.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

前委和所有党团组织应该尽一切可能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工人、农业工人、战士和中农)参加这场将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组织清除出苏区的斗争。必须特别重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军内外对该委员会的领导。

十二月事变表明,苏区的反革命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它依靠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大商人、旧职员等),并受到白区南京反动派的豢养和唆使,开展大量活动,十分巧妙地进行这项工作。反动分子在适应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和渗入我们党、苏维埃、军队和工会机关的同时,在所有这些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从而便于南京对我们的斗争。同时,反革命分子不惜采取左的和极左的口号来破坏工农联盟、损害党对群众的影响、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指出,反动派不是分散地,而是有组织地,根据周密考虑、严格执行的计划进行活动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存在和发展的这个事实便是这一类的证据。它对我们的苏维埃运动构成了极大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就可能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

因此,我们面临着下列任务:(1)消灭反布尔什维克联盟,使反革命不敢再抬头,再渗入苏区境内进行活动;(2)立即把一切反动分子、剥削分子和企业主分子,特别是一切旧职员清除出所有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3)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消灭苏区内的反革命策源地。这是还远没有完成的军事任务;(4)发动和组织城乡阶级斗争。

这个决定全文共3000字,这里只引用了前面的1000字,下面2000字是具体的要求,如立即解散李文林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由前委成立的现省委是享有充分权力的省委”等内容。决定最后要求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发出新指示。10

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203页）。这个决议比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决定，调门还高一些。中央政治局决议说：“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众——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

任弼时和王稼祥、颜昌颐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抵达中央苏区后，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推翻了此前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时对反“AB团”问题做出的比较客观的通告，于4月中旬以苏区中央局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使中央苏区肃反斗争已经扩大化的错误，更加严重起来。随后，已经承认错误作了检讨的刘敌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先后被处决；红20军副排级以上干部，一律作为“AB团”的骨干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红20军战士被编入红7军后，不少人也遭批判斗争甚至杀害。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共有4万人，被打成“AB团”的就有4400余人，也就是说，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打成“AB团”，这给中央苏区和红军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接替代理书记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在他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这一错误并未完全制止。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1932年5月仍以“AB团”的罪名被错杀。

应当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特别注明：“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因此，这个决议不仅在中央苏区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对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苏区都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1931年3月以后，中央派往

鄂豫皖的张国焘，派往湘鄂西的夏曦，都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精神进行的肃反运动。这个决议发布前，在中国工农红军中，被错杀的只有袁文才、王佐这样的个案。这个决议发布后，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先后被错杀，仅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就有李明瑞、许继慎、舒传贤、曹学楷、徐百川、周维炯、姜镜堂、曾炳春、李文林、柳直荀、程克绳、徐朋人、万涛、孙德清、戴克敏、段德昌、廖容坤、邝继勋、王炳南、季振同、曾中生等21人。由此可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将领被害四五年之前被杀害的，所以并不是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

“反‘AB团’是正确的，错误只是扩大化”这种结论，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受到人们的质疑。“AB团”原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一个以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为目的的反革命组织。“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群众给予沉重打击，使该组织即行解体，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活动。1991年7月，胡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307页指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作中共七大结论时说过：“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见《毛泽东文集》第三集408页）但是事实证明，反“AB团”并不只是“一个错误的侧面”，多年来没有被真正认识和纠正。正因为没有很好地汲取在肃反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所谓扩大化的错误，直至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不认真研究和汲取历史的教训，就很难避免重犯同类的错误。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李晨）

邓子恢接管武汉纪实

● 许人俊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捷报频传。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解放洛阳不久,接着又解开封开古城。

3月初,邓子恢刚在河南开封当选中原地区临时人民政府主席,5月我解放大军百万雄师就势如破竹,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构筑的长江防线,飞越天险,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

武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位置极端重要,是国民党的特别行政市。解放前夕,蒋介石特地指定信得过的“小诸葛”白崇禧指挥58军负责防守,并设有武汉守备司令部。白崇禧和守备司令鲁道源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

然而,当解放军飞越长江、兵临武汉城下时,他们都先后乘飞机仓皇逃离,连国民党武汉市长晏勋甫也毫不知情。武汉三镇,顿时属于“真空期”。晏勋甫市长只好将国民党武汉特别市政府的全部财产和档案清册妥善封存,准备向解放军移交。

6月初,党中央迅即决定组建中共中央中南局进驻武汉市,任命林彪担任第一书记,主要任务是指挥部队继续南下作战,解放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岛……第二书记罗荣桓因身体有病治疗,一直未能到任。中南局的党政军工作和接管武汉的重任,自然落在第三书记、兼四野和华中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的肩上。

6月14日,邓子恢接受任命后,立即率一批干部由开封起程,一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在18日胜利抵达武汉。

先期进入武汉市的军管会主任谭政和副主任陶铸闻讯赶来欢迎邓子恢,并汇报有关情况。

此前,国民党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晏勋甫,已向新生的人民政府市长吴德峰交权。政权虽然属于和平移交,但整个城市交通已被破坏,城乡

联系断绝,商店萧条,工厂停产。粮食极度缺乏,物价上涨,大批人失业,社会治安混乱,无政府主义严重,到处发生抢劫,穷困与混乱笼罩着武汉三镇。

共产党如何接管、治理好这座混乱城市?社会各界人士对领衔人物邓子恢都拭目以待。

好在不久前解放河南洛阳、开封、郑州等地时,邓子恢曾有过组织领导部队边解放、边接管城市的经历,积累有丰富经验。所以到武汉后,他首先确定旧政府所有人员,一律原职、原位、原薪,各司其职,行使城市管理职能。然后,他按轻重缓急,指挥湖北和武汉市党政军上下配合,发动群众,打了一个漂亮的城市接管战。

巧斗奸商囤粮 急解粮食供应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我党我军接管武汉后遇到的第一难题。

解放前,武汉的粮食市场一向由私营粮行控制。刚解放时,一些唯利是图的粮商,利用解放初期城乡交通关系中断,粮油供应紧缺,社会秩序混乱的局势,大搞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哄抬物价。当时,粮油一天一个价,不断上涨。老百姓人心惶惶,天天提着粮袋,争先恐后赶到粮油店门前,排起长长的队伍。抢购粮油之风席卷武汉,粮油问题闹得武汉三镇动荡不安,市民思想混乱!

因购粮问题引起的打架斗殴事件到处发生,情况极为紧急。武汉军管会十分头痛,他们如实向邓子恢书记汇报。他听了军管会和各级领导的汇报,一边指示在武汉市担任领导职务的老部下金明、周季方等同志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一边又让主持湖北省领导工作的李先念同志连夜派人到天门、凉山一带农村筹

集粮油,甚至将一部分军用粮油悄悄运进武汉。

与此同时,邓子恢还指示立即成立华中贸易公司,马上派人分别北上华北,东赴江苏、上海、浙江,四处为武汉紧急筹粮。

几路人马,分头行动,协同作战。几经努力,终于在很短时间内,将农村的粮油和部分军用粮油500多万斤,从四面八方利用夜幕掩护,秘密运进武汉。

在邓子恢的周密部署下,与粮油奸商开展较量的准备工作在暗中进行。不法粮油商们都蒙在鼓里。他们我行我素,继续在粮油市场兴风作浪,哄抬粮价。

正当粮油奸商洋洋得意之时,一天清晨全市所有国营粮店,按照邓子恢同志的统一部署,突然全部开门,正式挂牌营业,大量抛售平价粮食。

一场粮食大战顿时打响了!

起初,那些老谋深算、富有商战经验的粮食商人们,沉着冷静,稳坐钓鱼台。他们的对策是:你开门,我关门;你抛售,我停售。他们认为土八路在战场上打国民党军队有本领,但进城后不懂市场经营,打商战不是自己的对手。同时也低估了新政权的售粮能力,以为国营粮店刚刚成立,准备的粮食数量有限。平价售粮食,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用不了多久,国营粮店就会粮尽库空,关门大吉。到那时,武汉三镇的粮油市场,依然是自己的天下,自己可以继续呼风唤雨,兴风作浪。所以在国营粮店开门平价售粮期间,私营粮商们一直关门闭店,按兵不动,停止营业。他们准备同共产党的新政权打持久战、消耗战,等待看共产党撤退的笑话。

然而,他们完全错了!国营粮店开门营业后,粮源充足,库底雄厚。从各地秘密运进的500万斤粮食,除100万斤供部队使用外,其余400万斤全部投放粮食市场,充分满足市民购买,平价销售,有条不紊,从不间断。

起初,市民们对粮食供应还不摸底,深怕买不到平价粮,因此天天争先恐后排队,大袋买,大袋背,常常弄得精疲力尽。一个星期过去了,大家看到国营粮店每天按时开门营业,店里粮食始终堆得满满的、高高的,价格一直不变,随到随买。天长日久,大家情绪逐渐稳定,再也不起大早、排大队了。抢购粮食的风波,逐渐消散。

在实力与智慧的较量中,邓子恢指挥新生的国营粮店显示了气魄,在武汉市打出了威风,赢得了民心,树立了威信,国营粮店立即成了广大市民购粮的主要渠道。

武汉的粮食市场,已成了国营粮店的一统天下。不法粮商们感到大势已去,手中囤积的粮食卖不出,粮食压仓压库,资金无法周转,经济利益严重受损。粮商们开始垂头丧气,有些人沉不住气了,只好主动找军管会表示愿把囤积的粮食交人民政府销售,免得在自己店里继续压仓压库,积压资金,劳神丧财。

一场激烈的粮食大战终于宣告结束了,共产党胜利了,解放军胜利了,新生的国营粮店胜利了。后来,电影界创作、摄制了一部名为《粮食》的故事片,反映的就是这一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

打击银元投机 稳定金融市场

这一期间,邓子恢在武汉市还指挥打了一场围剿投机资本的“银元战”。

解放前夕,武汉恶性通货膨胀,广大市民对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圆券十分不满,对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完全失去信任。平时,大家只认银元,不认纸币,致使银元占领了整个市场。

解放军进入武汉后,市民们对我们发行的人民币,同样持不信任态度。人民币投放市场后,大家不认可,大部分浮在市面上,买不到多少东西。而银元依然十分吃香,成为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继续控制市场。当时,一些投机资本家乘机倒买倒卖银元,哄抬银元价格,从事投机倒把活动,搞得市民人心不安,金融市场动荡,严重影响经济正常运转和发展。

在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的邓子恢,熟悉金融业务。刚进入武汉时就感到银元问题严重,不可忽视。他就立即致电党中央,建议将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定为1:550元。然而,由于金融资本家从中捣乱,一个月后,比价竟变为1:4500元,人民币币值急剧下跌,严重影响市场正常贸易,工商业陷入停顿,大批工人失业。

1949年6月19日,邓子恢深感事态严重,立即再次电报中央:“武汉物价飞涨,人民币币值

急剧下跌，市场上实际用人民币而无形停市，情势异常严重。”同时，他紧急召开中南局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稳定人民币币值。

1、开展舆论总动员，报纸发表文章，电台广播讲话，组织各界人士集会，发动学生上街造声势，大力宣传拥护人民币，要求禁用银元。计划通过一周工作，将人民币的币值提高1000元——1200元，然后宣布禁止银元流通。

2、召集商人开会，宣布征收下半年所得税12亿元，分三期交清，只收人民币。

3、从国库中动用50万银元，到黑市上收买人民币，提高人民币的身价。

4、由武汉市军管会发布公告，命令禁用银元。

邓子恢一向言必行，行必果，武汉市军管会禁用银元的公告一张贴，他就指令出动纠察队，查封了市内两家在金融界兴风作浪的大钱庄，拘捕了200多名银元投机分子，并加强了对其他私营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

共产党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对不法商人毫不留情，该罚的罚，该抓的抓，一丝不苟。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部分商人都学乖了，不敢轻举妄动。

通过这些行政的、经济的严厉措施双管齐下，武汉市人民币币值迅速上升，物价逐渐下降，人民币终于取代了银元，占领了市场。共产党在“粮食大战”、“银元大战”中双双获胜，广大市民无不拍手称快，称赞“共产党在战场上攻无不克，在商场上同样战无不胜。”

当然，少数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遭到打击后，又把投机的目光转向棉纱市场，哄抢和囤积棉纱，影响物价再次波动。

邓子恢同志及时组织反击战。他指挥华中贸易公司调集货源，向市场抛售棉纱，满足供应，平抑物价上涨风潮。一些不识时务的投机资本家，起初认定物价还会上涨，不惜借高利贷大量吃进棉纱。谁知华中贸易公司连续抛售棉花、纱布等商品价格猛跌。经过几个回合轮番较量，他们损失惨重，赔了老本，还要付高息还债，“赔了夫人又折兵”，两面挨耳光。一个个凄楚悲切撤出了投机市场。从此，武汉和华中地区的贸易市场，开始

进入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

邓子恢在武汉“粮食、银元、棉纱”三大战役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智慧，不仅沉重打击了华中的投机资本势力，而且为中央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同投机资本势力作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深受党中央高度称赞。

这一年，11月，毛主席从北京来电，指示在华中地区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建立管辖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6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工作的过渡性最高权力机关。经邓子恢和毛主席同各方人士协商，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林彪为主席，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为副主席。半年后，林彪因病休养，邓子恢任代主席，主持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面工作。

妙缴消防武装 为武汉市民除害

当时，邓子恢是中南地区叱咤风云、治国安邦、权倾一时的首脑人物。但他位高不显，官大不傲，历来平易近人，对干部、战士、工人、农民均毫无首长架子，群众遇事都乐于找他交谈，如实反映情况。武汉解放不久，有一次水电公司几名工人代表到中南局机关上访，要求见邓子恢面谈。工作人员感到邓子恢工作太忙、太累，建议由秘书出面接待处理。邓子恢不同意，认为这是群众送上门来的社会调查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暂停手中的工作，亲自接待群众代表。

在接待室里，邓子恢耐心倾听工人的意见，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向对方询问，他从上访群众中了解了城市基层的许多真实情况。谈话一直持续到快吃中午饭，邓子恢感到十分高兴，特意留上访群众在中南局机关食堂共进午餐。他和上访群众边吃边谈，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邓子恢从中又了解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上访工人代表在中南局机关，受到最高领导人如此亲切、热情、真诚的接待，情况反映了，疑虑消除了，内心极为感动，纷纷把这一亲身经历像说故事一样，讲给单位同事和亲朋好友们听，大家都异口同声夸赞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作风朴实，温亲宽厚，体察民心，同国民党的军官官僚有

天壤之别。

邓子恢在接待市民代表过程中,逐渐了解到武汉市的旧政权在市里留下了一个群众恨之入骨的大怪胎——城市消防队。

城市消防队,顾名思义,本是为城市防火、救火、灭火而设立的专业部队。然而,武汉解放前的这支消防队,却一直反其道而行之,名为消防队,实为放火队。

消防队常常在武汉三镇居民住宅区,暗中寻机纵火,制造火灾。然后装模作样匆匆赶到救火,乘机抢盗市民财物。灭火后,他们一边让保险公司承担赔偿市民火灾财产损失的责任,一边又强令受灾市民摊派消防费用,到处敲诈勒索,残害百姓。市民们身受其害,苦不堪言。但因他们过去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军队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加之又拥有1000条枪,大家只有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武汉三镇虽然解放了,回到了人民手中,但这支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他们一如既往打着保障城市消防安全的旗号,继续横行市区,作恶多端。

军管会进城后,对这些情况早有了解。奈因当时粮食、金融市场形势是主要矛盾,涉及更大范围的国计民生,必须首先优先解决。何况消防队手中还握有武器弹药,如何安全、稳妥地处理消防队的问题,事关重大,务必等待适当时机,选择巧妙方式谨慎从事。俗语说:不是不报,只是时间未到。

武汉解放三个月后,粮食、金融市场混乱情况基本解决和稳定,邓子恢开始腾出手来抓消防队的问题。一天,武汉市分管公安工作的新任副市长周季方等同志,应召赶到中南局邓子恢办公室,向老领导详细汇报通过多方调查研究,掌握的有关消防队的情况,听候中南局的指示。

周季方是红军干部,南征北战。在解放战争期间,他随邓子恢驰骋华东战场后,又随邓老逐鹿中原,接管城市,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

邓子恢边听、边记、边问,极为认真。其实,他早已心中有数,而且有了解决方案。待周季方等汇报结束后,他站起来做了一个挥手动作,果断地指示周季方:“采取突然袭击方式解决!”

接着,他向周季方等同志面授机宜,逐一作了具体布置。周季方带兵打仗很有经验。他对老首长指示的良计妙策心领神会,不断点头叫好,暗暗称赞。回去后,他们立即召集公安局军管会的领导班子开会,传达邓子恢的指示,并进行周密部署。一个对消防队实施“突然袭击”的秘密计划,正在悄然组织实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一天,武汉市上空万里无云,天气晴朗,宽阔的长江波平浪静。市区人群熙熙攘攘,你来我往,整个城市显得分外和平安详。此时,副市长周季方遵照邓子恢的指示,正在调兵遣将。他让公安局通知消防队全体人员携带枪支,赶到民众乐园广场集合开大会。同时,他又暗中布置新组建的城市公安部队,悄悄调往民众乐园附近隐蔽待命。一场针对消防队的突然袭击行动即将开始。

大会由副市长周季方亲自主持,他简要地讲了几句开场白,随即让公安局长训话。

身着戎装、神态威严的公安局长,是从野战部队选调来的老八路。他身材魁梧,沉着刚毅,健步挺身走向台前,一张口就用军人洪亮高亢的嗓音,面向全体消防队员突然发布口令:全体——起立!原地向右转!——跑步——前进!

这支旧消防队虽然为非作歹,但平时毕竟要按军队规矩进行队列操练。天天喊口号,听口令,学会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跑步前进……天长日久,每个军人就自然养成了一种令行禁止、按口令行动的习惯,而且形成了军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强烈意识。凡是受过训练的军人,只要一听口令,就会立即产生令行禁止的条件反射,指东向东,指西向西。习惯成自然,这是部队军事训练的必然结果。

这一次消防队也一如既往地,习惯地、毫不思索地听从公安局长下达的口令:起立——向右转——跑步——前进……一切那么自然,合乎常规,有条不紊地按口令行动。

他们跑步前进,离开枪支的距离越来越远。就在这一关键时刻,秘密埋伏在附近的公安部队,按命令突然迅猛出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会场,七手八脚、干净利索地把架在场内的所有枪支收缴完毕。等到消防队员从稀里糊涂中醒悟时,大局已定,大势已去,他们赤手空拳,手无寸铁,根本无法作任何抵抗。一个个呆

若木鸡,失神而立,只有老老实实等待处理。

邓子恢的“突然袭击”战术一鸣惊人,喜获全胜。直接组织指挥这一行动的副市长周季方,事后回忆此事时仍兴奋不已:“这个突然袭击办法很有效。过去为非作歹的旧消防队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蒙了。我们不费一颗子弹,没有一个伤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利地将这支旧武装消防队伍解决了。”“当时在武汉市大得人心,大快人心。随后,根据情况,我们给消防队员发了一点钱,让他们解散回家参加劳动,自食其力。”

清除码头恶霸 惩治封建帮派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是我国黄金水道——长江中游一大交通要道,又是东西水上运输和南北京广铁路交汇的枢纽。它的沿江两岸设有许多码头,每天都有川流不息、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四面八方而来,又通过码头向四面八方而去。

然而,这些万商云集、人来人往的码头,长期以来却一直被封建恶势力统治着。大大小小、众多的封建把头,在武汉三镇形成了一庞大的社会网络,他们拥有独特的“扁担权”。

“扁担权”,是武汉码头封建把头压迫、剥削码头工人的一种特权。解放前,码头搬运工人队伍,大多由肩挑背扛的挑夫组成,小小的扁担和长长的绳索,是挑夫劳动挣钱的唯一工具。他们凭着一根扁担,几根绳索,整天迎风冒雨,来回奔跑在江边码头上,为千万旅客挑运行李、物品,靠出卖苦力,辛辛苦苦挣点血汗钱养家糊口。可是,黑心的封建把头们,却称霸一方,自称在码头拥有“扁担权”,横行霸道,无所顾忌,逼搬运工人向其进贡,交纳“扁担费”。大小把头雁过拔毛,层层盘剥码头工人。

更可恶的是,封建把头们还拥有一批流氓打手和武器弹药,形成武装的帮派势力。青帮、红帮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百姓遭殃。他们不仅控制江岸码头,而且把凶恶的触角伸向市区各里弄街坊。市民搬家迁址、商店运送货物,均受他们控制,必须向他们送钱献礼。如不按他们立下的规矩办事,他们就会带领流氓打手登门寻衅滋事,轻则闹得你家鸡犬不宁,重则砸店伤人,甚至倾家荡产。最后,还得逼你赔礼道

歉,交钱款,买平安。

解放前,这帮码头封建恶霸势力,与青红帮头目及国民党官府,都是一丘之貉。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沆瀣一气,鱼肉市民,欺负百姓。解放后,恶习依然不改,藐视新生的人民政权。他们错误认为土八路、穷共产党长期在农村活动,没有见过大世面,进城后也奈何他们不得。于是继续逞性妄为,欺行霸市,作恶多端,成了武汉三镇一大社会公害。

邓子恢进城后,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掌握了这些情况。他指示军管会挑选四五百名精悍的干部,组成若干工作组,深入沿江码头和市区里弄街坊,认真调查研究,充分发动劳苦大众,摸清码头恶霸势力的底细,掌握证据,将主要头目的重大罪行一一记录在案,务求稳扎稳打。

经过近两年详细调查研究,工作组对全市沿江码头大大小小封建把头的有关情况,均已心中有数。眼看各项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时机已经成熟,邓子恢下定决心坐镇指挥:在全市所有码头同时开展声势浩大的民主改革运动,斗争矛头直指码头封建恶霸势力的头头们。

许多遭受苦难、受尽压迫的码头搬运工人和里弄市民,争先恐后在群众集会上发言控诉倾吐苦水。他们的声声苦、滴滴泪,像一颗颗装满仇恨的子弹,猛烈地射向封建恶霸、流氓头目的胸膛。那些昔日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的封建把头、青红帮头目,顿时陷入劳苦大众愤怒声讨、控诉的汪洋大海之中,受到了正义的审判。

声势浩大的群众控诉斗争高潮,一浪接一浪,一浪高一浪。民主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地展开,形成空前高潮,像狂风、像暴雨、像怒涛,猛烈地冲击着武汉市腐朽反动的封建恶霸势力的破船。连续数天的群众控诉、声讨、斗争大会,将沿江两岸码头的民主改革运动推向新高潮。往日欺压搬运工人和市民,惯于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码头封建恶霸、流氓和青红帮头目,遭到了空前、沉重的打击,在大庭广众之下丑态百出,狼狈不堪。

这一场轰动一时的码头民主改革、反霸斗争,由于邓子恢直接指挥,决策准确及时;由于工作组调查研究细致,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各项准备工作周到充分;由于广大群众、尤其是码

头搬运工人得到了充分发动,革命斗争性空前调动,所以运动进展极为顺利。那些过去称王称霸、吸人骨髓、罪孽深重、不可一世的封建把头和黑帮头目,很快被群众揭露出来,一个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革命群众运动强大攻势的威慑、震撼下,长期形成的黑社会帮派体系和网络迅速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经过认真审判、严格核实,沿江码头 70 多个作恶多端、罪大恶极的首要分

子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另有一大批骨干头目被判徒刑关押。

随着正义枪声的响起,一大批流氓歹徒锒铛入狱,长期危害武汉码头和市区的恶霸、黑帮势力,被彻底摧毁了,沿江两岸和市区群众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庆祝胜利,同声高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

(责任编辑 致 中)

代购代邮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问史求信集	阎长贵 王广宇著	58.00	8.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7.00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吴 思	28.00	6.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8.00	6.00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	徐庆全	45.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蒋介石日记揭秘	杨天石	60.00	8.00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史札记(事件篇)	林蕴辉	40.00	7.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辉	38.00	7.00
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萧 克 李 锐 龚育之等	28.00	7.00
经历——我的 1957 年	和凤鸣	29.00	7.00
党史札记末编	龚育之	32.00	7.00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	张化 苗采青等	59.80	9.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沉思录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20.00	5.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6.00
1949 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傅国涌	30.00	6.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5.00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闫健编	35.0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著	22.80	6.00
1978 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于光远	36.00	7.00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26.00	6.00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王光美 刘源等	20.00	6.00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张广友	32.00	7.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 :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 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付邮费)

《苏共亡党十年祭》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深刻剖析了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文章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共鸣。

《潜规则》一本普及读物。作者对历史准确的剖析,为我们打开了中国传统历史真实游戏规则的秘密。

《问史求信集》这是一部由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组长王广宇合著的问信文革史研究著作,书中他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将亲身经历和了解的“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回忆和记录下来,供读者参考和研究。

《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胡乔木、周扬、丁玲、夏衍、胡风等文化思想界名人六十多封信札,述及 1949 年到 80 年代文化思想界的大事。解读这些信件,成为重读文化思想界风云的新视角。

《走出个人崇拜》神化领袖,搞个人崇拜,先后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中浮现,并泛滥成灾,如苏联 30 年代——50 年代兴起的个人崇拜,导致肃反扩大化灾难。中国 60 年代——70 年代个人崇拜的狂潮伴随文革悲剧的发生。作者对昔日政坛上的领袖们,以人生的视角做出新的考察和反思……

《直言》尝忆 50 年代,为鼓励放胆直言,毛泽东多次谈及,共产党员应有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六者除头犹在,其余皆已身历。自谓因祸得福,筋骨耐劳,心志耐苦,世事洞明,胆气壮。今年 80 有余,回首平生,行止无愧天地,得失从不萦怀,素与“左”倾无缘,足以自慰矣!来日无多,请问尚有何眷恋?关怀莫过后来者,忆旧休忘左祸殃,但愿一言堂永绝,神州遍地百花香。

——李锐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是一部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书,但不同于个人回忆录,书中不少情节是历史档案中所没有的,作者将了解的情况如实写出来,留给今人和后人探讨。

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由来

· 夏俊生

温家宝总理 2005 年 6 月 17 日在考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说, 1987 年冬天, 我当时担任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中央负责联系科技工作。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中关村科技园区(当时叫电子一条街)搞调查研究, 形成的第一个文件, 就是国务院批准的关于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政策性文件。

温家宝同志组织的这次调查研究的结果, 就是国务院 1988 年 5 月正式批准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建立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后改为中关村科技园区)。而直接引发温家宝同志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调查研究的, 是我写的一组内参。中关村一些了解内情的科技企业家都说, 是我的这组内参, 加快了中关村改革的历史进程, 直接推动了被称为“科技特区”的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诞生。

20 年前我能写出这组内参, 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有多理由我可能写不出这组内参, 但鬼差神使, 却让我这个既不负责中关村报道又不了解中关村情况的财经记者写出了这组打动了中南海的内参。

分社领导临时派我写一篇中关村的公开报道

中关村一直是科技记者的地盘。当时, 我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分工财经报道, 并不负责科技报道。1987 年 8 月底, 由于当时分社负责科技报道的记者到外地出差, 分社领导就派我去采写一篇反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改革发展的成就性报道, 作为分社庆祝国庆 38 周年的重点稿。

本来, 写这样的报道, 只要到海淀区和北京市科委等有关部门收集一些材料和数字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 就不可能掌握那么多关于中关村改革和民办科技企业的材料, 也可能就没有了后来写内参的冲动。但多年在新华社工作养成的深入采访的作风使我开始了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全面调查研究。

从 1987 年 9 月 2 日开始, 我每天乘坐 107 路电车和 332 路公共汽车, 从安定门内交道口附近的家里赶往中关村, 先后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市科协、海淀区政府和四通公司、京海公司、科海公司、信通公司、希望公司、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联想集团的前身)等一大批科技人员“下海”创办的科技企业, 采访了在 1980 年 10 月创办中关村地区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的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和王洪德、陈庆振、周明陶、李勤等一批科技企业家以及研究电子一条街的专家、学者。

经过近一个月的采访和翻阅了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之后, 我在 9 月底写了一篇 1300 多字的消息发到总社, 总社在 1987 年 10 月 3 日向全国播发了这篇以《首都“科学城”边出现一条高技术产业街》为标题的消息。这是新华社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第一次综合性报道, 突出介绍了民办科技企业的特点和取得的成绩, 被《人民日报》

海外版和上海《文汇报》等全国 18 家中央及省级报纸采用,我后来改写的《中关村“模式”》一稿也被《解放军报》采用。

新华社记者的职责让我主动写出一组内参

这篇公开报道由总社播发后,分社领导交给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而且表扬我任务完成得不错,并没有要求我继续写电子一条街的内参。

可能是我第一次深入地接触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特别是民办科技企业,感到非常新鲜。民办科技企业的巨大活力和民办科技企业家的拼搏精神不断撞击着我的心,使我看到了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一股新风。当时,社会上对这一新生事物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它是“中国的硅谷”,代表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高新技术发展的方向,应当大力扶持;有的人认为它是“骗子一条街”、“倒爷一条街”,应当取缔。这就使我这个爱琢磨问题的记者对它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和写作冲动。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以个人电脑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和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中国兴起的改革开放浪潮这两股大潮撞击融合的产物。被称为“科学城”的中关村地区,集中了中国科学院等国家和北京市的科研院所近百家以及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 30 多所,有 4.5 万多名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是我国智力最密集的区域。长期以来,由于科研与经济的分离,尽管我国有“两弹一星”的尖端技术,但生产领域里的科技水平不高。这些科技人员在高楼深院里关门搞科研,无法在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施展自己的才能。在中央提出要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和深入进行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这个大气候中,一批科技人员纷纷“下海”创办科技企业,把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逐步形成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由于经过了一个月的调查和听取了各个方面的意见,我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对电子一条街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科技人员走出大院大所创办科技企业,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的生产力,有利于培养既懂科技又懂经营的新型企业家,有利于推动科技体制的改革,有利于大院大所积压的科技人员和科技成果进入经济建设主战场。另外,民办科技企业灵活、高效的运营机制,也为国有企业和科研单位改革内部经营机制提供了经验。总之,像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和发展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一样,电子一条街开创了我国发展新技术产业的中关村模式,对于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参与世界新技术革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只是发展中的问题,也是可以纠正的,国家应当重视和支持民办科技企业的发展。

为此,多年担任新华社记者形成的职责意识,使我感到自己有责任通过内参向中央领导反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情况,特别是民办科技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各方面的建议,为我国科技体制的改革鼓与呼。当我把准备写一组内参的想法向分社领导汇报后,得到了分社领导的支持。

于是,国庆节后,我就我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情况写了《中国的“硅谷”》、《经营效率高 效益好》、《民办科技企业家的希望和建议》、《民办科技企业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组 4 篇内部调查报告,经分社领导审改后,于 11 月中旬发给总社,总社在 1987 年 11 月 30 日发出了前两篇,12 月 1 日发出了后两篇。总社编辑把我第一篇稿子的题目改成了《科技的春天高技术产业》。我在这组内参中建议在中关村成立高技术产业区和制订配套政策,支持技术产业和民办科技企业的发展,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

内参被总书记批示 温家宝同志组织调查

我写的这组内参发出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12 月 7 日在这组内参的第一篇首页上批示“送芮杏文、温家宝同志阅”。12 月 8 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芮杏文批示:“请家宝同志阅酌。我想去了解一下,同时是否组织一下力量,作深入的调查研究。”12 月 9 日,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批示:“我已让调研室组织力量进行专题调研,请

进玉同志将安排情况向杏文同志汇报一下。”12月10日,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批示:“请于维栋同志提出调研计划和力量。”于维栋当时是中办调研室科技组的负责人,他后来告诉我: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组内参的批示,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批示的转移速度,从总书记到中办调研室科技组,是每级领导每天批一次,可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二是对报道阅读是细微的并且划了加重号,有的写了旁批。例如,总书记对内参中“这条街上的科技企业,不仅自己开发的技术成果迅速变为生产力,而且把中科院积压多年的科研成果变为实用技术,投向市场”这段话下面划了道道。在内参中“中关村地区有4.5万多科技人员和高校教师”的边上写了旁批:“直接参加企业工作的多少?”在“建议国家对个体、集体、全民科技企业通盘考虑,研究技术产业的政策、法规和管理办法,以促进我国技术产业的发展”、“把人才流动搞活”、“民办科技企业最大的意见是得不到进口许可证和国家科技项目”、“公司的财产到底归谁所有?”等句子下面也划了道道。

随后,在温家宝同志主持下,组织了由中办调研室牵头,有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等部门人员参加的20多人的中央联合调查组,调查组成员在开展调查前都认真研读了我的内参报道。中央联合调查组在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全面深入地调查以后,提交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肯定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方向和经验,并建议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作为建立我国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试点。1988年3月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讨论通过了中央联合调查组的建议,决定在中关村以电子一条街为基础建立中关村科技工业园区。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批准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宣布了试验区的正式诞生。中央联合调查组组长于维栋在谈到我国第一家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与我写的这组内参的关系时是这样概括的:中国首家科技园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是国务院在1988年5月10日批准建立的;国务院又是根据1988年3月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决定批准的;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的决定,又是根据《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报告》做出的;而中央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调查,又是由新华社内参引起的。

回顾20年前我这组内参的写作过程,虽然有它的偶然性,但偶然性里面有必然性。这就是新华社记者的职责意识和责任意识。可以说,职业精神、责任意识和深入调查研究,成就了我的这组内参报道。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的这组内参所反映的问题正好是当时党中央和中央领导正在思考的重大问题。

在中央批准建立深圳、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和东南沿海城市对外开放以后,中央领导同志就开始抓科技进步,考虑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相结合,把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科技与经济相结合上勇于探索并已取得明显效果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开始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我的内参调研比较详细地总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成绩和需要研究的问题,恰巧为中央领导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启动的机会。当然,如果不是我的内参点燃了中央领导思想的火花,也可能别的报告或材料早晚会起到同样的作用,但我国建立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启动就不知道要推迟到什么时候了。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立20周年。到2007年底,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科技企业已经达到2万家,技工贸总收入达到近8600亿元。从这里诞生了联想、北大方正、四通等一大批世界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它的带动下,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蓬勃兴起,其中国家级的就有54个,2006年的经济规模达到4.6万亿元,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军。

想到20年前是我的一组内参直接推动了我国第一个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诞生,为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至今仍然感到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的光荣与自豪。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大饥荒年代的偷抢行为

· 李治国

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已经过去 40 多年了，但是许多情景仍然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1959 年——1962 年，我在四川省郫县第一中学读高中。从 1959 年下半年开始，郫县农村人民公社的许多公共食堂就已经断粮了，城镇虽然有粮食供应，但定量标准一降再降，一般居民每人每月 23 斤，干部、教师一度降为 19 斤，我们中学生受到照顾，每人每月 30 斤。大家基本上没有什么肉、油、副食品供应，蔬菜供应也很少，我们这些住校的学生，许多人每餐只能就着酱油和盐来吃饭。从 1960 年开始，农村饿死人已经很普遍了，路边常可看见没有掩埋的尸体。我们中学虽然没有饿死人，但因为营养不良而得“浮肿病”的却很多，我所在的郫县一中高中部 62(1)班共有 47 个学生，得浮肿病的就有 42 人。人们每时每刻都处在饥饿中，见面时的主要话题就是“吃”，俗称“精神会餐”。

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吃下了自己的那份定量饭食，仍感到饥肠辘辘。当我走到离校不远的一条小溪边漫步的时候，看到了学校种植在小溪边的一些扁豆苗已经结出了大小不等的扁豆荚。饥饿实在难熬，看看附近无人，我几经犹豫之后，像小偷一样迅速摘了一大把扁豆，找了一个荒僻地方生起火来烧熟吃下肚去。事后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和不安，我不断问自己：我真的成了“小偷”吗？我很可耻吗？直到现在，我已经 60 多岁了，还时常想起那次“偷”扁豆的事。

在那大饥荒的年代，偷抢多如牛毛。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人为了“吃”，准确地说为了不被饿死而小偷小抢别人的东西。这些人想要借此延缓自己的生命，有些人则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们每餐吃饭都必须尽快赶到食堂去拿自己蒸的那一份饭，如果去晚了，就有可能被别人偷偷拿去吃掉了，自己挨饿不说，常常连蒸饭的缸钵都找不回来了。我有时到学校附近的大街上去走走，好几次看到有人刚刚用粮票买了一个烧饼，还没有来得及吃，或者仅仅啃了一两口，突然就有人从背后跳过来一把将烧饼抢走了，抢夺者一边逃跑一边拼命往嘴里塞烧饼，想要在被追上前把烧饼吞下肚去；有的抢夺者眼看要被追上了，就拼命往烧饼上吐唾沫，想让追赶者放弃已被弄脏的烧饼；当人们追上来对他们拳脚相加大打出手的时候，他们面对雨点般的拳脚丝毫没有交出烧饼的意思，反而头也不抬更加急促地吞吃着或吐着唾沫。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在郫县北门外看到一个两腿浮肿、气喘吁吁的中年男子跟别人“摆龙门阵”（四川方言“闲聊”、“讲故事”之意），说：他昨天在某商店看到了白糖，白花花的有一大盘摆放在柜台上，他有一年多没有见过白糖了，多么想去吃一口啊，他跃跃欲试，好几次想去抢一点，终于没敢去抢，现在想起来好后悔哟，都怪自己胆小，真要抢一点就好了。我们班上有一个农村男同学，个头不高，文文静静，十分腼腆，后来因为家庭困难休学了，忽然有一天我在郫县南门外的公路边上看到了他，只见他衣衫褴褛，面色蜡黄，蓬头垢面地瘫坐在地上，目光呆滞地向行人乞讨，听说因为偷盗食品他的两条腿被人家打断了，他被扔在了路边，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大约是在 1961 年寒假后的开学初，上级给我们郫县一中分配来了四五个大学即将毕业的实习生，来当我们的老师并兼（下转 31 页）

在美国打工 17 年

——访“倦鸟思归”的陈亮

● 贾宗谊

陈亮在新华社离退休干部中算得上是个“知名人士”了。但他的“知名”与众不同，具有“陈亮特色”。人世的沧桑、生活的跌宕，给陈亮的生涯抹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陈亮 1929 年诞生于一个同国民党高层有密切关系的家庭。在上海沪江大学这所美国教会学校接受了高等教育。1951 年毕业后，他先分配在内务部（现在改称民政部），后调到新疆喀什，混了近 5 年，于 1956 年 8 月调到新华社总社参编部从事编辑工作。1957 年 5 月，共产党开始整风运动，号召大家多提意见，帮助党改进工作。新华大院工字楼的北墙上，贴满了群众写的大字报。要求入党的陈亮不甘落后，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一口气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题名《庶民谈国是》。

这篇墙报文章贴出后，立即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他谈的主要内容是：高干子弟享有特权，跟满清的旗人差不多，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但实际上“刑不上大夫”，少数人逍遥法外；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过于粗暴，类似焚书坑儒；领导人应该有退休制度，外国总统、总理也退休嘛。陈亮万万没有料想到，他这篇墙报文章中“引蛇出洞”的“阳谋”，他成了被从洞里引出来的“蛇”。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一下子把鸣放运动变成反右运动。陈亮成了本部门第一个批判对象。

“你诬蔑共产党的干部！”“你竟敢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诬蔑为焚书坑儒！”对陈亮的批判一浪高过一浪：“你竟敢要求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像外国的总统、总理那样退休！”陈亮，由于他的文章“极其恶毒、反动”跟国内部戴煌并列为新华社的两个“极右派”，双双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可是，当戴煌继续留在北大荒，为他的《九死一生》这部报告文学积累第一手素材的时候，陈亮



陈亮(左)与本文作者

却被新华社保卫处派人把他领回，戴着“右派帽子”在参编部工作。周围的同志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个“右派”，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北大荒改造而回北京。这是个谜，当时新华社只有一两个高级领导人知道谜底。

陈亮说：“在我被押送去北大荒的同时，我的舅舅俞鸿钧当上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舅舅膝下无子，我自幼就受到舅舅的呵护，常常给我零用钱，关系非常密切。据我猜想，可能是有关部门给新华社打了招呼，认为我会起点儿统战作用吧。”

陈亮在家里是独生子，他的姐姐 1949 年去台湾后，嫁给蒋家“友”字辈的人，这使陈亮又多了一层统战关系。浙江奉化蒋介石家的辈分排列是：蒋经国以下是“孝”字辈，如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西安事变中被打死的蒋孝先。蒋经国的孩子叫蒋孝文、蒋孝武；“孝”字辈以下是“友”字辈。此外，陈亮还跟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有亲戚关系，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吧，他在“文革”期间被提前从新华社永济五七干校召回北京。

陈亮在学生时代便交游甚广。有些小学同学

和民国时期著名人物的后裔,至今仍与他有来往。在他的涉外关系中,不仅有国民党的高官,而且也有美国政府的重要人物。美国国防部的一位空军上校同陈亮的交往引起了我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他是陈亮姐姐的女婿,这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地道美国人把陈亮叫 uncle(在英文里,叔叔、舅舅都是这个词)。在开拓中美航线时,他是美方派来的飞行员。通过这个外甥女婿,陈亮又结识了美国驻华使馆政务参赞等一些官员,周末偶尔互相宴请。老布什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访华,在长城饭店设宴,陈亮也受到邀请。

复杂的境外高层社会关系,既给陈亮带来麻烦,有时也使他得到点儿好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戴煌和陈亮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1957年的工资,但未补发。值得玩味的是,戴煌和陈亮的问题改正后,新华社的选民旋即自发地撇开党委指定的人选而选举了他们为西城区人民代表。

改革开放以后,陈亮在参编部当了几年《参考消息》和英文编辑室的头头,又赶上“老同志驻外”的末班车,在新华社联合国分社干了几年。行将离任时,陈亮觉得,美国是个多元移民国家,结构复杂。而在我们分社工作,好比生活在“小北京”,几年中他只有一个周末去过华盛顿,对美国毫无感性认识。他希望滞留下来,观察和亲身体会美国社会。经新华社领导的同意,他没有回国,就地退休,自谋生路。陈亮,凭他在美国的关系,很快就找到工作,进入美国社会。

陈亮先后在美国三个单位工作过,它们是:美国华人策划协会(Chinese American Planning Council)、美国中文电视(Sinovision)和纽约州政府医疗补助项目(New York State Medicaid Program)。他还利用周末或业余时间做点“义工”,先后得到美国税务局、人口普查局、亚太老人中心、犹太总会盲人服务处颁发给他的奖状。有两家报纸还刊登了他办公的照片。他在这三个单位总共工作十四五年的。在变换单位的间隙,则给社会安全局(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和一家保险公司打零工。

陈亮在上述三个单位,都是作为正式职工任职的,工资收入依法纳税。在纳税积分(credits)达到规定的额度并年过65岁,就有资格领取养老金

(social security)。于是,陈亮便成为领取中国和美国双份养老金的人。

陈亮脱离分社后,在美国打工17年,眼看就进入耄耋之年,他用“倦鸟思归”来形容他的思乡之情。

我问他:“你女儿已经加入美国国籍,还有两个洋外孙,你在美国有许多中外亲友,你也能适应美国社会,为什么不在那里养老?”

他说:“美国的生活条件的确比较优越,但这是物质上的,精神上却很空虚,总觉得身处异域,格格不入。同洋人,包括自己的洋女婿,没有贴心话可讲。同洋外孙的代沟太大。事实上,我压根儿就没有想终老美国。美国移民法规定,持绿卡五年可入美国籍,到十年时必须做出抉择。我宁可两次付款换绿卡,也不入美国籍。我两次去中国领事馆换护照,领事馆同志也觉得奇怪。我母亲多次去美国,住几天就嚷着回国,这位清朝宣统年间出生的老人如今已经年满百岁,仍然健在。我姐姐于前两年去世,我又没有兄弟,我得照顾老母。叶落归根,倦鸟思归啊!”

陈亮性格随和乐天,开朗直爽,我问他:“你当年被划成‘右派’,没有积怨吗?”

陈亮哈哈大笑起来:“过眼云烟,我早就置诸脑后了。有些人比我更冤、吃苦更多,我这点事,算得了什么!”陈亮叹了口气,又说:“当年我提的意见其实没有错,只不过不合时宜而已。现在不是正在逐步落实吗?我‘最恶毒的一条’是要求领导人也应当有退休制度,如今不是已经实行了吗?”

陈亮谈到他在台湾的亲友时说:“自从陈水扁当上台湾领导人后,我在台湾的亲戚和老朋友,本世纪初已经陆续卖掉房产,移居美国。我离开美国以前,曾经多次同他们相聚。陈立夫的幼女已经跟我约定今年五月中旬在上海会晤。他们现在都是美国人了。”

陈亮一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了。大谈离开祖国二十多年,完全没有想到中华大地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说:“我出国时还是过着凭粮票布票的日子,现在是要啥有啥。我离开时,家里窗前是一片宣武区贫民窟,今天则是高楼林立。”他的感受比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祖国怀抱里的人,还要深刻得多。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阿尔巴尼亚动乱纪实

• 王洪起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国政局相继发生了剧变。如果说,以捷克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发生的演变基本上是“天鹅绒式”的,那么,以阿尔巴尼亚为代表的巴尔干部分国家发生的演变则是“急风暴雨式”的,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以联盟解体为结局的剧变却是“战争式”的(马其顿除外)。素称“山鹰之国”的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贫穷社会主义的典型”,穷则思变,情理之中,这也是本国人民苦斗煎熬了近半个世纪后做出的选择。但其采取的以“打砸抢烧”为特点的“粗野的、急风暴雨的”剧变方式,实不可取。它带来的后果是:破坏性大、复仇性大、动荡性大。1997年,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全国性武装动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次剧变的反动。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同当时留守地拉那的5名中国使馆外交官员一起,经历了地拉那武装动乱的日日夜夜。

“金字塔式”集资活动是武装动乱的导火索

事情还要从剧变后阿民主党执政初期的1992年说起。

当年,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一场私有化运动,国家财政状况极为紧张,银行无力向经营者提供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司和个人以贸易实业公司或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注册,利用人们渴望通过捷径迅速发财的心理,以高利率为诱饵,大搞所谓的“金字塔式”集资活动。这些机构支付给储民的高额利息并非来自投资所得利润,而是用后来储户的存款垫付前者的利息。如此反复,越来越多的储户成为“金字塔”的塔基,老板则端坐塔尖,牟取暴利。当然,一些在国内外从事贩毒、走私的人也利用这一活动进行“洗

钱”。

1996年下半年,一直得到民主党当局支持和保护、反过来又资助民主党取得当年5月议会大选胜利的高息集资活动达到了疯狂程度。这些机构为争夺储户竞相提高存款利率,有的利息竟高达70—100%。广大群众在霍查执政时期,受够了贫穷之苦,今天竟然能在短短数日内获得数倍于存款额的利息,犹如天上掉下馅饼来,心理防线终于被打破。那些日子里,我们目睹高息集资机构的门前从半夜起就排起长龙阵,有的人等着取利息,更多的人是经不起诱惑而加入储蓄大军,纷纷将一生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屋、土地的所得,全部送到这些骗子手中。据统计,阿全国共有12个大的假集资机构,在全国普设储蓄点,储户多达100多万(其中不乏政府高官和个别外国驻阿外交官,但这些人知道个中猫腻,仅存短日捞得高息就洗手不干了),占全国人口的1/3,总存款额近20亿美元,远远超过国家进出口总额,近乎阿国民收入的1/3。

疯狂的假集资活动使全国金融混乱,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投资计划受到严重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6年11月先后派要员来阿尔巴尼亚调查,并向阿尔巴尼亚当局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立即采取制约措施。但是,阿当局不但漠然处之,甚至还公然为假集资活动辩护,称高息集资活动“完全是‘人民资本主义’,公民储蓄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国家不能利用行政手段压制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钱是最干净的。”这样一来,假集资活动就更加有恃无恐,从而达到了巅峰。然而,眼看群众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钱储蓄了,一些骗子便携巨款潜逃,或宣布“破产”,储民痛不欲生,有人甚至暴病不起或绝望自杀。他们呼吁政府干预,政府不予置理。

迫于压力,1997年1月中旬,阿政府不得不

冻结了几家仍在活动的“基金会”的大约3亿美元的银行存款。随后,民主党利用集资机构的资金大搞竞选、拉选票的丑闻败露。于是,全国广大储民在极度绝望与愤怒的情况下,从1997年初开始,相继在全国各地大城市掀起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群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己的钱”、“打倒强盗政府”、“打倒贝里沙”等口号,并伴有打、砸、抢行为,最后发展到难以收拾的武装骚乱的局面。

一直受到民主党打压的社会党及其他反对党出于对民主党及其当局的强烈不满,自1996年大选后曾多次发起和平抗议活动,都遭到镇压。这次他们相互联合,并借助于广大民众就假集资事件掀起的反政府浪潮,提出“经济问题,政治解决”。这样,一次由假集资引发的规模浩大的武装动乱和政治动荡开始了。

武装动乱从南方扩展到全国

阿尔巴尼亚的这次动乱首先发端于南方,作为阿第二大海港的发罗拉则是主要据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执政时期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大多来自南方。而南方“石头城”吉诺卡斯特则是已故领导人霍查的故乡。被民主党取缔的阿共产党一直在南部地区活动。由劳动党演变而来的社会党在发罗拉等南方城市的势力和影响颇大。另外,南方民众到近邻希腊和隔海相望的意大利打

工的“难民”最多,他们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都存到了“基金会”,受骗上当者居多。

南部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在要求得到经济赔偿的同时,还提出了诸如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等政治主张。面对严峻局势,当局派军队和警察部队前往平息,多次发生冲突,互有伤亡,要求政府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发罗拉市民在被军队包围的情况下,抢劫了市郊区的军火库,成立了武装组织,走上了武装暴动之路。随后,南部沿海地区的德尔维纳、希马拉和阿第三大海港城市萨兰达的市民也纷纷抢劫军火库,掀起武装暴动。

为镇压南方叛乱,阿当局秘密制定了“南部作战计划”,并于3月2日紧急通过了“全国戒严令”,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紧急状态。根据“全国戒严法”,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一切政治活动,实行宵禁;为平息动乱,授权贝里沙总统动用军队;进行军事总动员,军人服役期延长至紧急状态结束;现役和预备役军人如不执行戒严时期的任务,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国小学停课等。

尽管以梅克西为总理的民主党政府3月2日被迫集体总辞职,但并未缓解民众的愤怒情绪。而戒严令的宣布和3月3日贝里沙强行蝉联总统的行为,则进一步激怒了全国百姓。南方武装力量在被民主党解职或被勒令退休的前军官的指挥下,在坚决要求贝里沙下台的呼声中,迅速向北推进,坚称“武装进军地拉那”。一个又一个军火库被抢。反政府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很快

由南部沿海地区扩大到吉诺卡斯特、贝尔梅特和中部的培拉特等地,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便扩大到距离首都地拉那仅60公里的策里克市。被派到南方镇压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军警部队,大多表示不愿向“自己的兄弟”开枪,有的部队把武器,甚至把坦克、装甲车、巡逻艇拱手送给武装民众,有的飞行员驾着米格战斗机逃往意大利,许多军人或投降“起义军”,或自愿“解甲归田”。在此期间,一些公检法机构遭到袭击,并陷入瘫痪;监狱被劫,大批刑事犯出逃;全国各地



1997年多国部队在地拉那街头

拿起武器的抗议者各自为政,无人过问,喜欢玩枪的到军火库拿上几支背在肩上,满街乱逛,南部费里区的一些有放射性的军事装备流失到民间,大量建筑物被烧、被毁,银行抢劫案和拦路抢劫事件频频发生……政府失去了对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自1997年3月初起,外国商人就纷纷离开阿尔巴尼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驻阿大使馆也将外交官家眷和无紧急公务的一般工作人员送回国内。“美国之音”在每天数次的广播中,急切地呼吁分散在阿各地的美国“和平队”队员速与美驻阿使馆联系,以便分批尽快撤离。美国国务院下令160名驻阿外交官及其家属搭乘飞机离阿。美国军方则下令位于亚得里亚海上的战舰群做好准备,负责撤离旅居阿的2000名公民;英国外交部也宣布,它正在安排从阿撤走120多名英、爱尔兰以及英联邦的侨民。地拉那的上空天天听到军用直升机的轰鸣声,其中大多是来接运本国在阿公民的意大利和美国飞机。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了笼罩在整个阿尔巴尼亚的紧张气氛。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特别是反政府武装力量的逼迫下,贝里沙总统终于不得不同意与社会党组成联合政府,向以社会党为首的反对派做出一系列让步。3月9日,总统贝里沙与10个主要政党负责人举行圆桌会议,制定“民族和解纲领”,同意提前举行议会大选。3月11日,贝里沙任命吉诺卡斯特市市长、社会党人巴什基姆·菲诺担任“民族和解政府”总理。但是,各党派就政府组成相互扯皮、讨价还价,人员名单始终定不下来。原以为局势会很快出现转机,但事与愿违,首都地拉那的局势却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

地拉那湮没在枪声中

3月12日,地拉那枪声彻夜不停。西南郊的一座军火库及西北郊的一座兵营遭到抢劫,大量枪支弹药失散于民间。当天下午4时左右,地拉那空中传来了急骤的步枪声、机枪声,偶尔还夹杂着爆炸声。显然,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武装动乱已经延伸到了地拉那。密集的枪声彻夜不断。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围墙外居民楼的窗口里也冒

出串串火花,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一连串枪声。

中国驻阿大使馆立即发布命令:所有馆员,包括新华社记者,除非不得已,严禁外出。为防万一,使馆还给大家发了工人施工用的安全帽。

地拉那的人们在整夜的激烈枪声中迎来了13日的晨光。或许因为响了整整一夜的枪声,清晨枪声稀少了一些,然而浓重的恐怖气氛却始终笼罩着全市:大、中、小学一律停课,政府机关停止办公,商店停业;不论家门,还是校门、店门、机关大门,全部紧闭。街上几乎没有行人,连警察也不见踪影,偶然一辆汽车飞驰而过。地拉那简直成了一座死城,成了一座没有设防却几乎家家都有枪支的城市。中国使馆西墙外的一片空地上停着一辆带篷卡车,车旁站着两三个背枪的人;北墙外的居民楼群中也停着辆汽车,车上的人正向居民发放武器,同时还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他们提供枪支。

这一天,阿尔巴尼亚全国唯一的首都国际机场—里纳斯机场关闭了,阿尔巴尼亚与周边国家的所有海关关闭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茹拉利携全家老小出逃意大利;贝里沙总统躲到了停泊在亚得里亚海上的意大利船上,地拉那使馆街两头及各外国使馆门前的警察踪影全无,都拉斯海港400人强抢一艘商船,逃往意大利;全国各地传来盲弹造成人员伤亡的消息,地拉那市郊发生多起抢劫事件。

当天晚上,又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地拉那的3座监狱同时发生暴动!

3月14日仍是在激烈的枪声中来临的。东方刚刚出现鱼肚白,地拉那西郊的“南昌工地”便传来了被抢的不幸消息。

中国南昌对外工程总公司于1995年中标承包了马来西亚投资兴建的阿尔巴尼亚住宅项目工程——地拉那卡姆扎住宅小区的740套、占地800亩的民用住宅。该工程位于地拉那市的边缘地带。开工一年多来,工程进展比较顺利,已经完成多座楼房的主体工程。

从12日起,为了保护工地,工人们在工地周围挖了一道壕沟,筑起铁丝网,以免遭到冲击。14日凌晨,工地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雇用的阿尔巴尼亚工人刚刚起床,一大群阿尔巴尼亚人就持



1997年进驻地拉那的欧洲多国部队举行记者会

枪来到工地大门口，推倒岗楼，一面朝天开枪，一面往里冲。工地雇用的少量保安人员根本无法阻止，也不敢阻止。这些来路不明的抢劫者，大喊大叫，见什么就拿什么，发疯了一般。随后，更多的阿尔巴尼亚人，多达上千人，有的开着汽车，有的赶着牛车、马车，还有的牵着毛驴，络绎不绝地赶来，浩浩荡荡地冲进工区。他们不只有步枪，还有手雷。一个暴徒一手拿着手榴弹，另一只手则拉着导火索，威胁中国职工。他们在枪声的“鼓舞”下，把工地的钢材、水泥、木料、砖头装上车、驮上毛驴，把工地办公室、宿舍、食堂、仓库的东西洗劫一空，把停在工地上的大、小汽车开走。更有甚者，一些阿尔巴尼亚人竟让赤手空拳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举起双手，面对墙壁，或趴在地上，搜翻他们衣裤的口袋，把所有的钱物抢走，包括人民币（数日后，一些阿国人竟拿着抢来的人民币到中国商店兑换列克）。据说有人把钱藏在地下，最终还是被挖了出来。在被抢劫过程中，工地领导试图与抢劫者谈判，然而这些人根本不可理喻。中国使馆得到“南昌工地”被抢的消息后，经济商务参赞处的两位同志立即开车去工地了解情况。车刚一停下，便围上来好几个抢劫犯，用枪逼着他们交出汽车钥匙和口袋里的钱。中国经商参赞说：“我们是外交官，汽车是外交车，你们不能抢！”暴徒哪管这个，朝天就是一梭子子弹，强行把奔驰车开走了。

被抢后的工地临建区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房屋不是墙被推倒或被捣毁，就是屋顶被掀翻，工地四周的铁丝围墙几乎全部被推倒。工地上的100多中国人，别无选择，只好全部撤到中国大使馆安身。

两天来的严重动乱迫使在阿尔巴尼亚从业的其他华人也纷纷赶到中国大使馆避难。使馆顿时从原来只有20来人猛增到近200人。

就在这一天，我国政府接到我驻阿使馆的紧急报告后，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方式安全撤离我在

阿尔巴尼亚的公民。我使馆人员除5人留守外，全部撤离。

送走撤离的同胞

3月15日，大撤离。这一天，中国驻地拉那使馆的头等要务就是紧急安排华人撤离回国。

使馆相继与希腊、美国、意大利等驻阿使馆取得联系，寻求帮助。在紧要关头，希腊政府伸出了援助之手，希腊国防部长当即答应尽最大努力，决定派军舰协助中国人员撤离。

10时30分，撤离的使馆人员和华人分别登上使馆外交车和大客车。车队在警车的护送下和围观市民的注视下，迅速驶往40公里开外的都拉斯码头。码头上停靠着一艘希腊军舰，船上的希腊海军全副武装，做好了接应和防范准备。我人员依次迅速登上军舰。中方100多人全部登船后，军舰立即起锚，向公海驶去。舰上的部分人员分别转乘上早已等候在公海的另外两艘希腊军舰。3艘军舰载着满怀感激之情的华人，破浪驶向希腊的北方小岛——科孚岛。撤离人员从那里转乘飞机回到祖国的怀抱。（真可谓善有善报。希腊海军当年对我国公民的善举今天得到中国海军的友好回报。2009年元月29日，正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武汉”舰成功地解救了一艘遭索马里海盗围追堵截的希腊商船“ELENIG”号。危险解除后，“ELENIG”号

船长致电我“武汉”舰：“感谢你们直升机帮我们赶走了海盗船，我们现已安全。感谢你们的直升机和军舰！”——这是后话)

撤离后的中国大使馆只剩下包括我们在内的7名留守人员，不免显得冷清。傍晚，使馆临时代办召集全体人员开会，讨论使馆保卫问题。使馆的正面有警察守卫，其余三面的围墙极易翻越，加之使馆的大队人马白天大张旗鼓地离去，我们全都十分担心暴徒会乘使馆势单力薄时深夜闯馆。为此，大家分析了可能发生的情况，代办确定了每个人应负的责任和联络方法。一致决定，一旦暴徒闯馆，所有人员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使馆机要和电台。出人意料和令人惊喜的是，这一晚竟然相当平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枪响，似乎来自市郊。几天来首都市民第一次睡了一个安稳觉，各家医院第一次没有传出抢救被流弹击伤者的消息。而仅在前3天内，就有10人被流弹打死，200多人被打伤。连日来，当局多次开会，呼吁各党派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和谐一致，同时采取切实措施，恢复治安和水、电、面包供应。现役和退役军人、警察响应民族和解政府发出的“祖国在危难中、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号召，返回原单位或前往国防部、内务部报到，组成志愿者队伍，承担起维护首都治安的神圣任务。

19时刚过，装甲车便开进了地拉那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众多的志愿者持枪乘车在市内主要街道上和国家主要机关周围巡逻，总统府门前也部署了坦克，市郊的交通路口均设置了检查哨所，对违反宵禁规定的车辆进行严格检查。

3月16日清晨，首次听到令人欣慰的消息：南部发罗拉市实现了数周以来的第一个无枪声之夜；北部的斯库台市建立了市民自卫组织，实现了第一个无抢劫的夜晚。这一天是阿尔巴尼亚当局宣布的全国哀悼日，追悼在这一期间的死难者。广大的民众企盼这场狂暴尽快地成为过去。

上午10时，上万名地拉那居民来到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举行和平集会和游行。参加者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天真可爱的儿童。他们首先向在这场动乱中的所有丧生者志哀，然后，摇着手中的绢花，高呼：“我们要和平，不要暴力！”16日下午，菲诺总理紧急召开政府会议，决定宣布政府“1号命令”：17日国家机关正式恢复上班。地拉那的形势开始有了初步好转，但全国局势仍然混乱。

“黎明行动”和新政府成立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菲诺政府，上台伊始，面临着恢复国家稳定、确保居民食品供应两项最迫切的任务。为此，菲诺政府努力恢复和组建军、警部队，同时请求国际社会提供军事和食品紧急援助，特别要求欧盟和欧安组织尽快派军队来阿干预，以解决国家的极度混乱状态。

出于自身安全利益考虑，欧美社会和国际组织积极活动，与阿当局不断进行紧急磋商，力求平息动乱。

经阿尔巴尼亚当局再三请求，欧盟各国终于达成妥协，决定向阿派遣多国部队。3月25日，欧盟军事专家组开始在阿进行实地考察，为多国部队做准备。27日，欧安组织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有关建议案。翌日，安理会通过第1101号决议，授权部分成员国向阿尔巴尼亚派遣多国保护



等待救援的阿尔巴尼亚山民

部队(中国投了弃权票),任期3个月,负责守卫港口、机场、公路、铁路及仓库等设施,协助国际组织提供援助和帮助运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这样,联合国继1992年首次向巴尔干半岛的波黑派驻维和部队以后,再次授权向这个半岛的阿尔巴尼亚派遣多国保护部队,执行保障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安全畅通的“黎明行动”。

4月,身穿橄榄绿军装的西欧军队陆续抵达地拉那首都机场和都拉斯港口。

多国保护部队由意大利牵头,由包括法国、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奥地利、丹麦等8国的6000名士兵组成。部队在阿尔巴尼亚的机场、港口、公路等重要交通要道驻守,直至6月阿尔巴尼亚举行议会大选为止。4月11日,意大利伞兵首先抵达阿尔巴尼亚;13日,40名法国先遣部队士兵分乘军舰和飞机抵达地拉那,与意大利士兵会合;14日夜,第一批由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1000名士兵组成的多国部队从意大利的布林迪西港出发,于15日顺利在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港登陆。此后,多国部队分批陆续抵达,部署在重要地区。根据计划,部队进驻后,主要任务是恢复地拉那、都拉斯、发罗拉等地的正常秩序、保证阿尔巴尼亚的国家安全及议会大选的顺利举行。

由于阿尔巴尼亚整体局势趋于平静,阿尔巴尼亚于6月下旬举行了议会大选。不出人们预料,以社会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取胜,并获得组阁权。7月24日,阿尔巴尼亚新一届议会选举社会党总书记迈达尼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7年惊心动魄的武装动乱刚刚过去,1998年的政治风波再次冲击了阿尔巴尼亚。当年9月,民主党进行了武装反夺权,但未取

得成功。

举世震惊的1997年武装动乱和1998年的“未遂政变”,犹如一场噩梦。这场噩梦终于开始过去。然而,噩梦中的一切却是人们永远不能忘怀的。在这次持续数月的严重武装动乱中,拥有300余万人口的阿尔巴尼亚,共有近3000人丧生,2万人受伤,其中儿童伤亡近千人,数万难民逃往国外,国民经济遭到重创,物质损失高达数十亿美元,而动乱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是难以消除的。动乱中失散的70万支枪和15亿发子弹,当局和国际社会虽多次以“发展换武器”的名义要求国民缴回武器弹药,却收效有限,大量武器将长期流散于民间,给社会治安造成严重问题。更有甚者,它给巴尔干地区的安全带来威胁。据查,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以及2001年马其顿发生的安全危机期间,那里的阿族武装组织拥有的许多武器弹药都是从阿尔巴尼亚走私而来的。

2001年元旦。为了永远告别那噩梦的年代,阿尔巴尼亚的孩子们收集了武装动乱期间的3万颗子弹壳,铸成了一口“和平钟”,安放在地拉那市中心的“国际文化中心”的广场前(原来的霍查纪念馆)。钟上刻着:“我(和平钟)在子弹中出生,愿在第三个千年里,在阿尔巴尼亚儿童的和平道路上嘹亮高歌。”

(作者为新华社驻阿尔巴尼亚前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作品惠及你我他
版权保护靠大家

公益广告

欢迎订阅2009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售，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每期定价：6.90元

全年定价：82.8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售罄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新中国60周年丛书：

内容简介：

本书多位作者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的决策，记录了一个又一个非凡的历史瞬间，既有官家的宏观视野，又有民间的客观冷静。这些发表于著名纪实性杂志《炎黄春秋》的文章，致力于匡正教科书的偏误，挖掘过去年代有意或无意掩盖的真实历史，全面提供了观察中国政治、经济与生活变化的新视角，诸多真知灼见也闪耀其间。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定价：36元 邮费6元

欲购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购。

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转折：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9年第**7**期

文革时期的思想解放先驱

邹鲁风调查人民公社之祸

金凤汉事件

邓子恢接管武汉

吴江：文化现象杂说

大饥荒年代的偷抢行为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6.90元